

第一章 引言

1.1 疑問的開始

「2005 年的暑假我隨著東海大學人間台灣研究社開啟對於社會真實的接觸，主要是關心面對六輕、八輕的雲林蚵農們。還記得那次在漁會門口的陳請抗爭，自救會會長說會號召將二、三十位蚵農和居民前來爭取自己的權利，結果實際到達的卻只有四、五人，加上學生們也不過十餘人，漁會卻不知哪來的消息派出了七位警察現身旁觀。那次的訴求很簡單，便是要求漁會重視颱風災後的補償以及汙染的相關處理。然而，還沒有辦法討論到正題，氣憤的蚵農和因為見不到漁會會長而出來頂替的某個主管就此爭執起來，一路扭打到漁會內部……。」¹

一直以為所謂投入社會便是加入廣泛定義裡社會運動的行列，剛開始確實有一股熱血和天真的反叛，而認為自己所關心的正代表著社會公義。當我拿起白底黑字的布條，上面寫著的是學生們想出來的標語批評政府漠視蚵農生存權利；我突然在想：我這樣做能幫上什麼忙呢？抗爭過後並沒有溝通出實質的方案，基於身份和有限的時間也無法更多理解這整個事件和蚵農的處境。自稱關心鄉土和社會議題的我們，總是來了又離開，對於受害居民來說我們真的是站在同一立場的共同體嗎？還是一群外來「協助者」？

專業的學者和環境運動人士²當然不落人後地參與其中，他們以蚵農的生計和海水汙染問題展開對「大怪物」六輕的對抗，將地方政府重視短期利益和選票都赤裸裸地呈現出來。然而，期盼社會運動做為改造社會的社運人士，或許心急地想要為人民發聲、引起社會共鳴，對於環保運動常常訴諸聳動的字句來表現³。2007 年，環保人士更聲稱台西是中華白海豚的故鄉，欲興起一陣保育類話題，其論述方式不外是對抗國家機器和資本運作，但是在反汙染、反八輕建廠的同時保育運動竟然與在地人民的發展利益產生衝突，形成環境團體與居民對立的矛盾

¹ 2005 年 8 月，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出訪台西時我的田野筆記。

² 包括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中興大學黑森林工作室、環球技術學院學生、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及報社記者等等。

³ 以身體裸露為抗爭符碼的環境抗爭很多，包括反核、反六輕等。

現象。

2008 年我再次踏上這個「黑道的故鄉」，想要了解居民對於工廠、汙染和社區的想法，卻發現這當中有太多利益糾紛。由於地方派系發達壟斷人脈與資源，富者恆富，貧者恆貧，加上工廠建設的地方通常座落在經濟較落後的郊區，當地居民在經濟發展的誘因和需要上未必會反對設廠，雖然造成汙染，還是期待著資方給予社區繁榮的空頭支票。以台西鄉為例，很小的鄉鎮卻有一百多項名目的社區單位，各單位的名目上都會有相同的頭人或派系，但彼此之間都在競爭國家資源和政治權力。不難想像類同「白海豚」的事件在社區發展、地方利益、生態保育和反公害的議題上形成弔詭的聚集。地方頭人掌握資源有效創造文化吸引觀光客，有特色有名聲能夠帶來商機遠比汙染重要的多。在當紅的保育話題和社區發展的大餅上，地方頭人、政客、環保人士、知識分子、居民、蚵農和漁民都想分一塊羹。當然，農漁民是這場角逐的輸家，生產工具不可逆地被汙染，還要背負上「沒有權利意識」、「怎麼動不起來」的汙名。

在資訊流通快速傳遞中，還來不及思考白海豚是否真有其事，蚵農的生計困境、在地的發展實況，很快地掩蓋在生態保育這個具有全球性、普遍性的議題下。保育議題成為媒體商品化的對象，環保團體則高舉生態保護是先進國家民主化的趨勢，但是在看似正義的背後卻失去論述脈絡的源頭，也失去對主體的描述。

為什麼今日環保運動與環保論述中都缺乏對於人(主體)、社區和土地更深刻真實的理解與論述？又為何生態保育的環境論述無法有效反映草根的在地需要？環保團體透過激烈的抗爭訴求、行動劇和聳動的言語是否足以代表知識分子走入民間，還力於民？在個人與社會集體之中的張力與拉扯讓我充滿著複雜又矛盾的疑問和情緒感受，但卻可以肯定社會的某些樣態、知識分子的論述語言及思想需要被檢視、反省和將之問題化。

1.2 文獻回顧和問題意識

台灣社會的環境運動從八〇年代以來，針對工業化與國家實施十大建設自 1970 年開始所產生的環保運動及議題如雨後春筍，特別是以石化煉油業、火力發電廠、核電廠重工業等所造成極大汙染成為反抗的焦點與話題。類似的事件從 1986 年以來鹿港反杜邦、後勁反五輕、林園反三輕，宜蘭、嘉義反六輕到 2008 年雲林台西反八輕(林園反三輕擴建及後勁反五輕擴建至今仍在進行)展現各地的集體運動到今日沒有停息，但是被迫壓縮的環境資源以及人民生活中的痛苦實況好像越來越無法對國家政策和資方企業產生實質的影響與對話，在國家和資本家，看到的是在利益競爭、漠視弱勢的需求，掩蓋真實的環境問題；在地方上，看到的是人民的貧困、資源競爭、對立和運動的零碎化。這一切讓我思考到，雖然環境議題有其保育價值與意義，分析資本運作邏輯也是重要的，但是似乎不能解釋這些年來國家與資本家在產業上競爭，以及間歇不斷發生的地方性反抗，環境運動好像只是對汙染現象所做出的反射動作，然而，在每一個單一事件中卻不足夠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理解我們所存在的現在的這個社會，或我們正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問題。

基於這樣一點點疑惑的開始，我嘗試釐清環境運動和公害意識發展的歷史脈絡，回溯八〇年代，環保運動被稱為運動史上的火車頭，展現民間自力救濟的力量，理解這一群因為公害事件而組織的草根民眾和知識分子是在什麼樣子的社會氛圍下被召喚出的，有助於我們對國家、資本家及整個社會結構有更進一步的發問。

自國民黨執政以來，經濟上實行發展主義，政治上則威權統治，民間社會雖在七〇年代陸續有保釣運動、台大校園民主運動等等，但少有機會能觸及國家建設的公共議題，並且當時人民的環保意識並不顯著，只有在學界中有少數生態學家對於生態保育學⁴的討論，但都還未成為普及大眾的公共討論的議題。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國民黨轉向對第一世界美國靠攏，不論是在經

⁴ 1970 末，東海大學生物系林俊義教授等人陸續討論台灣的生態環境問題。

濟政治外交上的依賴和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時台灣社會瀰漫著對經濟起飛、進步、民主、科學等等現代化辭彙的擁抱和崇拜，相信台灣會因為國家建設提升整個社會的層次。這樣的美夢實現了一部份，十大建設在歷史上確實帶來經濟成長，工業化與許多公共建設創造出一片繁榮的景像。不過，工業化所興建的石化廠、煉油廠和核電廠所帶來的必然是與環境爭地和相當程度的汙染。

1979 年 3 月美國三哩島更核電廠發生意外，引起國內學者對於核電廠的省思。如：「核能發電危機之再思考」⁵說明台灣地狹人稠並不適合設立核電廠，加上輻射廢料的危險性仍是當時科學無法排除的問題。同年另有「關於汙染問題的質詢」⁶表示台灣內部已成為公害地區，建議政府不該偏袒企業家，一方面將衛生署設為衛生部以獨立作業，另一方面當積極改善汙染防治設施、並擬定公害賠償法。黃順興認為只要政府重新訂定汙染標準，強制工廠遵行，在不威脅利潤下工業仍然得以增長。。

1980 年後，地方上對於公害建設恐懼的反對聲浪逐漸擴大，像是核電廠的輻射傷害已經造成員工死亡⁷，地方上桃園大潭村高銀化工鎘汙染和台中大里反三晃農藥廠也陸續投遞陳情書，表態工廠帶來的毒氣和廢水已傷害民眾的身體健康，應立即遷離⁸。同時包括黨外人士和民間知識分子結合許多對國家批評的文章及揭露各地零星的汙染事件，像是《人間》雜誌、《前進》週刊、《新環境》等等。透過學者和知識分子開始將環保意識和民間抗爭整合為文字論述和問題化，所謂「公害」的概念才因此而普及大眾。

八〇年代自力救濟運動，在當時的觀察者楊渡來看其實是官逼民反，也就是在威權體制下累積的不滿情緒，加上汙染事件頻傳，危及當時仍屬於農業社會的台灣農漁民，因此反抗的聲音和行動較易跨越階層而獲得認同。

⁵ 何能，1979，《中華雜誌》191 期，頁：24~26。

⁶ 黃順興，1979，《中華雜誌》191 期，頁：22~23。

⁷ 1984 年核三廠汽車課輔基股股長突然昏迷並在三個月後不治死亡，其中核三廠試圖隱瞞病因，原本承諾照顧家屬給予工作也未能兌現。(此文由死者太太口述)。收錄於楊渡，1987，《民間的力量》。

⁸ 收錄於：施信民，2006，《台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頁：40~110。

從當時的社會結構和背景來看，台灣戰後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促使一部份人資產化，另一部份的人則無產化，且新興的中產階級亦逐漸產生。工業對農業部門的擠壓迫使農村人口外移，社會中出現工人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等後來成為反對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⁹。另外，七〇年代末黨外人士集結，拉攏中下階級的人民進行群眾運動，雖然威權體制對內控制未有放鬆跡象或意願，國民黨在外交上卻面對政權正當性的衰退及反對人士的組織化的威脅，因而國民黨的威權體系確實產生鬆動的現象。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和政權轉移確實為內部累積的社會力釋出預備的機會。

李丁讚、林文源則認為這些威權鬆動及社會力轉化的解釋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外燬方式，並未能真正觸及社會力興起的原因，也未考慮民間部門自主性¹⁰。因此，李丁讚、林文源回到七〇年代的論述，考察當時的報章雜誌，發現七〇末至八〇初「外力」¹¹介入非常有限，也就是在早期自力救濟行動中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參與並不明顯，草根民眾和地方行動者才是抗爭運動的起動者。自七〇年代開始汙染事件頻傳所累積人民的不滿情緒，由受苦的身體到受害的身體，最後出現不可侵犯的身體，也就是權利感受的出現(ibid. : 160)。因此，他將這股力量視為民眾自發性抗爭，是一種「純」社會力¹²。李丁讚等人試圖證明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在環境運動中發展出權利感受，明白自己是受害的主體及向上爭取權益，是因為威權體制長期壓迫下的情緒累積，所以自力救濟來自純草根逐漸權利化的身體。

草根人民作為動員意識和自發性抗爭的開創者，但是九〇年代以後，社會運動以組織建立、專家介入、專業性的運動組織取代群眾路線。社會運動的體制化過程，雖然讓社會力更有效率、更有秩序和理性，卻喪失社會力的獨立性和自主

⁹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頁：71~116。

¹⁰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歷史形成：1970~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八期，頁：133~206。

¹¹ 指黨外人士、知識分子、企業家等等。

¹² 為李丁讚、林文源所使用，代表相對於政治力、知識力的草根力量。(頁：140)

性，像是早期民眾直接的暴力衝突和行動抗爭，在領導制度的組織落實和菁英化的專業運動進行溝通協調下淡化了¹³。

李丁讚透過歷史考察反省當專家以穩健熟練的施為能力介入公共領域，民眾便失去參與和學習的機會，公領域成為少數專家的論述場域，而社會大眾則被排除在整個過程，民主的社會基礎也因此被掏空，社會力的活水也逐漸枯竭了¹⁴，這是九〇年代以後社會力馴化的過程。

何明修以同樣的理論基礎挑戰環境運動中過度渲染知識分子角色的歷史解釋。認為知識分子做為知識創造、傳播和再生產的角色，可稱之為文化詮釋者和運動組織者，「但當事者的反抗則是基於**自身的直接經驗**¹⁵，因此要如何將抽象論述與個人經驗連結起來，以形成具有動員能量的抗爭意識？」(何明修，2006：34)

透過 1986 年鹿港反杜邦事件中，知識分子談「我們只有一個地球」¹⁶轉化為地方組織者所詮釋的「我們只有一個鹿港」，因而得到「草根民眾雖然不具備知識分子的創新能力，卻能夠成功地扮演『再詮釋者』的角色。透過他們的**草根拼湊**¹⁷，巧妙地結合普遍論述與地方脈絡，從而提出一套有效的動員意識。」(何明修，2006：35) 何明修則更進一步提出群眾能透過自身經驗自發地培養出抗爭意識。

「何文」認為生態保育事件和反核事件當中的專家學者：馬以工、韓韓、林俊義，他們擁有良好學歷，能夠出席關鍵性的會議，形塑一定的社會輿論力量，但是為了避免介入政治和接觸太敏感的議題，讓他們在環境運動初期扮演啟蒙教育和政策建言的角色，這是他們的貢獻也是侷限。何明修批評環保文學的論述和架構只看到汙染卻沒看到直接承受汙染的民眾，認為就環保文學來說，公害幾乎

¹³ 李丁讚、林文源，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2 期，頁：57~120。

¹⁴ 同上，頁：112。

¹⁵ 原出處 Marx and Useem 1971：92。黑色粗體為《綠色民主》一書中所加著。

¹⁶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為 1973 年韓韓和馬以工所共同撰寫。

¹⁷ 黑色粗體為原文所加註。

不存在，也沒有受害的行動主體，因為著重景觀維護和生態價值而與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產生距離，它們是環境運動的浪漫路線，對真正的環境運動似乎沒有很大的幫助。包括解嚴後，由馬以工、柴松林主筆的《新環境》雜誌並未對環境汙染做出實際行動，只標榜溫和理性的風格從事教育而非運動。反核專家也是在觸碰政治禁忌後才從理念人轉變為政治人的參與¹⁸。

接著又以《生活與環境》¹⁹和《前進週刊》²⁰黨外雜誌為例，何明修認為《生活與環境》的目的是要推動草根的環境運動，展現黨外知識子想要接合反汙染民眾的企圖，但因雜誌第七期內容開始呈現中國民族主義的色彩，環境報導減少，黃順興也投靠中國，整個雜誌就解組了。而《前進週刊》則主要吸收西方先進的生態學思潮，仿效西德綠黨模式。但是這群知識分子雖然較願意以群眾示威方式要求政治改革，但並未直接涉及各地的環境抗爭，而是以啟蒙者的姿態宣揚生態理念²¹。

另外，透過三晃、李長榮、杜邦和核四案例為解嚴前的環境運動背書，強調環境運動不是政治反對運動的附屬產物，而黨外人士只是環境抗爭風潮的追隨者而非創造者，從而否定黨外人士和自由派是環境運動的催生動力。又對於當時的專家學者的保育知識、反開發主義、反科技迷思並沒有真正引發社會運動給予批評，認為知識分子是在教育民眾，「愛惜自然」或是「反對科技獨裁」是保育論述與反核論述的典型現代性產物²²，是知識分子立基於理性、民主、進步的普遍性價值，與草根人民高度附著的鄉土認同、堅守家園分道而行²³。

¹⁸ 同上，頁：38~50。

¹⁹ 《生活與環境》，黃順興創辦，1981~1982。

²⁰ 《前進週刊》，1983~1988，後來也以《前進世界》、《前進廣場》、《前進時代》、《前進》、《向前看》等名義出版。

²¹ 同上，頁：55~56。

²² 我將說明八〇年代初期「愛惜自然」、「反對科技獨裁」的論述並非現代化產物，也不是虛空的概念，反倒是當時社會現象的表徵。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藉由韓韓和林俊義的論述將它們放回歷史脈絡才能找回作者的原意和時代意義，而我認為國內環境研究普遍從《寂靜的春天》一書衍生的保育觀和西方理論下北方荒野保育與南方生計維護的類型區分，反而更容易落入現代化謬誤，不但無法從自身的歷史去理解環境運動的演變，不正視我國被殖民國的身分也就無法在「去帝國」的層次上來反省。

²³ 何明修，2006，頁：78~85。

解嚴初期，環境運動的擴散是依賴運動者所建立的組織網絡，但後期「環境運動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不一定需要專業運動者的參與，民眾本身也可以發動一場環境抗爭。」(ibid. : 148) 雖然在八〇年代末，執政者採取壓制使環境運動受到擠壓，但是在 1991~1992 年環境運動採取與民進黨政治聯盟的策略，共同對抗威權主義的復辟。

進入九〇年代後，由於民進黨的轉型，環境運動逐步減低其政黨傾向，轉而向其他政治人物招手，1995 年一群環保聯盟的核心運動者開始籌備「綠色本土清新黨」(簡稱綠黨)，但因受到民進黨勢力的牽制，而無法實現社會運動自主性理想²⁴。另外，政府在九〇年代後，若干的環境參與決策制度都逐開放²⁵使環境運動者獲得局部性的參與管道，環境運動也透過環境公投、社區主義和綠色投資等策略以促成環境民主化。在這些過程裡，由於環境運動的數量仍然頻繁，也需要群眾抗爭為手段，所以何明修反向而行，認為環境運動在九〇年代並未衰退，草根民眾也沒有被專業化的知識分子取代，反倒是台灣民主化、制度化的表徵，意味「運動不再是有賴於外在力量與資源的持續挹注，運動組織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動員。」(ibid. : 178)。這是他與李丁讚不同之處。

李丁讚、林文源和何明修透過歷史來反省當前社會運動中知識分子、專家、民進黨與民眾的關係，他們共同認為社會抗議的開端不是始於外來組織的成立，而往往是群眾自發性的反抗。群眾不再接受以往遵守的制度規則，舊制序的失效就是社會運動的第一步，外來組織通常是在群眾抗爭之後才出現的。

雖然台灣的鄉村確實有其凝聚力，如：地方認同、宗教力量、社會關係等等，作為傳統社會連結的基礎²⁶，並且也在環境遭受外在壓迫時成為地方組織起來對

²⁴ 同上，頁：195。

²⁵ 例如：199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而執政者對抗議處理轉向例行化與地方化，開啟原先封閉的抗議空間，最後民進黨不再堅持原有的環境主張，轉而討好資本家，則是環境運動脫離政治運作而更能擁抱社會大眾的契機。雖然由上而下的改革固然可能促成環境民主的進一步實現，但是環境運動需要審視其與政治體制的關係，執政者的態度與承諾是善變的，地方應保持自主的施展空間。(同上，頁：155~178、348~350)

²⁶ 關於傳統社會透過宗教、儀式認同帶來的社區集體行動與環境抗爭，請參閱：呂欣怡，1992，《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抗外侮的精神武器。然而，強調草根民眾的自為能力和自有資源，以及人民具有創新的抗爭方式和對知識言語的再詮釋能力，都是欲將知識分子和草根民眾作出區別。我認為這樣的區隔和分析窄化了知識分子和草根人民的互動空間，並且不論是透過文化、美學的或政治、經濟的分析策略，強調草根民眾主體具有主動積極的意義，或嘗試以去歷史化的方式來解釋這股環境動力的形成與轉變，都透露出論者對於現下台灣社會，特別是 1990 年以及 2000 年後²⁷環境運動數量驟減，無法召喚出如八〇年代一般形成有效的抗爭意識與社會力量，而訴諸草根民眾「自發性」、「能動性」的期望²⁸。

何明修等人的研究將自力救濟運動的動力單向歸因於草根居民有自主能動性和再詮釋能力，其實也就失去對八〇年代環境運動的整體觀看，無法對八〇年代的環境論述給予歷史化解釋而只能機會主義地使用或是批評。我認為環境運動不論是生態保育觀或是反公害自力救濟，在八〇年代初期展現的是不同階級開始對社會產生質疑而進行的反抗的行為，包含專業學者開始注意到環境永續的概念，及直接與公害污染有所衝突的一般人民。另外，透過八〇年代的文獻，我發現知識分子和報章雜誌媒體的**論述**在生態知識與污染事件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透過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給予八〇年代環境運動的抗爭主體更大的想像空間，包括直接受害居民、環保人士、知識分子、社會菁英(學者教授、醫生)、媒體(記者、報章雜誌)、黨外人士(包含日後的民進黨)、學生、利益團體、非利益團體(NGO、社會福利機構)等等。如：楊渡和楊憲宏等人、包括《人間》雜誌的文章，都不是遠經驗的描述，他們都實地走訪地方和參與運動抗爭，並結合對於整體社會的觀看與批判，這些論述不只豐富八〇年代的環境運動，也將地方議題擴展到反對國家親美發展主義及功利主義的理論高度，讓我們先稍微回顧一下這

²⁷ 請參閱圖一。

²⁸ 這包括將環境運動是否能持續性發展的責任放在草根民眾身上，期許他們能成為運動主體。但因為底層人民通常直接面對的生計問題，所以在環境運動中未必會站在反對開發的立場，反而使環境保育人士、學者和知識分子與民眾產生分立，認為草根民眾缺乏動員基礎，在環境運動或民眾身上找尋可能的「人民」、「行動正義」、「公共領域」、「集體意識」和「民主化」。這種轉向民眾的期待，不但擴大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差距，更是知識分子自我縮減解構現代化意識形態、國族主義、與民眾站在一起的責任。

段歷史吧。

1.3 八〇年代的反公害論述

隨著台灣工業化發展相應汙染事件的擴大，1980 年初期桃園大潭村高銀化工鍋汙染及台灣西部從南到北難以回復的海岸線，自大里反三晃藥廠開始，汙染和死亡事件逐漸擴散，恐懼和憤怒開始蔓延在台灣各個鄉鎮。藉著《人間》雜誌、楊渡、楊憲宏等人用雙腳走入人群，用他們的手和筆將所看所想都記錄下來，並開始經由反公害事件質疑台灣經濟發展背後親美資本主義的道路，是否是台灣經濟所需要的？他們對於第一世界聲稱的科技文明感到疑惑，實行在台灣土壤上帶來的竟是如此嚴重的傷害，並且也犧牲農民漁民等人的生存權益。如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台灣農業和傳統產業在發展主義中皆受到衝擊。楊憲宏在《走過傷心地》一書中反省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科技轉移的神話背後，就如木馬屠城記一般的危險。工業化所帶來的不只是汙染，更是社會結構、文化和生活的改變，楊憲宏指出許多第三世界常常對這個「木馬」²⁹相當依賴，而這樣的依賴和接受是需要反思它帶來的後果和代價。最後他呼籲環境問題是需要大家從日常生活中去關心觀察的，一個老農人就是最好的環境行動家。而知識分子和利益團體精英分子有責任打破社會上「不允許討論」的迷思，並創造出「民情鼎沸」的客觀環境，藉由輿論給予政府壓力。他深知能夠解救台灣環境的只有政府，而知識分子的工作就在於催促政府執法也催促民眾意識(楊憲宏，1986：107~132)。

1986 年鹿港反杜邦開啟反公害自力救濟運動的典範，它代表社會對政府漠視長期汙染的憤怒與反撲，在此時找到反擊的出口。反杜邦運動影響力的原因在於 1986 年之前國內外已經累積許多公害汙染的論述，工業化後的台灣逐漸面臨汙染的真實性，汙染觸及的生態破壞、疾病死亡和養殖業衰退已經層出不窮，並且為人民帶來極大的恐懼和生存威脅³⁰。其次，杜邦為美商公司儼然就是先進國

²⁹ 楊憲宏在《走過傷心地》中所指稱的「木馬」是比喻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將工業技術和科技轉移至第三世界。

³⁰ 「工業汙染已造成台灣西部沿海地區(從彰化、雲林、嘉義、台南和高雄)養殖業的重大災情和損失，台南七股的文蛤開口翻白、肉身腐爛；高雄茄萣的牡蠣變綠暴斃。並且在沿海的魚塢、

家在第三世界的科技移植，當時的環境論述中也有許多反省西方文明和工業發展的思想，結合了當地人們直接的受害經驗成為一股力量，也為反杜邦運動召喚出不同的族群，像是醫生、記者和在地及非在地的學生的投入，他們奔走在地方和政府，積極地發傳單、辦演講、做記錄、收集民意壯大了此運動聲勢，也將環境保護意識由鹿港擴及全台灣。加上美商公司比起台化、三晃工廠等在地工廠是更缺乏與地方派系、利益團體和政治人物打好關係的機會，這些因素是鹿港反杜邦事件能夠持續擴大並且結合許多抗爭主體的原因。

八〇年的環境運動，民眾主動為其生計生存揭竿而起，面對公害威脅及其背後的政經結構在解嚴前就有許多論述和行動產出，有別於八〇年代初期零散的自力救濟，鹿港反杜邦事件此時亦具有「反帝，反美，反汙染」的思想意涵，對帝國主義和跨國公司的批判高度為台灣反公害模式樹立一個里程碑(楊渡，1987)，多元論述和主體合作讓鹿港反杜邦不單單只是鄉土保衛戰。

同樣將反公害汙染提升到反美帝思想層次的，還有八〇年代初期的環保文學。1983 年馬以工及韓韓撰寫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³¹透過環境議題表達對現代化的反省、對鄉土的眷戀以及對中國民族性的重視。

論者以為墾丁、淡水紅樹林都是自然保育區，工廠不能為了私利而汙染了「我們公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自然生態屬於公共資源而非少數人或政府所有，私人資本對自然的濫墾濫伐，顯然並未具有永續經營的概念。

「正確的觀念應該是這樣的，這所有未登錄地、河川、海洋，甚而空氣都是我們大家的，也就是『公有的』，並非政府所有，亦非私人所有，是屬於全體國民的。這樣一來，誰破壞了這些東西，就是破壞了全體人民的財產，這樣我們才

蚵棚和鹽田對比的是數支高大的煙囪在夜空裡噴出一道道的黑煙...讓人具體地感受到台灣工業發展的腳步，早已入侵到這個原本寧靜、恬適的濱海鄉間，而且毫不保留地、盡情地在欺凌這一片土地、水質、空氣和生態。」汙染好像要把寧靜的濱海鄉間給淹沒了，原本的生活形態也成為泡影，以致於濱海阡陌相連的景色成為廢墟。「...年輕一代鄉民都不願承繼父業，所以高雄這兒的傳統鹽場也面臨斷絕的命運。民國 74 年興達火力發電廠已向鹽場置下 100 多公頃的土地，百年來曬鹽的傳統景觀，恐怕也將因此永遠消失了。」(王家祥，1986)。

³¹ 其實早在 1981 年元旦《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系列的台灣生態保育問題就刊載在聯合報副刊。(陳昭瑛，1995，頁：23)

能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說：工廠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經濟算盤把毒氣放出在『我們公有的』大氣之中。同樣的，發電廠也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發電成本，把冷卻用的熱廢水排放到『我們公有的』海洋中來破壞「我們公有的」軟珊瑚群落。」³²。

韓韓認為工業發展過度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平衡，並且批評現代功利主義「征服自然，宰治世界」的觀念，論者提出這樣的質疑：「能源危機告訴我們大自然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再者，成長和進步是否是一個絕對價值，在今天愈來愈值得懷疑。工業發展，人類好逸惡勞的貪婪造成了各種生態環境的破壞。」³³。

最後論者提出非常進步的見解，認為「生態環境問題到最後只是一個對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和『現代化』反不反省的問題而已。」³⁴

雖然環保文學較少體察社會面向以及對底層人民的直接描述，但是卻透露對台灣工業化已經對環境破壞到達一個臨界點，而且這些傷害還包括面臨現代化經濟與傳統生活方式之間的掙扎，以及身為(在台)中國人面對現代化思想下的認同問題。韓韓她的文句當中不時透露對台灣在地的認同與情感，以及對西方世界體系採取的某種距離。她引用中國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和文化來說明儒家親近自然與和諧，柔聲訴說：我們中國人有我們的思想傳統，就是要將自然資源留給子子孫孫。

檢討現代工業化體系和衍生的公共價值有助於知識分子反省現代、進步、工業化等西方的價值體系，雖然此處的疑問並沒有被更深地討論，也還未對「人」有深刻描述，而是傾向反省西方功利主義和資本主義，且試圖號召生態平衡觀念的普及和一種中國儒家和諧的生活哲學。但是這時期的環保文學不僅是與中國文化民族的思想連結，還具有反西化、現代化的性質。所以當時的環保文學對「公

³² 韓韓，1983a，〈紅樹林生在這裏〉，《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17~32。

³³ 韓韓，1983b，〈滄桑歷盡—寫我們的北海岸〉，《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55~70。

³⁴ 韓韓，1983c，〈我們只有那一片沙—給我的孩子和島上所有黃皮膚的子子孫孫〉，《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259~271。

害」是一個高層次的想像，是建立在中國「我們的」主體想像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功利主義有所區別。

另外，對污染地的居民而言，「公害」是真實的傷害，污染引發的併發症也帶來深刻的恐懼，「公害」更是現代化工業擠壓農業、拆解傳統鄉村生活的衝突過程。但不論是環保文學或鹿港反杜邦事件，其內在反美帝、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架構是彼此相通的，顯示「公害」現象不單指向污染而有更深更廣的層面。

由此看來，反公害運動與環境保育的概念，實際上鑲嵌在台灣社會變遷中的歷史過程，包括跨國資本主義和現代化意識的入侵、國民黨在政治上威權統治，在經濟上工廠林立的发展主義，在社會文化上進行白色肅清，以及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運動及思潮變遷。

因此，透過八〇年代鹿港反杜邦事件和反西化的環保文學，本文開啟幾個對環境運動歷史的問題。

- 第一、 如何解讀政體鬆動前(解嚴前)，民間興起的自力救濟運動和環境論述？除了政治力解放的結構因素、民怨累積情緒的內在因素之外，需要將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都放入整體脈絡中來考察。
- 第二、 在民間自力救濟興起之前，八〇年代初期(或更早)有那些反公害的環境論述？其論述反映什麼樣的當代議題和社會思想？又有什麼樣的轉變？
- 第三、 知識分子既然不是和群眾切割，那麼他們和民眾的關係為何？八〇年代的社會思潮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如何介入反公害運動，又如何發展成反帝反美的論述？
- 第四、 八〇年代初期的環境論述和環保文學具有對鄉土的情感及中國民族性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基礎，如何在九〇年代後由「本土的」、親美反中的、台獨民粹的政治正確所取代，而失去對人與土地的關懷？

李丁讚、何明修等人的論述固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與專長中有其效力，卻無

法完全解釋環境運動或自力救濟在解嚴之前的發展與成因，尤其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初期的環境運動中，知識分子與草根人民並未明顯切割，而是發展出具有第三世界觀批判的理論高度，因此，若要解讀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初期環境運動的主體內容與行動狀態，我認為就有重新回到歷史探索理解的必要。

1.4 研究方法和論文架構

「任何社會運動都不是在真空狀態中運作，它必源於既定的制度化結構，又作用此結構，以期既存結構之改變。也就是說藉著社會運動的發展，過去隱而未顯的問題被呈現了；也正因為這些問題被呈現，更迫使我們必需嚴肅地去再檢視既有的社會結構，於是，透過社會結構與社會運動間的關係、變遷與慣性或墮性間的聯帶的掌握，也許能較佳地了解到我們生活世界的變及不變之所在。」³⁵。

承續上面的問題，為了更加理解八〇年代初期環境運動及論述在歷史中的脈絡與發展，我從環境論述開展初期(約七〇年代中)，開始探討它們發展的足跡。本文蒐集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初期的環境論述和分析，並試圖整理七〇至九〇年代的環境論述，以及其背後的歷史意義的變與不變之所在，主要說明七〇至八〇年代的環境論述為何，它與九〇年代以後的環境論述有著對人、土地、階級、國家和歷史觀看角度有著本質上的顯著差異，並且本文透過歷史性的考察，將環境論述放置在當時政治經濟和思想社會的時空脈絡中來理解，同時結合其他社會與文化的論述，環境論述不只是單一對生態、對自然的研究，而是連結人與土地，關乎人要怎麼生活？怎麼管理自然資源？的研究。

七〇至八〇年代，《夏潮》和《人間》雜誌的環境論述更說明在「公害汙染」的背後，其實是中國近代史中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傳統文化的消逝與西方資本主義中人與自然對立的思想侵害。而這樣一種將台灣與中國放置在第三世界視角的立場出現在《夏潮》與《人間》雜誌，構成了七〇至八〇年代反西化運動的思想路徑。

³⁵ 高承恕，「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收錄於《臺灣新興社會運動》，1989，徐正光、宋文里編。

同時，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思想結構中，除了《夏潮》、《人間》體系的左翼思想，也發展出以中國為對反、親美、反威權的歷史意識。1971 年的保釣運動、台大校園的民族主義論戰和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代表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意識消長的分水嶺，在現代化思想不斷增長下也深刻影響台灣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對主體、歷史的看法。

台灣早期的生態學家林俊義曾發表大量的環境論述，分別刊登在《環境科學通訊》和《夏潮》雜誌。透過這兩本雜誌的內容可以拼湊出七〇年代逐漸工業化的社會樣態，前者代表官方在工業化同時所進行的都市計畫和汙染防治措施，而後者則是以宏觀的經濟、政治分析來揭露冷戰體制下的台灣公害問題，進而將反公害事件提升至「思想公害」的反省層次。林俊義的論述也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公害輸入及農業政策提出警告，認為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所引起的環境汙染是第三世界國家深受科技移植主義的結果。但是林俊義留學國外和其科學知識的思想背景，其論述的內在核心在於反對當時的威權政府，因此他的論述雖然曾經出現在《夏潮》雜誌，也曾正氣凜然地將台灣汙染視為強國公害「輸入」、揭露台灣與美、日關係的第三世界附庸國家角色，但是對於台灣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始終以一菁英式、第一世界的觀點來檢視，而失去對於台灣土地和歷史的理解。

八〇年代末後，環境論述的在地精神和鄉土關懷，隨著左翼思想中挫、現代化西方理論和黨外運動興起後也產生轉變，透過林俊義及《夏潮》、《人間》雜誌的環境論述及其思想演變的兩條路徑，說明冷戰體制對戰後台灣的社會運動、行動主體與知識思潮的深切影響，包括知識分子如何解讀中國近代史、台灣與中國的關聯性和對台灣主體的認知。

另外，在寫作方法、文獻回顧和歷史述事的部份，本文採取夾敘夾議的方式，作者主要以**論述**為研究和對話的對象，為了使寫作能更完整呈現，故在方法上有所調整。而有別於國內其他環境論述將《寂靜的春天》一書視為環境運動創始的現代風潮，我認為環境運動和論述的演變更需要一個扎根在台灣歷史的觀看。因

此，本文將環境運動和論述放回當時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環境運動不再只是單一事件或是環境議題，而是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思想的一環。所以本文內容雖然以環境論述和運動為分析對象，但同時也著重戰後台灣歷史與思想的發展和演變，將環境運動放在較大的架構叢中來解讀，說明在環境議題之餘，我們要面對更廣更深的政治經濟結構和思想問題，包括如何重新理解戰後台灣的環境運動史和論述，要避免先入為主、理論先行，放置在中國近代史與第三世界視角的必要性。

論文架構如下：

首先，本文對戰後台灣在冷戰、國家安全與民族分裂架構下政治、經濟與思想的社會樣態進行簡單的回顧。

戰後台灣，自五、六〇年代在冷戰與國家安全的反共意識中全面進入資本化社會，工業化在國家建設的推展下產生普遍性的汙染現象。七〇至八〇年代，由《夏潮》和《人間》雜誌的環境論述反映出具有宏觀政經分析的知識思想和軌跡，說明環境運動不僅是嵌入在當時的社會結構當中，也結合當時的思潮與人文價值觀。

當時逐漸工業化的台灣社會，陸續出現汙染情形以及相關的官方論述，像是 1974 年出刊的《環境科學通訊》由東海大學發行印刷，內容呈現政府在工業化的政策初期，開始實施防治汙染的各項措施與宣導。另一方面，1976 年《夏潮》雜誌將環境議題與保釣運動的左翼思想資源結合，發展出具有第三世界觀的反資反帝論述，其意識在於恢復中國民族性以及中國和台灣的關聯性。此時的环境議題也從汙染現象提升到反西化的「思想公害」，進而展開一連串的思想論戰，成為 1977 年鄉土文學的先聲。

我將針對《環境科學通訊》的環境議題闡明官方論述是對工業化的現代化路徑鋪路，但是國家安全、依附美國政治、經濟所引進的發展計畫已造成許多汙染現象。接著以《夏潮》雜誌的內容為主，分析環境論述在《夏潮》的歷史意義代表中國近代反帝國的過程，因此，聚集在《夏潮》的「反公害」論述才具有「反

西化」的性質，並且與保釣運動中的左翼思想、鄉土文學思想彼此相通，邁開重建中國民族主義的步伐，與主流的現代派、自由主義學派在歷史、思想和對人與土地的關懷形成左、右對壘。這是本文的第二章。

而延續《夏潮》思想的《人間》雜誌在八〇年代透過對地方的報導匯集豐厚的田野記錄和照片，並且《人間》雜誌不只將反公害運動作為行動實踐的意義，而是反省跨國公司、現代化造景下我國傳統文化、倫理、人文價值的喪失。從《夏潮》至《人間》雜誌的知識分子都有一自覺，隱藏在汙染事件、環境運動、農工問題和傳統生活驟逝背後，是跨國公司新殖民主義的經濟圈的擴張，而這是台灣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共同面對的處境。

第三章，七〇年代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至八〇年代則以馬以工、韓韓的環保文學和《人間》雜誌的在地報導展現對台灣土地的認同與關愛。八〇年代初期的自力救濟運動更是在地農、漁民的主體抗爭行動，是對帝國主義、黨政勾結下的現代化工業和人文精神喪失的集體反動。

我同樣對八〇年代初期的環境論述進行爬梳，包括林俊義、韓韓和馬以工，透過他們的論述和文學作品反映當時工業化下農業逐漸萎縮的問題，同時試圖建立起一種以中國為本，考慮我國民族性與地域性的現代化和思想路徑。

然而，中國傳統思想在現代化意識中延續下來的很有限，加上發展主義擴張帶來對繁榮富裕的消費欲望，改變人對生活、環境和人文價值的看法。《人間》雜誌便是揭露八〇年代各地方人民的汙染、抗爭實況，同時指出唯經濟發展的理念破壞人性和文化，人的需要和精神價值都埋葬在成長崇拜裡。而《人間》雜誌的歷史意涵代表人民抵抗現代化、新殖民主義的過程，是戰後台灣將近四十年的獨裁政治與資本主義下美、日、台的三邊分工關係。

不論是《夏潮》或《人間》雜誌，其內在的中國民族主義不是一味中國化，而是具有在冷戰、國家安全和民族分裂結構，對台灣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的徹底檢討。然而，中國民族主義在七〇年代後期隨著黨外勢力發展而成為台獨意識的對立面，在高舉「台灣人」主體的意識形態下，認為這是「空想的漢族主義」、

「中華沙文主義」等，喪失培植左翼思想、建立國民性認同的土壤。

八〇年代末，環境論述興起的环境人權、體制內改革、反威權運動，在冷戰構造和現代意識霸權下扭曲的歷史觀及意識控制，戰後知識分子沒有從在地深耕的知識基礎可繼承、可抵抗，只有被吸納進入一種崇美、仇中的「本土」意識。失去自《夏潮》以來左翼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和三民主義的分析架構。

1987 年解嚴之後，各種基於階級、社群、性別和地域性的新興社會運動出現，都宣告台灣步入一個「差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抬頭的年代(黃麗玲，1995)。同時，八〇年代後期興起的學生運動和各種關懷鄉村、服務人民的青年文化，發展出一種菁英化、格式化的社團活動，加上黨外運動蓬勃發展將反體制、反威權和妒恨中國的台獨思想注入，形成八〇年代末各種社會運動的基本模式，主流思想逐漸偏離自保釣運動以來，讓人初見帝國主義與現代化意識霸權，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與中國革命歷程，開始思考知識分子、民眾與社會改造三者之間深刻複雜關聯的社會意識(趙剛，2010)。

第四章，本文將以環境論述中浮現的「本土」意識、綠色革命、綠色生活哲學，說明不同程度的台灣人與台灣意識建構出的本土論述是立基在「反共到反中」、「統獨分立」和「去中國化」的歷史哲學思想。反對黨國的特殊威權和二元分化的立場使台灣的中國認同再一次陷入歧路，而在台的自由主義學派因為其內在反共親美、現代化意識和不質疑資本主義發展，無法不支持九〇年代由國家號召的妒恨政治和民粹主體。然而，九〇年代後的「本土化」運動實際上是七〇年代左翼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對人民、土地關愛的思潮之倒退。同時，國家勢力也正悄悄興起，試圖打造國族認同建立一個沒有差異的「生命共同體」。以國家主導的想像共同體模糊了「國家」與「人民」的界線，社會改革者不再反省自我與時代之間的糾葛，對於土地與民眾給予高度的菁英姿態介入，在思想上一併流入反共親美、台獨民粹的政治正確架構。

透過歷史分析和對環境論述的細緻整理，我發現在《夏潮》與《人間》的思想架構是連續的，並且內容的環境論述不僅是台灣反公害實錄，反映戰後台灣在

政治、經濟、思想的脈絡，更是記錄台灣抵抗外侮、發展民族思想認同、試圖克服兩岸分立造成的歷史、文化和思想斷裂的歷史近程。這個具有豐富人文思想、道德關懷的論述不能單以「左、右」立場來解讀它，而要放在普遍第三世界國家對冷戰、(新)殖民主義、工業化、現代化下第一世界國家霸權的反動、抵抗，而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台灣的社會問題、反對運動及思想演變正是此過程的多重展現。

第二章 思想蓬勃的七〇年代

(一)、戰後臺灣

1939~1945 年二次大戰爆發，日本戰敗退出台灣，終於結束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殖民時期。當時台灣島內人民舉目期待回歸祖國，卻在陳儀政府的貪腐、專制與國腐戰敗退台後的恐共心理進行全面鎮壓而轉為苦悶與幻滅。1947 年台北市稽查私煙的官民衝突，引發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改革櫻的民眾蜂起，卻結束在國府嚴厲的鐵血鎮壓，「二二八」事變開啟台灣社會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

1950 年韓戰爆發，國民黨選擇納入美國全球反共的附庸國家之一，臺灣島內則在中國內戰、二二八事件及冷戰體制下進入反共的政治肅清與打壓，而與美國的依附關係則由美國挾持其反共霸權積極介入台灣的政治經濟政策。

經濟上，從 1949 年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走出土地改革的第一步，1951 年實施公地方放領與 1953 年耕者有其田，是美國為消除亞洲共黨蜂起的溫床與農村階級下的策略，土地改革成功地引導土地資本到現代工商業，小自耕農因擁有新得土地而產生高昂的生產勞動欲望，加上美國在農業技術與資金的援助，使台灣農業有急速性的發展。

六〇年代台灣的紡織、電器、電子、水泥、食品等輕工業在美日經濟圈開始有了高度發展，將五〇年代巨幅提高的農業剩餘以低米價、肥料換穀制度和各種租稅大量流向工業部門。1962 年後，農民在農業生產的支出暴增導致收支不平衡，1968 年製造業產值急遽增加與農業衰退，首次出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至 1969 年，農業終於出現負成長。

工業部門吸取農村的剩餘與農民進入工廠成為勞工階級，使農戶土地快速零細化、農村青壯人口外流比率驟增，其中以農村外移女性為主的勞動力在紡織業、成衣業、電子業等投入最多的社會生產。女工勞力密集的電子業逐漸發展，同時電視、電子與電器產業蓬勃發展，美國跨國性電子產業來台設廠，帶動外資在台電子組件的生產與外銷。台灣國內的中小企業體吸收更多農村女性勞動投入

低工資、工作單調、環境簡陋的勞動場所，造相當嚴重的問題。

同時 1960 年末，台灣由內需性、進口性產業取代之工業轉而發展為加工出口型工業，為外國市場所要求的質與量來生產、提供廉價工資，美、日兩國成為台灣最大輸入國，使台灣更加牢固地整合到美、日的垂直分工體系中。

加工出口工業使台灣輕工業因外來資金與技術的催進而有飛躍性成長，以吸納外資為主的加工產業造就龐大中小企業與獨佔公營大企業形成雙重結構。然而，依賴與發展並濟的經濟政策雖然在外銷上有驚人的成長，卻帶來台灣社會結構上根本的變化。自土地改革後創造出沒有地主的廣泛小自耕農與馴化的階級關係，在農消工長的產業策略下農村人口外移產生大量的工人階級，在低廉工資、簡陋的工作環境，缺乏政治、社會、人權的保障，他們的血汗犧牲是七〇、八〇年代國家推動十大建設與台灣「經濟奇蹟」的成因之一。另外，工業化後對土地、水、空氣的污染，大量濫砍濫伐、開闢山林、犧牲珍貴的自然資源，種下日後嚴重的公害現象。

政治上，繼韓戰爆發後美蘇兩陣營的對峙達到高峰，美國依恃它強大的軍力和國力在亞太平洋建立對共產黨的包圍戰線，由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台灣成為戰後美國在全球反共的附庸國家之一。

1947 年二二八事變後，國府全面實施鐵的鎮壓開啟長達四十年的戒嚴體制，並且在美國強力支持下與共產大陸分離和對抗，使國府在外來勢力和內在武力的強制穩定中鞏固起來，從而長期獨佔台灣的政治權力。

五〇至六〇年代，國府展開對異端撲殺的浪潮，對左翼份子、民族解放份子、激進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和教師等進行非法秘密的逮捕、審訊、拷問和監禁，受到撲滅的人們有共產黨員，也有更多是抗日戰爭下反帝、愛國的民族主義份子，他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下策動台灣「託管」與「獨立」運動，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也是中華民族的一環。

另外，國共會戰中為美國扶持、反共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雷震，在國府退守台灣後因不認同軍黨化、特務統治與一黨獨大而與蔣介石政權產生分歧，並結合當

時民、清兩黨與台灣地方人士展開反對國府的組黨運動(中國民主黨)，國民黨恐地方叛亂而進行全面控制，警備總部以「知情不報，為匪宣傳」等莫須有罪名逮捕新黨秘書長雷震等人，這是七〇年代前政治萎縮的原因。

國民政府作為美國鞏固和發展的反共、親美、獨立於大陸的基地台灣，持續徹底的秘密逮捕，這些慘烈的政治肅清以保衛國家與社會安全的名義在思想、言論、人權、知識各方面施行全面、長期的壓制。

國府在反共、安全的政治上需要制定一套文藝方案作為當時台灣文學創作的指標，要求官方宣導單位設定創作範圍，內容上則不脫離反共抗俄的策略。同時，在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支配下，西化的現代主義廣泛影響台灣的文化圈，現代文學以晦澀、不關心生活與歷史的特質成為詩人畫家在政治高壓時代逃避現實的途徑，從 1953 年現代詩社的創辦、藍星詩社、《文星》雜誌等都在理論和創作上行事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模仿和研究³⁶。

戰後的台灣社會，經濟上以美日為附庸發展資本主義，政治上則實行全面的白色恐怖，在國際冷戰下與大陸的國土、民族一分為二的面貌中展開七〇年代，此冷戰/國家安全/民族分裂的體系深刻影響台灣戰後的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層面。

1.1 背景：

七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已略具有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雛形³⁷。1974 年蔣經國政府展開富有野心的「十項大建設」³⁸，分別在交通、能源、重化工業投入將近 60 億元，加上十二項建設和十四項建設實施三大公共事業計畫，開始石化工業、核能電廠等工廠的設立。七〇年代的經濟動態以六〇年代末略有發展的石化產業為基礎，在巨大的石化產業中投資供應長而廣的中下游石化加工產業，提高了石油

³⁶ 簡慧蓉，1988，〈舶來文藝 1950~1970〉，《人間》第 37 期，頁：66~72。

³⁷ 如農業生產額由五〇年代佔總生產額的 35% 至七〇年代降到 10%，農業人口從 56% 減少到 20%，而工業的總生產比值從五〇年代約 18% 上升到七〇年代的 45% 左右，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也從 16% 增加到 42%。

³⁸ 十大建設內容：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中正國際機場、臺中港、蘇澳港、大造船廠、大煉鋼廠、石油化學工業、核能發電廠。有六項是交通運輸建設，三項是重工業建設，一項為能源項目建設。

化學中間原材料的自給率與進口替代率，並且在六〇年代低工資、勞力密集的加工外銷產業累積的高度成長和剩餘，讓台灣在七〇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中渡過難關。此外，原有的紡織、電子、電器等輕工業外銷產品在持續擴大輸出下快速恢復，繼續在 1976 年後恢復高度成長³⁹。

七〇年代為因應石油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蕭條，台灣持續發展重工業化產業，並且在冷戰體制下接受美援，與美、日兩國在政治、經濟上形成依賴角色，美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帶動臺灣的進出口市場⁴⁰，但是高度工業化也帶來國內廣泛自然資源的破壞和汙染。工業化後，水、空氣的汙染與公害現象陸續出現陳述汙染的狀況，但普遍未直接觸及人民實際的生活層面與民眾心聲。在經濟起飛，輕、重工業與加工出口增長的同時，工業化都市化下的城市計畫、汙染防治、能源發展、環境科學和農業制度研究是七〇年代主要環境論述的內容。

當時對環境及生態學門主要是以國家主導的科技性研究，另外，留學回國的生態學家林俊義自七〇年代開始持續論述環境議題，並以生態學的角度展開反公害論述。他的論述曾出現在具有宏觀政治經濟背景的《夏潮》雜誌，以及由官方集結各種學科專員成立的《環境科學通訊》。另外，《夏潮》雜誌則以政治經濟學論述環境議題，並帶入具有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第三世界觀，將反公害擴展到思想文化的西化現象和中國民族主義恢復的重要性。本章節將對此二本雜誌的環境論述進行爬梳和歷史性的分析和比較，說明官方雜誌在環境出現汙染時採取的行動及論述反映冷戰和國家安全下的經濟措施。

1.2 國家安全下的經濟策略

1974 年由東海大學的生物科學研究中心、住宅與都市計劃中心和工業工程研究中心聯合成立環境科學研究中心並發表《環境科學通訊》⁴¹，集結國內外的相關學者來應對工業化、都市化後產生的公害與環境破壞問題。這是為因應同年

³⁹ 《人間》編輯部，1988，〈依賴與發展〉，《人間》第 37 期，頁：50~65。

⁴⁰ 「臺灣的出口企業在借助於日美貿易商的同時，自己建立起了能夠應付隨時訂貨和大量訂貨的富於彈性的供應基地。」(谷浦孝雄，1995：13)

⁴¹ 《環境科學通訊》在 1974 年 4 月 15 日出版至 1979 年 4 月份共 17 期。

國家所推動的十大經濟建設計畫，在都市化、人口成長以及日益繁榮的工業化下產生公害及自然環境破壞，由政府結合校園資源運用科技整合的方式發掘我國的環境問題，並以東西洋各工業先進國家之環境問題為借鏡，謀求解決之道，期待能協助政府及地方社會從事各項積極性之建設⁴²。

當時臺灣的環境科學研究剛起步，《環境科學通訊》成立在美國的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的支持和亞洲基金會、我國政府的農復會及省政府林務管理局對此研究的協中給予環境科學教育、研究和資訊提供討論的平台。

《環境科學通訊》第一期翻譯由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⁴³，內容在闡明人類與環境的平衡關係如何在經濟開發中應用科學和政策來改善人民的生活與資源分配。

此宣言認為人類是環境的塑造者也是創造者，人類在艱苦長久的進化過程中依賴科學技術的急速進展，至今改變環境的力量達到未曾有過的規模，雖然自然環境支持人類肉體的生存，但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皆為人類福利與基本人權，是生存所必需具備的權利。人類必須使經驗活用、發明、發現、創造及進步，賢明地改變周圍環境，提供生活實質向上的機會，但是若錯誤地使用則會為人類及環境帶來無法估計的害處。人類環境的維護與改善是影響全世界人們的福利與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是所有政府的責任。

再來，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環境問題是以低開發為其起因。成千百萬人民未能獲得充分的食料、衣著、住所、教育、健康及衛生，因此開發中國家必須應用他們的能力從事開發，並牢記他們的重點措施以及環境的維護與改善的必要性。聯合國有鑒於開發中國家的需要則表示國際組織要協助開發中國家在生態與

⁴² 謝明山，1974，〈理想與目標〉，《環境科學通訊》第一卷第一期，頁：1~2。

⁴³ 宣言共 31 條：基本原則宣言 7 條和共同的信念 24 條。內容「說明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到十六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為了維護與促進人類環境，認為有建立鼓舞世界各國人民並且當為共同的展望與原則的指標，而作了以下的宣言。」（蔡啟清譯自 Environment, Stockholm, 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t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Headquarters, Geneva, June, 1972）聯合國的環境宣言指出環境問題是全球人類生存共同面對的問題，不論是人口控制與開發中國家相對落後經濟的支助救濟。

發展的平衡⁴⁴。

此宣言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中國傳統社會有很大的不同，一種以開發為人類進步的思考及現代化的國家想像透過翻譯文獻和校園整合進入到台灣社會。

美國大使安克志在東海大學十九屆校慶時，講述東海大學建築與自然景觀清新而寧靜與大城市形成對比，「中國人對生命的看法在數千年來已有天人合一的想法。優美的校園，為了維護古代自然平衡的哲理，加強環境研究，承認現代化之需求，常能使追求理想與目前現實之間，獲致調和……。」多年來，美國人致力於東海大學的發展，倡導服務理想、經濟上支援與教育理念等，此為美國思想之主要因素。在這些條件下成立的环境科學研究中心，結合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員會與東海大學進行實驗社區計畫，學習社區發展理論、野生動物保育研究、野生動物資源與開發的管理，幫助台灣在快速經濟發展面對人類生活品質的改善和自然界的使用等等各種挑戰⁴⁵。

第一至第五期《環境科學通訊》的文章大多在環境科學、生態學上進行研究，不然就是翻譯國外已有的環境著作，建立人們的生態知識和政府政策的準則。文中指出台灣逐漸面臨開發中國家發展的各项需求，政府為了吸收經驗派人到美國做環境問題的訪問，主要重點在於了解美國環境問題和環境工作的規模、機構、人員和經費，在推行環境保育工作時如何與經濟發展相協調，以及明白社會教育和民眾參與的細節情形。學習聯邦政府內的环境工作組織與編制，執行與規畫立法單位，及與學府合作設立相關研究科系等。(馮鍾豫，1974：9~10)

馮鍾豫認為近年社會對環境品質要求越來越高，代表我國經濟情況有所改善與成長，但是因經濟仍發展的不夠安全，所以一方面要求經濟加速發展，一方面又要求改善環境，要求政府在有限度的資源裡兼容並蓄。目前台灣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有三項，分別是：一、都市汙染的防止與改善需求並進，二、人口的增加

⁴⁴ 如：共同的信念第9條：低開發狀態及由於自然災害所引起的環境缺陷，引致重大問題的提起，透過必要的財政上、技術上援助的提供以及適時的協助，以補助開發中國家自身的努力，使加速的開發可獲致最有效的經濟(蔡啟清譯，1974，頁：3~4)。

⁴⁵ 安克志，1974，〈東海十九屆校慶美國大使安克志講辭要點〉，《環境科學通訊》第一卷第二期。

與集中，使許多社區的設施不敷使用，需要有計畫地建設，三、是天然資源的過度利用或不當利用引起破壞或消耗，需設法有效保育。

第六期至十七期的《環境科學通訊》則是以這三項主題為主要探討內容，談論都市化的人口成長率、城市開發、河川汙染管制等，另外以台灣的自然資源保護、野生動物保護、森林、水源、空氣的生態研究，以及為了因應國家建設實行的相關措施，像是台中港都市計畫區、核電廠、焚化爐設備、國家公園、環境法、空氣汙染、噪音汙染等等。

在台灣不斷工業化與民生家電用電量增加的情況下，李文朗認為核子發電是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必要建設，並說明核子自動爆炸是不可能的現象，核子工業是極安全的人類文明，行政當局當轉移社會對核子工業發展的誤解作開放性的疏導和解說。「雖然過去幾年，世界各地的核子發電廠，或大或小的發生過幾件核子漏洩的事件，有的嚴重到整個工廠被遺棄封閉的程度；但是，我們敢相信，自然科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趨近完善的地步。」(李文朗，1976：12~13)

李文朗認為核子發電在台灣發展有社會配合與人文生態兩個問題。核子發電是一種特殊的工業發展，雖然政府肯出錢購買國外設備、借用他們的技術人員，但要如何維持永久運作需要科技的移植而不只是產品的租借，我們需要自力更生不必做人家科學技術的附庸，這都要考量到整個社會的配合。

另外，近年來因經濟起飛，都市化加速成長，人口明顯擁擠到台北與高雄兩個城市，從經濟功能來看都市化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但就國防安全的角度，則不甚理想。「人口愈集中到少數一兩個大都會，暴露自己的弱點，愈讓敵人有襲擊的可能。」核子發電廠的目的是滿足地區人口的能源需要，所以往往座落在大都會附近，可是太接近都市，在國防安全上是頗值得注意的問題。因此，龐大的核子發電選擇在大都會旁，有海岸、湖泊或大河流方便核子電廠排水與冷卻運作，然而這些地方通常是經濟較落後的農漁村，工業建設仍需應付農漁業區轉為商業區、土地價格暴漲、勞動轉業急劇的變化。

「李文」指出核子電廠入侵農漁村地區造成的文化衝突是必然現象，建廠前當注意抄地皮和違法營利造成的社會不均，商業遷入後的勞動轉業需要的職業訓練與交通建設不足需要的公共設施，以及建廠之後商業繁榮可能是短暫的未必能減低失業率等問題，顯示工商業化後農漁村生活結構的巨變，受到公害影響埋下八〇年代後嚴重破壞與污染的成因。

工業化與都市化確實帶來相當程度的公害污染，《環境科學月刊》便是討論都市建設與污染改善設備，包括焚化爐、水肥處理、能源回收，引進歐美國家的操作經驗與鍋爐設備，對於日漸增長的空氣、水和噪音污染則以強調訂定評估測量污染標準，並且以水道設施、排水系統、隔音設備、配戴耳塞或耳罩等方式來防治污染。

莊進源以為政府當提早推動工業技術中的「科技評估」並有效進行環境評估制度，使工廠成為無公害而合理經營的模範工廠，以最經濟有效的整體措施維持人與環境的和諧。他反對因為公害危機而主張停止工業技術發展的說法，認為「當世界大多數的人口仍過著飢餓、貧窮、污穢、困苦的生活時，已享受到工業文明的人們竟妄想拋棄促進經濟成長之鑰—工業，真是愚不可及。盲目地返回過去，並不能改善人類生活，只不過迫使億萬人重陷於苦境中而已。」(莊進源，1978：15)

七〇年代台灣的工業化以冷戰體制為背景，在美國政治、經濟各方援助和國府對外反共、內除異己的國家安全政策下推動國內大型的經濟建設，並在學者支持下提早對公害進行防治措施，提倡有效的科技控制與評估是維護經濟成長與生活環境之間的平衡法則。此時環境論述雖然還未直接描述公害污染下人民的生活現況，但政府長期以來在依附美國的政經結構中，(在現代化意識潮流下)官方環境論述也多以西方現代化路徑為依循，鼓吹建設發展將帶來進步與文明，而忽略對於人和土地的關懷。以人類不斷進步、追求成長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提供有效使用環境、無限開發的合理性，而非重視人的生命安全與民眾利益，認為工業建設等同繁榮發展，公害污染也只是「進步」與「現代」下的必然產物。

1.3 公害「輸入」實況

國家安全與依附美國的經濟和政策下引進的各種經濟發展計畫與工業建設，在七〇年代中期開始出現汙染現象。《夏潮》雜誌首度出現報導地方汙染實況的論述，並且分析臺灣公害現象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另外，留學回國的生態學者林俊義以生態社會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公害汙染並非單純的生態問題，而反映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思想狀態。這些論述同樣顯示強國公害輸出的事實，更揭露國府經濟策略背後與美、日兩國的附庸關係。

1976 年，周湧以〈臺灣工業汙染的嚴重程度〉說明了臺灣公害汙染的現況：「伴隨著科技的發展，環境的汙染和強國的擴張及商業家的貪婪，使人類面臨著公害的威脅。工業發展所導致的環境汙染，嚴重地表現在一連串的公害事件上：如一九五二年倫敦煙霧事件，一週內就死了四千多人；……等等。如今隨西化所及之處，不可阻遏地瀰漫在我們的生存環境了。」（周湧，1976：41）。

「周文」透過《寂靜的春天》一書裡瑞秋卡森女士報導令人震驚的汙染實況，對臺灣環境的公害汙染提出警訊。文中說明臺灣的汙染原因來自兩個部份：一是臺灣的公害「輸入」，主要由美、日兩國的跨國商人將本國禁止銷售的各種汙染品⁴⁶運到臺灣來銷售，還有資本家則將製造汙染的工廠大量移到臺灣來設立。

「工業霸國的『汙染出口』，最大宗的要算是日本的機車。機車所排放的廢氣是造成今日都市空氣汙染的主要因素。日本將本國淘汰的機車狂銷來臺。而比產品毒染更為嚴重的，是將那些會製造汙染的工廠大量移到這裡來。中國時報社論便曾指出：許多外國工廠，因為在其本國受到公害法令管理，成本增加，或根本不准設立，乃來臺『投資』，繼續藉『汙染』來賺錢」（ibid.：41）。

第二是臺灣工業化後製造出的公害問題層出不窮，工廠排放廢水和廢氣汙染環境，也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各種疾病和癌症病患的增加。這些汙染後果普遍刊載在報章雜誌的論述中：「1974 年 4 月 29 日臺灣時報：『雲林縣沿海發生蛤蜊及牡蠣暴斃，使每位漁民的臉上露出無限失望的神色，在半個月間，把他們

⁴⁶ 包括：DDT、農藥和機車等等。

以心血養殖的蛤蜊及牡蠣大部份化為烏有。合計被害面積廣達一千四百公頃。』、1974 年 6 月 13 日臺灣時報：『高雄獅甲國中附近工廠整日冒黑煙，學生變成吸塵器，每天被迫吸入大量煙灰，頗有窒息之感，令師生們無法忍受。』、1976 年 5 月 7 日中國時報以顯著的標題刊出：『您猜臺北市民喝些什麼？』指出萬盛溪的嚴重汙染：飲用水所含鐵與錳的容許量、鉻的容許量以及硫酸鹽的容許量，都超出了標準。而基隆河的水源汙染，則更為嚴重。」 (ibid. : 44~46)。

然而，當時的防治公害法在實行上政府不是罰得太輕就是實行的不徹底，這種「走維護工廠的路線」也引起地方立委的爭辯⁴⁷認為當百姓的利益和商人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絕大多數的立法者，卻偏愛資方，在立法上對他們多方照顧，即使損失大眾生命財產，也在所不惜。

雖然美、日兩國「輸出」公害造成汙染的事實，但是周湧也批評政府只求經濟發展的態度：「不顧一切代價的追求繁榮，其後果造成都市畸形發展，貧富懸殊，社風的侈華，人心的糜爛。以為唯有累積資本才能快速推動經濟發展。所謂『累積資本』其實就是讓鈔票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裡。…孰不知資本是大眾創造的，是集體努力的成果，而不是資本家個人資金累積的結果。任何一種事業都不能以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僅有資本而沒有勞力的話，也不會創出一番事業來。」 (ibid. : 46)

臺灣公害汙染的嚴重程度在「周文」中可見一斑，並且透過揭開公害形成的原因來反省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政府怯懦於改善汙染的決心。

當時在東海大學任教的生物系教授林俊義，首度指出當前的環境汙染並非單純生態問題，人與自然是共存的，需要看到人與社會的關係與整體性。他試圖將

⁴⁷ 在草擬「水汙染防治法」的時候，為了其中一個條款的罰則問題，「立法院」的立法者們引起了一場辯論。該草案第十八條規定違反「工廠、礦場排放之廢水，超過省(市)主管機關所定放流水標準」之規定者，科「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高雄區選出的「立委」吳基福認為「罰得太輕」…並沉痛指責「過去為求發展經濟，不惜犧牲一般國民，極力扶植、保護大企業家，甚至引起外人譏評：只顧賺錢，而置國民健康於不顧。」因而主張不能輕易以「行政罰鍰」了事，應加以「徒刑」處罰。這項建議，「大家認為太重」，其中一位姓周的「立委」還說：「行政院之草案，對現在工商業界已經可以發生遏阻的作用。新訂的法律在開始時應使之能夠適用，不宜過於嚴苛。」吳基福的建議終被否決了(周湧，1976，頁：44)。

公害問題放置在臺灣整體的社會中討論，認為生態學研究應同時包含對人與自然的範疇，發展成社會生態學。

1975 年 12 月林俊義撰寫〈生態學能解決環境危機嗎？〉說明：「全球環境的日趨破壞，以及追求經濟繁榮所導致的環境汙染，使國人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保護產生極大的關心。再加上報章雜誌競相刊載環境之問題，很多人都把任何有關環境汙染及環境問題均誤為生態問題，…。顯然的，沒有一門科學能夠單獨地解決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問題。環境問題的導因又是如此複雜，牽涉又如此的廣泛…。更何況很多環境的問題是不在生態學的領域裡。…生態學無法撇開人類而單獨關心自然的平衡，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雖然生態學家習於視環境為一整體性。但在處理環境問題的政策裡，鮮有這樣的概念。因此要解決環境問題，單憑生態的知識是不夠的，需要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政策的參與。」(林俊義，1975：5)。

環境問題的討論從生態學進入到現實人與社會的整體關係，林俊義注意到西方的理論架構並不能解釋臺灣處境下的汙染現象：「很多政府機關不分皂白就把歐美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術全盤搬運進來，禮聘對當地一無所知的專家來解決問題。結果『橘逾淮為枳』，解決的方法無法配合當地的需要；環境的問題仍然存在，如同科學無法生根，充其量亦只是表面科學而已。」(林俊義，1976a：1)

當大家都以為科學能夠解決環境問題時，卻不知道科學和環境問題都是具有國家性的：「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國家，無論其優弱點，都有它的獨特性。正在開發中的國家，尤其位居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其環境問題雖然與歐美國家有部份共同性，但亦有其獨特的性質。」(ibid.：1)

開發中國家的環境問題與歐美國家並不相同，其解決之道也當不同。原因如下：

第一，問題的性質不同，因為歐美國家與臺灣的自然環境、地理位置、氣候等皆屬不同，熱帶與亞熱帶區的生態體系也較缺乏研究資料，所以開發地區的環境問題可謂分外艱鉅。

第二，問題的來源不同，「歐美國家的環境問題均屬於經濟工業發展所引起。在開發中的國家，這類的環境問題比比皆是，但甚多環境的問題，為低度和未開發之結果。」例如：「肯尼亞或其他熱帶地區，每於乾季之末、雨季之前農人均把生長的農地上之雜草，付之一炬，名為『燃燒風俗』。雖原因不明，但可想像，乃是由於肥料之缺乏，在雨季來臨耕種之前，期能由此燃燒習慣施以農作物所需之主要肥料。此種習慣弊多利少，燃燒後把熱炎地區習見之紅土暴露無遺。…此環境問題之發生，大多由於化肥工業闕如，為未開發經濟所招致之結果。又如熱帶地區習見的『遷徙農業』(Shifting agriculture)，破壞水土保持，加速森林資源之消失。」

第三，首要性不同：「歐美國家的環境問題是在國民基本物質需求都已略在水準之上，因此把重點轉移至『生活的品質』上。」而開發中國家在人口增加的壓力下連基本生活都無法得到保障。「在此情況下，各開發中地區，傾全力發展工農建設，冀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此為最優先急務。至於工農建設所導致的環境問題，則無暇顧及。」

第四，問題感受度的不同：「開發中地區常因文化和社會習俗的關係，對環境問題的感受性與歐美差距甚大。」例如：「臺灣虱目魚的養殖業者將人肥傾倒入池塘，刺激藻類生長，做為虱目魚的飼料。此作法在歐美稱之謂湖沼之環境公害。」

第五，解決問題策略的不同：「開發中國家應根據本身的歷史背景、特殊地域性和經濟人力，尋求與歐美不同的策略，不應受環境問題為全球性的，有相同的性質和來源等錯誤觀念所惑，而仰賴他人解決『同樣』的問題。」(ibid.：2~5)

開發中國家的汙染問題是特殊的，無法移植西方國家的解決策略，因此林俊義鼓勵政府建立科技整合的研究機構從事本國生態體系調查，並且在學校施以生態訓練，提高教職員與學生對環境問題的了解和知識，企圖統籌臺灣的建設發展，以生態科學來維繫(ibid.：4)。

1976 年林俊義以〈綠色革命：科技、環境與社會〉⁴⁸說明科技可能會對社會及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像是墨西哥實行的「綠色革命在增產之外，它不僅帶來生態環境的危害，同時破壞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傳統結構，阻礙社會農村的進步。」(林俊義，1976b：6) 科技的引進未必能促進國家發展，實行綠色革命的第三世界國就產生許多社會後果：「地域性不平衡的發展、加速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土地集中，失業率與都市問題、通貨膨脹的搖擺政策、農業興亡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這是因為落後國家對於先進科技沒有懷疑的態度，並且相信科技的中立性。再者落後國家沒有社會條件符應科技的改革：「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就是沒有制度事先的改革，一個富有正面潛在力的科技如『綠色革命』者才會產生出不良的後果。」(ibid.：10) 林認為人與自然並非對立，造成汙染危害是因為人類過分相信科學是中立的⁴⁹，而事實上科技不但具有殺傷力，也蘊藏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上的侵略，在這些「公害」的背後是西方文化的衝擊和美國科技發展的入侵。

1976 年開始林俊義另外發表一連串對於科技文明反省的文章⁵⁰，主要說明先進國家(英、美、德)經濟繁榮和科技發達改變了人類的的生活。然而，科技雖然改善物質生活卻破壞人類生存的環境和人際關係：「全人類及生界的生存也由核子武器科技的進步，隨時籠罩在悉數毀滅的威脅下。全世界饑荒貧窮不但沒有減除，反而越來越發嚴重。社會人心的不安越發走入虛無的境況。顯然的，科技的發達卻沒有自動的增進人類的幸福，建立起比較好的世界；反而，科技似乎躲在人類的背後，一步一步地把我們推向荒地的邊緣。」(林俊義，1984：7) 而且先進國家的科技是「為戰爭，為勝利努力地從軍事科學的研究，一味的把科學作為擁護既存政治社會文化結構的工具，毫不把科學當作求真無私造福的方法。」

⁴⁸ 林俊義，1976b，〈綠色革命：科技、環境與社會〉，《環境科學通訊》，第八期，頁：1~11。

⁴⁹ 「科技不是中立的，相反的，科技本身已帶有不公平的條件。如不加以政治，社會或經濟約束，科技的應用會導致不公平的現象。科學『中立性』的神話應當打破。」(林俊義，1976b，頁：10)

⁵⁰ 收錄於《環境科學通訊》和《中國論壇》。後來總集起來收錄於《科技文明的反省》、《臺灣公害何時了》等書。

(ibid. : 10)因此，科學不再是中立的，看似文明的工業發展其實充滿了政治目的、科學的商業化、軍事化等，這正是科學發展的危機，號稱現代科學的文明其實充滿矛盾衝突，甚至是壓迫人民、違反了科學家的道德責任。

此後，林俊義的文章⁵¹開始批評科學化約主義(reductionism)，認為生態科學的整體觀是解決環境污染的基礎和方法，像發展中國家因為沒有全面評估國內整體需求而引進科技導致社會不平衡的發展後果，綠色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最成功的地區常常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地方。

因此，林俊義建議第三世界在面對自己薄弱的科技基礎時，應當設立一個科技評估中心，研判引進的科技對發展的整體效益和經濟效益如何。而臺灣更是要建立起中國化的科學與科學家，來改變國內停滯的科學政策：引進的科學、商業性的科學和依賴性科學等等。

「林文」的論述指出開發中國家的公害現象不同於歐美國家的環境發展史，所以解決的方法不一樣，並且開發中國家的公害問題常常來自於已開發國家的科技輸出與工廠設立。不同於官方積極推展科技引進與經濟發展，林俊義以生態學中人與自然合一的整體觀強調人類屬於生態體系的一環，必須依靠自然而活，而非鼓勵人類不斷創造、開發來改變環境。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有地理、文化等根本的差異，移植西方國家的科技方式反而造成國內公害，而看似文明的科學技術其實隱藏著強國對第三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輸入，這是七〇年代的「公害」內涵。

1978 年林俊義在《夏潮》發表〈第三世界—跨國公司輸出污染的樂園〉，開宗名義指出跨國公司是一九七〇年代經濟帝國主義的特徵，它們「控制了他國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的大權。無法在本國繼續肆無忌憚的毒殺人民後，遂把它們的箭頭轉向第三世界，從事污染輸出。」而臺灣儼然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樂園，跨國公司「能夠伸入第三世界國家恣意破壞環境，製造公害，都要感謝第

⁵¹ 林俊義，1976c，〈美國的農業生產制度〉，《環境科學通訊》第九期，頁：9~14。

林俊義，1976d，〈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環境科學通訊》第十期，頁：1~5。

林俊義，1977，〈漫談國內的科學發展〉，《環境科學通訊》第十二期，頁：5~8。

三世界政府的充分合作。」⁵²。

在政府對公害的默許及一般市民缺乏對污染了解的雙重沉默下，1978 年 8 月份，林俊義再以〈臺灣公害問題〉⁵³一文說明臺灣公害問題的複雜性還包含許多社會文化上的包袱，它們來自於：

「第一，臺灣現階段的發展首重經濟，在經濟與公害之間，決策者很容易漠視公害與環境破壞。

第二，臺灣現階段的公害很多並非高度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落後經濟及文化『慣性』的現象。

第三，臺灣在近三十年來強烈西方經濟文化社會衝擊下，把中國『天地與我合一』的生態觀念拋入九霄雲外，並以『人與自然二元論』的哲學取代之。『人與自然二元論』一旦深入意識中，環境的破壞與開發即為『正當』的行為。」(林俊義，1978b：23)。

「總之，我們可以把國內環境破壞與公害問題的起因與關係由底下的模式表示之：外來文化的侵襲→中國傳統人與自然一元化的崩潰、資本主義的發揚→人與自然二元分化、科技發展、民主放任化、個人主義增強、都市化、人口增加、資源的私有權→環境破壞、公害問題。」(ibid.：27)。

環境汙染的出現讓人們開始思考國人處在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現象。從林俊義所提出來的理念，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整體觀、反科學反科技以及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的歐美國家在生活態度、國家制度與社會發展方式都應有所不同，「林文」的論述顯示當時臺灣社會、政治、經濟普遍所面對到：臺灣開發中國家的位置與發展背後的不平等待遇、社會文化的西化現象、資本主義發展等等。而反公害論述正反映出第三世界對抗第一世界的政治經濟壓迫以及反對西化知識思想內化的道德意義。反對公害及科技、反省文明和日漸西化的文化意義等於是揭露美國資本主義與帝國的本質，這是七〇年代帝國資本主義在臺灣的「公害」輸入，不

⁵²陳俊強(林俊義)，1978a，〈第三世界－跨國公司輸出污染的樂園〉，《夏潮》第四卷第六期，頁：38~41。

⁵³ 林俊義，1978b，〈臺灣公害問題〉，《夏潮》第五卷第二期，頁：22~28。

只透過經濟擴張和科技發展，也表現在文化思想範疇，說明了「公害」汙染問題與臺灣七〇年代的歷史背景、社會發展和思想文化都有密切的關係。而《夏潮》雜誌在這樣的脈絡中展開一連串相應的歷史性對話和論述。

(二)、環境論述的歷史意義

林俊義和《夏潮》雜誌的環境論述同時指出七〇年代臺灣社會各方面的西化現象，顯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長期對美、日強國的依附，包括輸入跨國公司工廠和工業化產品、現代化科技引進及西化思想滲透。然而，移植西方科技思想不僅無法改善我國面臨的嚴重汙染與國家現代化問題，反而在對美日依賴的結構中失去中國的文化和認同。有鑒於此，《夏潮》雜誌將社會、經濟的現況提昇到民族與階級的歷史分析，展開對中國現代史、民族性的認識和恢復。

2.1 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美、日帝國的殖民角色

七〇年代開始的反公害論述揭露汙染的原因是強國資本主義的擴張與輸出，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冷戰體制之下，美、日挾帶著強勢的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範疇侵略第三世界國家，包括臺灣、南韓、中東、東南半島等國家。

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重商主義發展了商業資本的帝國主義，進行龐大的原始資本累積，這樣的背景下臺灣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勞動力與資源來源的一個分支。1858 年英法聯軍逼使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開放了淡水、高雄和基隆港口，引來列強對臺灣展開壟斷性的貿易，促成臺灣社會經濟的再編成，使臺灣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譚英坤，1977：7)

1894 年中(清)日之戰，清廷敗北並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據臺後便大力擴展對臺灣經濟、資源的獨佔支配性⁵⁴，並且在當時重商主義下的砂糖殖民工業中壟斷臺灣糖業與米業。殖民經濟的經營方式是由日本直接經營大規模企業化栽培和承租給殖民地小農的地租關係，以租佃給貧下農耕種為主。至於中農則甚少有獨立、自由的性質，「因為透過資本主義市場關係，他們恆受壟斷資本的榨取。

⁵⁴ 對臺灣進行全面的土地調查、山林調查以掌握各樣資源，並建立貨幣經濟和統一度量衡，以利日本商品在臺灣市場的流通。(譚英坤，1977，頁：8)

尤其是在日本警察強制下的土地收買和租用政策下，他們往往會喪失土地，向貧下農階層淪落。…這種半封建的、超過經濟機序所作的殘酷剝削，利潤甚大，在勞動工資二方面可說是予取予奪。是以在壟斷的、資本主義下的臺灣，仍然優容此種零細的、半封建的土地生產關係之存在。」(ibid：11)這是臺灣在二戰之前長達半世紀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其軍備工業幾乎完全破產，並且被迫放棄以武力奪得的一切領土，而美國則蓄意拉攏日本併入美國陣營。「日本被美國佔領之後，美國盡力使日本遠離亞洲，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亞洲社會主義國家，並傾力使日本依附於美國所控制的西方世界。」(蔡伸章，1977：49)

1950 年韓戰爆發加速美國在日本的工業與軍事建設，其主要原因仍在於對抗全亞洲的社會主義—包括中共以及韓、日國內的共產勢力。而「早在 1950 年代中期，美國即在杜勒斯(John Forter Dulles)的策動之下，成立一個三角計劃，期能擴大日本的外銷，並促進日本經濟的擴張。美國提供經援予東南亞國家，使其購買日本外銷品，其交換條件是，東南亞國家在美國市場上享有最惠國待遇；正如瀨永智年所指稱的：『其主要目標旨在……促進日本在東南亞的市場，以反擊共產黨國家的貿易攻勢，並促進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ibid：52)

日本工業之再度崛起與美國軍事工業有著密切的關係。越戰時，美日的工業聯繫及技術合作為日本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並且在美國積極促進下，日本的經濟擴張開始在東南亞國家扮演反共與封鎖鄰近國政權的角色。這種經濟關係由日本支付戰後負債是透過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和經援，一方面挾制東南亞國家，一方面清償二戰後對美國的負債，美日兩國帝國資本主義的共謀與合作對東南亞國家的控制可見一斑。

越戰後美國帝國資本主義越發明顯，軍事工業的輸入和貿易背後隱藏著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強權介入。1975 年以阿發生四次的中東戰爭是美蘇兩國軍備競賽與爭取石油戰略的事實。然而美蘇兩國的軍備在競賽中為了先制性地擁有「削弱對方支配力和影響力，從而強化自己的支配和影響力」，武器的

供應路線從「援助」到有償供應的「貿易」一途。「美國武器輸出的範圍，從向來的美國近鄰地區(國家)，擴展為一切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區(國家)。」(鄧念忠，1976：15)

這是一九六〇年代後半到一九七〇年代前半，世界軍火向貧困的第三世界流入的事實。另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商業活動〉⁵⁵一文則揭露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殖民與干預，還包括在政治和地方組織⁵⁶上，幾乎遏阻當地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並造成政治不穩定和專制政府⁵⁷。

美日兩國的帝國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各國的合縱連橫是資本主義國和社會主義國家兩大陣營的競爭和較力。臺灣則因為具有對中國、日本和韓國國內共產勢力封鎖沿海的戰略位置，由美國積極干預，並且在國民黨的選擇中成為傾美反共的一員，開啟臺灣對美日兩國的依附和開發中國家角色。

2.2 反西化思想「公害」

在《夏潮》宏觀的政治經濟觀點下，周湧和林俊義的反公害論述都反映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下臺灣快速地工業化以及在政治經濟上對美日兩國的依賴。林俊義更指出公害污染的背後有一「文化」因素⁵⁸，即：讓國人普遍相信科技發達、資本累積和西方民主制度的進步性。

⁵⁵ James Petras 著/吳二節譯，1976，〈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商業活動〉，《夏潮》第一卷第五期，頁：17~19。

⁵⁶ 「美國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活動不僅是透過正式的官方機構。其他像美國勞工界的領袖，全國總工會(AFL-CIO)也和中央情報局(CIA)及拉丁美洲的美國公司合作。他們共同訓練，支助一些叛亂組織，以破壞軍事同盟，這些同盟是用來保衛各會員國本身的利益的。他們也與獨裁者及親美國企業的利益團體合作，諸如：全國學生聯合會(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就接受美國官方機構的支助，做為他們的宣傳機構之一，並用來顛覆拉丁美洲人的組織及其領袖，美國的大學也盡力使拉丁美洲的大學『缺乏政治意識』(depoliticize)，以減輕知識分子對他們的獨裁政府的反抗，同時，這也是剝奪了被壓迫的拉丁美洲人民的喉舌。」(James Petras，1976，頁：19)

⁵⁷ 「有三分之二的拉丁美洲國家的統治的是軍事獨裁者，或被軍隊所控制的文人政府。」(James Petras，1976，頁：19)

⁵⁸ 「伴隨著科技的發展，環境的污染和強國的擴張及商業家的貪婪，使人類面臨著公害的威脅。工業發展所導致的環境污染，嚴重地表現在一連串의公害事件上：如一九五二年倫敦煙霧事件，一週內就死了四千多人；……等等。如今隨西化所及之處，不可阻遏地瀰漫在我們的生存環境了。」(周湧，1976，頁：41)

「總之，我們可以把國內環境破壞與公害問題的起因與關係由底下的模式表示之：外來文化的侵襲→中國傳統人與自然一元化的崩潰、資本主義的發揚→人與自然二元分化、科技發展、民主放任化、個人主義增強、都市化、人口增加、資源的私有權→環境破壞、公害問題。」(林俊義，1978b，頁：27)。

林俊義認為只追求名利的科學家臣服地從事科學研究，使那些控制權力的人能隨心所欲，左右擺佈科學的成果而不會遭受到任何的干涉。變質的現代科學需要科學家本身再度對科學的本質及對社會責任重新分析評估，尋找出科學、社會與人民福利的一個新關係，否則科學將給人類帶來黑暗(林俊義，1984：20~21)。

然而，世界各國對美國文明有諸多幻覺，將人類的文明和西方的命運連在一起，但實際上則是在談西方科學文明前途，不但錯誤地認識科學，也失去民族自信心。像是「《文明的躍昇》⁵⁹的內容絕扯不上”人類文化的宣言”。今天臺灣文化界充滿了此種俘虜精神的譯本。我們所看到的書都是以別人的立場來看事務，來看我們，來看世界。像布氏這一類”意識控制”的書充斥街頭，寫不出像李約瑟所著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的最大原因；也就是科學無法”中化”的最大心理障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人以”人類世界”為念而忘卻自身為中國人的原因。我們的腦細胞已不是我們自己的了。我們都變成了”文化鸚鵡”。」(ibid.：26~27)

過去二十年來臺灣政府雖然對科技發展相當重視，但仍然停滯的在引進的科學、商業性的科學和依賴性科學等等。因此，林俊義呼籲政府對科學政策的態度，「必須要建基於我們自己的情況與需要。我們發展科技為的是解決自己”吾土吾民”的問題，而不是為解決全人類、全世界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是認識自己問題的”中國的”科學家，埋首於中國自己的問題與解決的方法。」(ibid.：54)

林俊義一方面在生態學上探討污染的輸入現象，另外一方面則批評代表美國精神的科學工業與其進步發展的實際性，將國內公害現象和科技文明逐漸西化的危機連結在一起，說明反科技的背後是對抗西化思想在臺灣的內化過程。

七〇年代美國冷戰體制下對第三世界的軍事、政治控制一覽無疑，這種如同殖民時期的剝削手段讓先進國所謂的現代文明、經濟發展、科學精神和社會民主受到挑戰和質疑，在諸多的反戰聲浪中《夏潮》也相繼產生反西化的論述。

⁵⁹ Jacob Bronowski/漢寶德 譯，1976，《文明的躍昇》，景象出版社。

詩選〈公害〉⁶⁰以環境汙染來比喻學術界充滿謊言汙染無知的學子們，批評西方思想和文化也是一種「公害」現象：

「一艘油輪沉沒了
汙染了海峽海面的油垢塗滿了岩石的黑臉
在陽光下那
閃亮的油光
使波濤染成滾滾的濁浪
使潮水無法洗淨，再清澈見底

一個博士墮落了
汙染了學府
謊言取代了真理
詭辯的詐術欺瞞了無知學子
一如那無法洗淨的油澤
塗滿了圍牆裏尺漸地混濁腐爛的空氣
當那滾動的海潮
不斷地
向那岸邊的沙灘衝浪
沖洗著油澤的汙染
而圍牆裏的空氣
卻無法去除那惡臭的漫延
且讓那鄉愿在製造著無形的公害」

1977 年周南山也以〈也談歸國學人的公害〉⁶¹一文批評留美知識分子在「衣錦榮歸」、「回國服務」的美名下為臺灣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⁶⁰ 趙天儀，1977，〈公害〉，《夏潮》第二卷第六期，頁：9。(轉載自笠《詩雙月刊》六十六年四月號)

⁶¹ 周南山，1977，〈也談歸國學人的公害〉，《夏潮》第二卷第四期，頁：52~54。

首先，歸國學者的西化思想並不適用中國社會環境所面對的問題，他們美化資本主義的理論，宣揚實行這種經濟路線不僅可以使社會繁榮，國民所得提高，而且可以幫助弱國發展。這些西化知識不僅對臺灣無益反而還成為一種「公害」⁶²：「歸國學人學了這套理論，帶回到自己的社會來，恰巧中了強權擴張主義的毒計，他們引進強權的輸出资本，使我們背負外債而得以控制我們的經濟命脈；他們引進外來的商品，使我們淪為洋貨的傾銷市場；他們引進外資設廠，廉價剝削我們的勞力。這種經濟路子所造成的社會貧富的懸殊，都市生活的糜爛，環境污染的嚴重性，都已達到禍國殃民的地步了。」(周南山，1977：53)

周南山認為留美學者不斷宣揚美國社會的富強繁榮、自由民主、重視人權和理想的政黨政治卻都只看表相的一面。實際上美國的富強是建立在榨取貧國資源與勞力的基礎上；美國的民主是大資本家所壟斷，輿論由大財團支持下的刊物所蓄意製造的；美國的兩黨政治只是行使一條維護財閥利益的路線；而美國自由是提供給越有錢人的越可暢所欲言的機會；所謂美國的重視人權，是否也看到這一面：成千成萬的紅人被剿滅，成千成萬的黑人受歧視，他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水平線上又是否享受了人權？

然而，歸國學人卻又在國內佔據在學術的重要機構，包括大學校長、中研究院院長等⁶³，他們多出於富家與上層官僚合流而懷抱特權意識，並將歐美商業化的氣習帶入學術界。但歸國學人的知識未必能實用於國內社會，西方社會訓練人才的方式是適合他們環境的需要，「當然我們不否認知識有其普遍性，但也有它在自己社會扎根生長出來的東西，不是橫移過來就能產生功效的。因而許多留美歸國學人所學的知識，往往和中國社會所要解決的問題方法脫了節。」(ibid.：54)

⁶² 歸國學人的六大公害：「一、充當強權擴張主義的先鋒隊，二、結成利益集團盤踞本土，三、特權意識的洋溢，四、使學術商業化，五、助長崇洋媚外之風，六、助長牙刷主義的作風。」(周南山，1977，頁：53)

⁶³ 「數以百萬、千萬的所謂學術發展及教育經費是控制在這幫人手上。一個土碩士、土教授要想出國進修，那是千難萬難，偶而給予機會，也要花上一年半載填表格、寫報告，經過他們用洋標準衡量及格後，才有錄選的可能。」(周南山，1977，頁：53)

再者，歸國學人的知識和文化不僅助長知識分子崇洋媚外和牙刷主義⁶⁴作風，還失去對中國的認同感和道德感。

「這些歸國學人不僅百般地美化美國，同時還醜化自己，把中國說成貧窮落後、一無事處，他們對本土毫無情感。唯一依戀是在我們這裡可以供他們過一個高等華人的生活，可以讓他們做一個『有自尊的人』。」(ibid. : 53)

由於歸國學人多未落根於臺灣或是持有雙重國籍，他們以報酬利益為考量販賣知識，周南山批評他們失去教育的職責，還把知識和道德分開，他們的知識不僅是西化的，還可能成為侵害同胞的武器卻不自知。

「例如經濟學專家引進工廠污染我們的環境，此外倡言工業發展過程必定會犧牲農業，但可以拿工業的所得來彌補農民的損失，結果這條經濟路子實行起來，資本家賺飽了錢，大戶逃稅累累，而農民卻望稻秧垂淚。」(ibid. : 54)

這些知識不是為大家公用，而是為了他們同一群中人來用的。正由於這種學人缺乏道德感和對社會、人群的責任感，因此他們的知識作為侵人的武器，其結果得利者寡，蒙害者眾。

周南山的論述將「公害」問題提升到「思想公害」的層面，在帝國資本主義中反省逐漸西化的社會價值和教育，並呼籲恢復中國化的知識、思想和民族認同。

透過《夏潮》雜誌解讀的歸國學人的思想「公害」內容，不論是引進科技工業造成污染、科技迷信或是教育、知識界的西化現象都是「公害」在《夏潮》的文化內涵，說明臺灣社會在追求西化的同時常常遏止中國文化和民族國家的發展，要思考中國現代化的路徑不是全盤西化，而是依循著對中國歷史、社會文明的理解來建立。但是《夏潮》中的環境論述將公害污染提昇到「思想公害」，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中發展出這樣的思想體系？他們共同指出西化思想是一種「公害」，並且致力於恢復中國民族性的思想意義為何？將是下一節所討論的。

⁶⁴ 指持有雙重國籍或綠卡的人。

2.3 反帝國主義的中國近代史

從反公害、反科技迷信到反西化思想，七〇年代的環境論述透露出思想公害是強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帝國主義擴張的信息。列強的欺壓與思想改造可追溯至臺灣近代史，經過日本殖民的皇民化教育、國民政府反共戒嚴意識，到近代西化現代主義的侵襲，七〇年代的臺灣文藝思想已逐漸失去中國民族性和社會現實的一面，針對此一現象《夏潮》雜誌給予歷史化的解釋。

郭正昭認為近代西方科學文明衝擊中國社會變遷的問題始於 1860~1949 年間，這一百年是中國史上科學文明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

從 1860~1894 年是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時期，由於天津條約，中國門戶大開，通商口岸遍及內陸。以近代科技為基本動力的西方傳統，以侵略性的姿態，全面衝擊中國傳統社會。當時中國面臨這種挑戰只能力圖輸入西方近代科技而加以模仿，秉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但是科學化還未深入。

1895~1927 年是維新運動，革命運動至五四運動時期。這時由嚴復介紹的達爾文主義極度盛行，幾乎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主導力量。知青胡適本名胡洪驊，也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命名。

1928~1949 年是國民政府建國時期，在北伐成功後推展全面性的科學化運動，籌設各種科學研究機構和普及科學教育，科學運動開始進入制度化階段，並以三民主義為信仰中心，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建國藍圖，但在日本的侵略與破壞中失去穩固的基礎。(郭正昭，1976：24~28)

東西文化雖然在這一百年間有密切的互動，但卻是中國抵抗外侮和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在思想上面對著道統與西化思想的衝突。

中國近代史中臺灣則是在 1604 年由荷蘭入侵澎湖開啟殖民的歷史，明鄭時期光復臺灣後沿襲荷蘭人的土地制度形成堅固的封建社會，幾乎所有土地都掌握在官府手裡，農民只是繳納田賦、丁稅的工具而已。然而，鄭氏的社會經濟一部份仍須仰賴對外通商，包括日本、琉球、朝鮮、菲律賓、澳門等，以糖和白鹿皮去購買火砲、望遠鏡、鉛、銅等戰爭武器，可見鄭氏的經濟部份仍由外國所控制。

清朝統治臺灣有二百十二年，直到光緒二十一年，把臺灣割讓給日本為止。清末時期列強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使得臺灣淪為英、美、法、德金融帝國主義者剝削的對象。至日治時期開始，日本成為臺灣人惟一的統治者，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和榨取和島內封建地主的雙重欺凌下展開長達五〇年(1895~1945)的殖民歷史。(葉石濤，1977：70)

如上所述，臺灣一直在外國殖民者的侵略和島內封建制度的壓迫及痛苦中的歷史現實，這些經驗都一一反映在日治時期抗日文學上。葉石濤認為臺灣社會在歷史轉變中是人民被壓迫、被殖民、被摧殘，這是居住在臺灣的中國人共同的歷史經歷，因此反映各階層民眾情感的、臺灣的、鄉土的文學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和大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光緒二十一年到民國四年的二十年(1895~1915)中，臺灣地方的民族抗日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臺灣人以武力抗暴招致日本殖民者的瘋狂鎮壓和殺戮，這段時間文學幾乎不存在。臺灣的鄉土文學是在非武裝抗日的政治、社會蓬勃的啟蒙運動的背景才展開的，葉石濤將日據文學時期分為三階段⁶⁵，其共同特徵就是可以在主要的作品中看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開展、深化、反動與衰微的特色。(ibid.：72~74)

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積極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企圖打壓臺灣文學與作家，欲將臺灣文學轉變為受日本軍國殖民統御文學和思想部隊。從 1937 年日本侵華的戰爭開始，日本當局便逐步對全臺灣進行戰時統制，包括改造臺灣人民的漢民族意識，以及清除抗日思想，建立在台的皇民化文學。在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下，強調皇民精神與高舉盲目的愛國主義，這種思想幾乎扼殺臺灣文學的精神。(曾

⁶⁵ 分別是 1920 年「搖籃期」：由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領導的民族運動和臺灣文化協會的政治運動啟發民智民族思想，提倡破除迷信建立新道德觀。反映在文學上是革新、進步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白話文學的新舊之爭。1930 年「開花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性的經濟恐慌，臺灣農村經濟在殖民的剝削中越來越惡劣，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與窮苦的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幾乎無法生存的農民開始覺醒產生民族的革命運動。此時的臺灣文學傾向寫實掌握社會中的矛盾和對立，如：賴和的〈一桿秤仔〉、楊逵的〈送報伕〉。1940 年的「戰爭期」：此時期歷二次大戰後日本加強其殖民主權在台推行一連串的皇民化(奴化)運動鼓勵穿國民服，用國語(日語)，改為日本姓氏等，並且在官方支持下成立「臺灣文藝家協會」雖標榜作家自主性卻是企圖使臺灣作家穿上奴化新衣為殖民者賣命。「臺灣文藝」的特色是以向上發展為目標，在編輯過程追求美而流為趣味性質，遠離現實生活。另外與「臺灣文藝」形成思想對立的「臺灣文學」則強調寫實主義，在紙上洋溢雄心和剛毅精神。(葉石濤，1977，頁：72~75)

健民，1998：28~30)

1949 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為了鞏固自己的反動獨裁統治，在政治上維護所謂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宣揚反攻大陸口號；在文化上以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統」自居，強化臺灣的國民黨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傳承者。政府遷臺後配合反共與內除異己的需要，對文學、思想、言論進行控制而提倡反共文學，直到五〇年代這種反共文學佔據文壇相當一段時，後來則慢慢地僵化成八股文學。

在白色恐怖和反共戒嚴的政治權威下壓抑臺灣思想的發展，臺灣戰後的文學作品主要有隨著國軍撤退來到臺的作家，如朱西寧、司馬中原，他們來台後的生活圈仍不離軍隊和黨政構，而無法真正了解台灣民眾的生活和社會狀態，文學內容主要回憶從大陸撤退的慘痛經驗，或是以大陸農村為背景的懷鄉作品。另外，以臺灣社會現實為題材具有鄉土色彩，關懷大眾為主的作家，如：陳映真、黃春明等，他們的作品傾向以晦澀憂鬱方式表現其人道主義精神⁶⁶。

然而，國府來臺後在意識形態上採取極為嚴厲的政策，尤其是文藝方面的箝制。不僅宣佈革命作品為非法，所有留在大陸作家的作品均為禁物，並不准任何一隻具有紅色翅翼的小鳥蝴蝶入境，臺灣民眾因一本紅皮書坐牢、殺頭的不是鮮聞。國府一方面滴水不漏地阻斷祖國文學與臺灣文學的血脈；另一方面也將臺灣文學和文藝青年的思想禁錮在反共八股的文學囚籠之中。(古繼堂，1998：47)

為了打破這種禁錮尋找思想的窗口，一批具有民主意識的臺灣文學青年把渴望朝向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和現代派文學便成為他們敬慕和吞食的對象。五〇年代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伴隨著大量的美國經濟援助，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斷地湧入臺灣，西方現代文學的技巧、潛意識流和新的文學原素提供長期被壓抑、苦悶下的臺灣文藝在現實之外找到另一出處。從 1956 年夏濟安主編《文學雜誌》開始，提倡歐美的古典文學，同年，紀弦宣告現代詩派的成立，其重點在「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知性的強調」與「追求詩的純粹性」，目的是對上五〇年代的反共文學及懷鄉文學泛政治性八股文。

⁶⁶ 葉石濤，2004，《臺灣文學史回顧》，台北：九歌。

1962年的中西文化論戰由李敖⁶⁷、居浩然等人在《文星》雜誌發表「全盤西化」的思想，李敖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以中國民族傳統與文化正統繼承者自居的國民黨，其立場在不滿專制獨裁統治、保守和刻板的反共八股文化，並力圖從西方文化中尋求新的出路。中西文化論戰象徵文化思考的主流導向，西化為基調的現代化派逐漸在學院裡及新興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間佔了上風。

古繼堂認為西方現代派引入臺灣雖然對打破反共八股控制臺灣文壇的局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其消極面卻遠遠超過積極面。因為現代派是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產物，它是適應資本主義社會需要的文學，產生在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而五〇年代臺灣仍處於分散與落後的小農經濟狀態，社會上存在殘酷和野蠻的壓迫和剝削，廣大民眾急需的是鬥爭和反抗、揭露和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現代派無病呻吟的文字與臺灣現實社會格格不入。

文藝上現代派強調文學純粹性的目的在於「去政治化」，極力導向西化現主義潮流，與傳統的文學體制絕然割裂，並將傳統的生活、意識形態畫分等級，「現代詩、現代文學必須是『現代人』才能懂的，處於『傳統的』下層階級不能瞭解現代文學，是因為其不夠『現代』。」(郭紀舟，1999：44) 現代文學儼然成為追求現代菁英精神心靈崇高內涵的文字遊戲。並且，現代詩、現代文學思想引進時正是臺灣逐漸進入美國資本主義依賴體系的時期，隨之而來的是教育體制以及文化意識的入侵，以經濟成長論為中心發展起來的『現代化論』，以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為主的思考形態，逐漸要求取代傳統生產模式以及教育文化的思考模式。現代詩中的文字、技巧、結構與內容雖然標榜朝向現代，卻缺乏對現實社會的觀看和體認，「雖然以『世界性』和『國際性』為言，但實際上只是一味西化」又「他們不過是新一代的『文化買辦』而已，憑藉外文能力的高強，理論的洋化，於是便可以向中國大販賣工業時代的文學鴉片了…。」(ibid.：43~45)

1972年的現代詩論戰是台灣戰後重要的文學思想論戰，以《中外文學》、《龍

⁶⁷ 李敖的相關著作有：《傳統下的獨白》與《胡適論》等。

族詩刊》和《文學季刊》為中心展開對現代詩的批判。關傑明首先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困境〉和〈中國現代詩的幻境〉，指出現代詩西化過深失去傳統的弊病，中國詩人在學習西方各種現代主義語法技巧的同時，也照單全收了他們的病態內容⁶⁸其結果是失去固有的民族性。(趙知悌，1976：4)

唐文標則在《中外文學》發表〈詩的沒落〉認為現代詩的特性就是逃避現實，結合傳統詠物、擬古、山水和西方潛意識、超現實、象徵、存在主義，詩人步入歧途是因為忽視文學和社會、歷史的關係，因此要求年輕一代必須探求寫作的意義，重新建立有歷史感和社會關懷的文學。(ibid.：5~7)

現代詩論戰後在《筆匯》、《文季》等雜誌上逐漸出現批判現代主義之外的現實主義、個人主義和鄉土回歸的社會性文學⁶⁹，其內容包括反對現代派語言上的晦澀與形式主義，反對現代文藝之無歷史、無生活與無民眾，並主張要有中國民族風格，反對模仿西化的現代形式，結合 1971 年保釣運動喊出來的愛國主義和反帝反資口號，開拓出「民族」和「社會」在七〇年代的歷史內涵：「重新建立有歷史感、祖國愛、社會關懷的文學，並企圖將文學的社會性與民族性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氣氛有所聯繫，同時塑造成為文化霸權的戰鬥力量。」(郭紀舟，1999：45) 這股現實與現代之爭也成為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的先聲。

七〇年代初期是臺灣部份知識分子為先導的民族意識覺醒時期，從反封建反帝國的近代史中發展出反對崇洋媚外、反洋奴哲學的浪潮，「新詩論爭促進了民族意識的大覺醒，民族意識的大覺醒反過來又促進了新詩論爭的深入。新詩論爭深入的顯著標誌是中國民族詩的大廈在臺灣的土地上雨後春筍般矗立的中國精神、中國風格的新詩創作大大發展，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新詩回歸運動。」(古繼

⁶⁸ 關傑明：「大部份現代詩人對語文與生活態度，反映出他們對我們普通大眾生活方式的文明要項，缺乏認識；一種個人與社會脫節的千篇一律的病態傾向，以及必然會因此而產生的偏差——對於生活、愛情、死亡與生命等各種與現實問題的不當看法。」關傑明，1972，〈現代詩的幻境〉，《人間副刊》。

⁶⁹ 如陳映真的〈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劇〉，黃春明的〈看準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等現實主義的文章。黃春明的〈莎啞娜啦·再見〉、王禎和的〈望你早歸〉，包括對臺灣日據時代文學的整理、對鍾理和小說的考察與重刊楊逵的文學作品(郭紀舟，1999，頁：50)。

堂，1988：59)

1976 年《夏潮》雜誌在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與現實主義文學作家的思想內涵中成立，內容強烈的歷史意識和社會意識將論述的核心關懷放在中國傳統理念的中國意識，解讀臺灣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以第三世界發展理論和依賴理論的眼光看美日帝國、臺灣、中國的三角問題，將臺灣與中國放在世界史的範圍來看，同樣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國際性國民革命運動中重要的一支，因此具有反帝國主義的共同目標和中國民族性的歷史標記。因此，《夏潮》中的文章和論述也大都緊扣連在對中國歷史脈絡的認識，匯集從日治時期反封建、反帝國的抗日文學內涵發展出具有民族性、鄉土性的文藝思想，結合 1971 年保釣運動和台大校園民主運動中反資反帝的內涵，譜出民族主義的抗爭語言。

(三)、中國民族主義在《夏潮》

臺灣經歷列強欺壓、日本殖民的皇民化意識改造、國民政府嚴厲防赤化的反共意識，以及冷戰體制下西化的現代主義思潮，臺灣近代史思想轉變的過程，雖然為臺灣文藝填加不同的色彩，但是臺灣鄉土的、階級的、民眾的、民族的文藝和作家卻長期受到打壓，並且在國府的反共意識和現代西潮中逐漸失去與中國的關聯性。1971 年保釣運動與隔年的現代詩論戰震盪七〇年代的思想狀態，特別是從崇洋媚外和文化買辦的文學中覺醒開始體認臺灣與中國歷史的連帶性。《夏潮》雜誌的論述一方面透過現代史中認識反帝反資是中國與臺灣歷史的一貫性，另一方面結合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思想提倡民族主義與階級意識，隨著保釣運動邁開左翼的一步。

3.1 保釣運動與左翼思想

七〇年代臺灣第三世界國家的位置越來越凸顯，《夏潮》的知識分子有感西方學術思想不足以理解臺灣作為開發中國家的問題，並且在反戰聲浪中逐漸揭露美國繁榮進步與現代化背後的帝國主義，因此《夏潮》雜誌開始重新探討中國歷史的課題：從抗戰、抗日的反帝運動有「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內涵，並且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精神所在，以此作為反資反帝現象的語

言。而這股認識中國的渴望早在 1971 年保釣運動便醞釀出來。

1960 年代末，美國決定要將其戰後一直管轄的琉球群島交回冷戰盟友日本，並且片面將釣魚臺列嶼認定是琉球的一部份一併移交。琉球政府還在島上立碑，並且驅逐臺灣漁民，領土爭議⁷⁰由此展開。(鄭鴻生，2001：78~79)

保釣運動首先在海外發酵，引起海外留學生的愛國意識及民族運動⁷¹，海外釣運逐漸組織化並開始自發性地遊行抗爭和理論教育工作，認為這是一種自覺性的需要。1971 年 2 月 25 日尼克森宣布訪問中國大陸，美國積極地與中國大陸友好態度令釣運學生開始有感必須進一步了解中國⁷²，並且也出現「為人民服務」、「破私立公」、「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等政治口號。表現在論述上「一是反政府、反對臺灣的不民主，反對妄自切斷中國歷史。…二是民族主義抬頭，多接觸到近代中國的事物後，看到勞動人民一草一木建設了我們的國家，……三是反資本主義，……。」以及「我們必須看清毛共『反美國帝國主義』與『反日本軍國主義』的口號，是以聳動中國人的觀感與心情而破壞中日韓美的合作為目的。」(郭紀舟，1999：21~27) 這類的左傾思想越來越明顯，後來還發展成中國統一運動⁷³。

這股民族能量和對威權政府的批判傳回國內，帶動國內知識青年對國府無能與腐敗的批判：一方面反對黨國在保釣事件上沒有任何外交政治抗議舉動，另一方面則是黨國壓制保釣熱潮引來的激昂情緒。白色恐怖的威權鐵牢在內外交迫中產生鬆動，而保釣運動正是島內知青關心國事的機會，他們以示威行動表明反壓迫與社會改革的實踐參與，臺大師生也在保釣之後針對學校審稿制度進行言論自

⁷⁰「釣魚臺列嶼位於臺灣與琉球之間，本來是個只有漁民才會來休憩避風的無人小島。然而它又屬於大陸礁層的範圍，附近海域可能蘊藏著豐富的海底石油，正是當時石油開採的新焦點，因而開始有了領土問題的敏感性。」(鄭鴻生，2001，頁：78~79)。

⁷¹「民國 60 年 4 月 10 日在美國華府的『保衛中國領土釣魚臺』大遊行達到最高潮，有兩千五百人從北美洲各地趕來參加。這是留美學生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尤其能夠聚集那麼多人廣袤的北美大陸各地趕來參加，可以想見釣魚臺問題所引爆的民族主義熱力與能量，影響了那整個世代的臺灣港澳留美學生與學人……。」(郭紀舟，1999，頁：79~80)

⁷²「因此，每個校園的運動總部都開始慢慢累積『進步』讀物，這包括《毛選》、《人民畫報》、《北京週刊》、《紅旗》、《馬恩選集》、一些列寧的著作等等……。」(郭紀舟，1999，頁：20~21)

⁷³「當時全球反體制運動效法著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義時，北美的保釣運動自然連結上重新認識中國、自我學習的內省運動。例如劉大任認為問題根源在許多歷史狀況都是因為兩黨的殘酷鬥爭造成的，所以一定要結束分裂狀態。釣運轉到統運，是透過一個『認識祖國運動』展開的。」(郭紀舟，1999，頁：27)

由的辯論，並爭取在臺大的民主生活實踐，即是校務參與權及國家的政治參與權。這種反威權的聲音促成各校園的保釣熱潮與臺大民主抗爭運動，校園裡黨國的舊勢力便逐漸走向衰退。社會抗爭不斷地衝撞威權體制，同時期國府又在無預警的狀態下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它的正當性便開始崩解：「原本穩當可靠的威權體制突然陷入風雨飄搖之中，人心開始浮動，神話開始崩解，臺灣此後不再有著一致的統合意識形態。」(鄭鴻生，2001：97)

此外，1960 年以來美國以殘酷手段介入越戰長達 15 年，將美國帝國主義的姿態表露無疑，加上保釣事件中美國的強權角色，都讓集結在《夏潮》雜誌的知青們有了身處第三世界的自覺，並且釐清冷戰陣營中國府傾美反共的角色，因而開始尋找出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另一條出路。他們帶著反資反帝反壓迫的素樸理想而開始重新認識中國的渴望，過去那些舊俄小說中的人物、五六〇年代的存在主義、自由主義的禁忌及海外保釣的社會主義都將左傾的思想片斷地流入臺灣，影響島內的知識青年，鄭鴻生回憶：「從反越戰到保釣運動很自然的思想解放過程，這個左傾過程在臺灣的留美子弟中完成，也同樣在島內的我們之中完成。」

(ibid.：142)

保釣運動不僅帶來各種思想的連結、啟發對臺灣歷史的更深認識，就當時左翼的知識青年而言更是在長久在牢不可破的威權下找到行動的場域，而五、六〇年代被壓抑和禁錮的思想⁷⁴：從臺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運動中的第三世界左翼傳統⁷⁵、殷海光以來批判威權的自由主義和七〇年代的海外保釣運動所傳遞的反帝國主義左翼世界觀⁷⁶，在此時找到解放的出口和重新連結的可能。

⁷⁴ 「六〇年代的冷戰世界結構，臺灣內部的強人統治，及美國的全球資本戰略體系，都將臺灣置放在軍事的戰略位置上，長期的整備軍事狀態，加上政治的戒嚴，六〇年代的臺灣禁絕左翼的思考哲學，也捨棄自主文化的發展；與其說六〇年代是安定的狀態，不如說是淒涼的人民歷史的斷裂。」(郭紀舟，1999，頁：5)

⁷⁵ 這左翼傳統「在 1950 年代慘遭當局腰斬，到了 1960 年代卻有了復甦的可能，這一條線索藉斷絲連表現在陳映真的小說與評論上。」(鄭鴻生，2001，頁：76)

⁷⁶ 「保釣運動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信念所傳遞給我們的，正是在於弱勢者反壓迫的信息，不僅反抗國內的壓迫者，也反抗外國的壓迫者。這個觀點讓我們逐步接近素樸的、反壓迫的、具國際主義性質的左派世界觀。」(鄭鴻生，2001，頁：81)

3.2 反資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

1976 年第一卷的《夏潮》雜誌裡開始討論日據時期的抗日運動史，首先談到蔣渭水先生在抗日運動中的影響力：「最能刺痛日據當局、並最能喚醒民族與社會良知的人，也是日據時代臺灣同胞之中最富有民族主義情操、最堅持民族運動路線，而又最能發揮民族運動影響力的人。」(黃煌雄，1976：2)

接下來又討論〈賴和是誰？〉，介紹賴和在日治殖民時期對臺灣文化的重要性。約 1920 年他開始創作，試圖將日治殖民時期臺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表現出來，他參與臺灣文化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黨與新生學會這些漢民族的組織，因為「當時受五四運動的衝擊，深感民族自決的重要性，尤其是對啟迪民智的重要性有進一步的看法，文學不再為是某一階層人士的專利品，對白話文的推重遂一己之力。」(1976：56~59 梁德民) 其文學作品雖然用字簡單、白話卻真實反映當時勞動者的生活侷限。

《夏潮》第七期則有孫文談〈中國的現在和未來〉⁷⁷、王詩琅的〈臺灣抗日運動新探討〉⁷⁸及王孝廉的〈血櫻—關於霧社事件(上)〉⁷⁹，說明勿忘記臺灣這段被殖民的抗爭歷史，不論是反抗意識、文化啟蒙、政治運動的左右派，「都是出自對日人統治及日民族的反感，然後再挑起民族意識的發展起來的。」(王詩琅，1976：12) 之後還由《夏潮》編輯部整理楊達訪問記⁸⁰，吸取陽達抗日運動的經驗及他文學作品中的愛國意識。在當時社會思想的意義而言，臺灣抗日的殖民運動史開啟了民族自決的思潮，並且對現實社會和政治壓迫的抗爭表現在文學作品上，林載爵：「賴和是臺灣文學的開創者，也是白話文的開拓者，他為臺灣文學樹立了良好的典範，……到了楊達與鍾理和，他們各自將臺灣文學中的這兩種精神發展至最頂點，楊達是抗議精神的代表，鍾理和以最完美的形式表達出悲天憫人，默默隱忍的另一種精神。」(林載爵，1996：6) 這是五、六〇年代以來中斷

⁷⁷ 孫中山，1976，〈中國的現在和未來〉，《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2~9。

⁷⁸ 王詩琅，1976，〈臺灣抗日運動新探討〉，《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10~12。

⁷⁹ 王孝廉，1976，〈血櫻—關於霧社事件(上)〉，《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3~17。

⁸⁰ 編輯部，1976，〈我要再出發—楊達訪問記〉，《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49~54。

的左翼思想的延續。

抗日時期的反帝反資精神和民族意識，在保釣運動及現代詩論戰中延續，民族的愛國意識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識而與有所連結，同時不斷地塑造具有中國思想的民族主義。

1977 年王曉波以〈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一文引用孫文的三民主義來呼籲中國人民要有民族的危機意識，長久以來中國受到滿夷、列強的侵略和政治壓迫，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用的…唯有在異族凌夷之，才能產生民族主義。」(王曉波，1977：8)

從歷史過程來看，中國經歷漢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⁸¹，國父雖然生前未能完成大亞洲主義和世界大同的理想⁸²，但是此民族主義在反滿族壓迫時就已具有抵抗外侮與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也就是說，我們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他國侵佔，中國領土以內的眾人之事，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自決。國父和蔣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的歷史，就是一部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ibid.：12)

然而，近代社會瀰漫崇洋風氣⁸³與列強侵略後喪失的民族信心，應當恢復民族精神就是「孫中山先生當年把民族主義置於三民主義的首位，高呼要重振民族精神。」(仰盛義，1977)

王曉波、曾祥鐸、陳鼓應等人將三民主義視為重建中國國人信心與民族尊嚴的基礎，並且說明從抗日、抗戰時期開始，我國的民族主義早已具有反帝反資的性格，以此做為七〇年代愛國運動與民主主義運動的基石。

釣運後在台大校園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中，陳鼓應、王曉波和錢永祥、洪三

⁸¹ 推翻滿清之後，「中華民國之建立，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丕興實業，促進教育，推廣東球之商務，維持世界之和平，俾五洲列國益敦親睦，於我視為唇齒兄弟之邦。(臨時大總統布告國民消融意見益蜀除畛域文)」(王曉波，1977，頁：10)

⁸² 「三民主義的目的是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是一種世界主義，亦即民族主義的消滅。從民族主義的提倡到民族主義的消滅，是民族主義的整個過程。」(王曉波，1977，頁：9)

⁸³ 「建築是西式的，因此市容不見民族風格，大學教本多數都使用洋書，大學生畢業後多數都想往外面跑。文學創作，無論是小說、新詩或散文，部充滿西洋情調。不少人把這一切都美之為『現代化』，唯有憑著如此才足以救中國，中國要富強，只有走那些人所說的所謂『現代化』之路。」曾祥鐸，1977，〈談近代中國的民族精神〉，《夏潮》第三卷第一期，頁：5~6

雄、鄭鴻生等學生們以民族主義的語言來對抗帝國資本主義，認為第三世界落後與貧困的問題核心就在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帝國主義，而不論是中國大陸或臺灣都在這個問題意識裡。

「『中國人民』當然不只是一種民族立場，這個概念所指涉的更是受帝國主義壓迫欺凌的第三世界的基層人民。」這樣的世界觀代表第三世界在同受壓迫的基礎上相互連結。(鄭鴻生，2001：226)

3.3 歷史分斷下的孤兒

反資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延續自保釣運動以來對美日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反殖民思想，一方面重塑臺灣歷史與中國現代史的同質性與連帶性，另一方面將逐漸工業化、都市化的臺灣社會以及環境汙染、農民不平等待遇、勞工工時等問題⁸⁴，都包含在這個具有宏觀政治經濟學的《夏潮》系統中。

然而，《夏潮》的思想系統雖然承續五六〇年代以來的左翼思想和反資反帝的中國民族意識，具有反西化的性質，但卻不是一味中國化，其內涵是在帝國主義侵襲中國的歷史全景中，試圖克服分離主義帶來的歷史斷裂。

吳濁流的〈亞細亞孤兒〉一文最能深刻說明這個斷裂表現在臺灣人道德上和精神上掙扎的民族認同。主人翁胡太明出生在日本領臺期間舊式地主的家庭，成長過程中他經歷現代化殖民主義的教育，幾乎已經認同殖民者的文化想要在日本的官僚體制尋出路，卻在大學畢業後開始嘗到殖民體制下的差別教育和對臺灣人文化上的壓抑。他同時面對「身處日本壓迫之協同者的地位的羞恥感和負罪感；另一方面是不斷增強的、來自日本壓迫者的無恥的、張狂的暴力，不斷地打擊著胡太明庸懦的心。」(艾鄧，1977：55) 胡太明彷彿失落了自身的淵源，迷失在歷史的深山中，雖然整個亞洲大陸殖民地的人民正在覺醒，爭取民族自由和國家獨立，但他卻避拒抗日激昂的潮流，只能淒楚地呼叫：「孤兒!孤兒!孤兒!」

⁸⁴ 收錄於《夏潮》如：〈台灣地區的勞工權力問題——一種嘗試分析〉(一卷五期)、〈為民喉舌：立法應對農民多加照顧〉、〈雞啼鬼走〉(二卷三期)、〈國內工人現狀分析——從國民生產毛額的統計數字說〉(二卷六期)、〈請聽礦工的呼聲〉(三卷三期)、〈富裕中的貧窮和絕望——美國低階層社會面貌〉、〈請吃米飯的人，聽聽農民的心聲!!〉(三卷五期)、〈農會如何剝削民的血汗〉(五卷三期)、。

(ibid. : 56)

〈亞細亞孤兒〉是表現帝國主義下被殘害心靈最生動的文學作品之一，描寫臺灣知識分子在歪扭歷史中無法在日治下的臺灣或中國找到民族認同，而成為夾縫中的孤兒。然而，吳濁流筆下的人物並非被動地屈就於現實，而是體認到「在整個中國為追求民族自由和國家的大時代中，臺灣和中國人和其他一切覺醒的中國人一樣，擁有完全的革命權力。…要以『實際的行動』來爭取自己在中國邁向現代國家的艱苦歷史中的主體的地位。」(ibid. : 57)

吳濁流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和《夏潮》的知識分子，同樣面對帝國主義侵略下分離主義和中國民族精神健全的問題，他們有感唯有對歷史的全貌和取向有全面性的理解，才能跨過認同上的苦悶。艾鄧引用村上知行的一段話：「世界上沒有所謂臺灣人。假如有的話，那是住在深山裡的番社的人吧。普通被稱為臺灣人的，實在完完全全是中國人。即使說多少帶有一點臺灣的特色，或使人有這一種感覺，實際上仍是純粹的中國人。」他表示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若不面對帝國主義殘害帶來的細微問題或是一味誇大「臺灣個性」不從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全局來理解而發展成短視、親帝的分離主義，都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ibid. : 59)。

然而，保釣運動、反越戰及素樸第三世界觀下反帝國資本主義孕育出的左翼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在七〇年代並非主流，雖然保釣運動引發台大校園民主運動，聚集師生們抗爭和爭取民主自由，共同反對黨國威權的立場，但是當中的知識分子及其思想、對人的價值與世界觀卻有極大的差異，就是如何看待美國政府世界霸權的角色，傾左的民族主義陣營顯然在民主抗爭上不忘指出美國帝國主義的性質，但是傾右的親美反中陣營似乎較安於黨國的反共宣傳，並且在國府退出聯合國事件的危機中形成台獨勢力⁸⁵。

3.4 小結：

七〇年代保釣運動開啟了左翼思想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契機，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中，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成為當時能夠對抗與號召人民的語言。《夏

⁸⁵ 鄭鴻生，2001，頁：214。

潮》雜誌的反公害論述，在臺灣依附美日帝國資本主義的背景中發展出反帝反資與反西化的理論高度，當時《夏潮》雜誌的各種社會議題：不論是反公害、階級議題、思想文學等等都涵蓋在這樣宏觀的歷史全景和思想脈絡。

雖然《夏潮》雜誌延續保釣運動的批判反省精神不斷與西化現象對抗，對話的核心論述也試圖透過歷史建立起中國的民族思想，但是，自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隔年中日斷交，1978 年中(大陸)美建交後對台灣的外交產生極大衝擊，失去的不只是經濟資源的依附也是國民黨政權正當性的問題，還有台灣作為兩岸分斷的領土之國家主權的爭議，主流思想多在呼籲國家推動政治和經濟上的「現代化」和「民主化」，如《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等。在冷戰體制和黨國教育與反共意識之下，認識中國的聲音往往被扣上紅帽子，甚至為國家鎮壓，中國儼然成為匪類和落後暴民的象徵，而這強烈的意識形態影響深遠，不只表現在民粹的政治意識上，更抑制左翼思想在臺灣的萌芽。

左翼思想逐漸中挫的同時，一股撲天蓋地的思潮是以現代化意識形態為主的論述方式，在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遷中，有效詮釋社會力的形成和發展，以至於臺灣環境論述和社會運動的現代化、政治化在七〇年代末就已逐漸形成。

(四)、分歧的歷史觀

七〇年代初期尼克森政府刻意與中共修好外交關係，進行乒乓外交，逐漸打開中國社會主義的內部訊息，1972 年臺灣保釣的運動過程給予知識分子在知識和思考的轉換，從過去教化的反共思考體制進入到政治領域，形成以臺灣土地作為認同的共同陣營，進入臺灣本土進行政治社會改造。

保釣運動之後學術圈的知識分子們開始集結成反對黨國政府的集團，但內部卻有極大的異質性，大致分為出國留學放洋後以官方為思考方式的「洋」系與土生土長的「土」系知識分子。其中「土」系當中又有不同，分裂為極力主張進入決策層者，將選舉視為知識分子與決策，獲取政權的唯一途徑，即為張俊宏、許信良等人；和以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社會實踐」系統，主要有

陳鼓應、王曉波、王杏慶和蘇慶黎等人是《夏潮》雜誌的創辦人和參與者。(郭紀舟，1999：59~65)

《夏潮》雜誌中左翼反帝反資的中國民族主義在保釣運動中重新與抗日時期的思想連結在一起，然而這與當時同樣反黨國權威的西化派、現代化提倡者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形成了左右的分歧。同時，在白色恐怖餘威猶存的七〇年代，左翼民族主義的思想不但驚動黨國機器的武力鎮壓，更引起傾右人士的不滿，認為民族主義是情緒化和落後的象徵，甚至扭曲反帝的意義，以不反共的意識形態來攻擊左翼民族主義。七〇年代《夏潮》系統不斷連結臺灣與中國歷史關聯性的同時，另一股現代化的勢力也以中產階級為主推展民權運動，在反民族的分離主義下成為八〇年代本土化思想的先聲。

4.1 現代化運動：臺灣社會力的分析

七〇年代初期，台灣外交正面臨美援的減少及美國與大陸合作的窘境，美國私自將釣魚台承諾給日本引發國內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興起，也就是 1971 年的保釣運動。台灣從五〇、六〇年代曾經被壓抑的但仍暗潮延續下來的左翼思想和傾美的自由派在保釣運動中發酵，後來傾左思想持續運動發展成校園民主運動，對美日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思考及第三世界陣線的連結。另一方面，自由派在外交危機中則主張台灣不能倚靠外部力量時就要從內部的力量站穩⁸⁶。又蔣經國積極培植自己的權力接班人馬，1972 年黨國人事「台灣化」，蔣經國欲提升青年的政治位置，建立新政權在青年中的正當性⁸⁷。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與思潮下，許信良等人⁸⁸合力著成《臺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書。

《臺灣社會力的分析》從地主、農民、智識青年、財閥、企業家、勞工及公務人員做階級的觀察分析，檢驗各階級是否能夠有成為「新興力量」的條件，其

⁸⁶ 「我們嘗試對於台灣的社會潛力以及社會結構做一番分析探討的工作，希望藉著這種分析能幫助大家更深入掌握台灣社會的『力源』，擴大它，培育它，使我們社會的各種階層各種潛力從根本上建立鞏固而深厚的基礎，使我們不僅從此能卻除社會風暴的恐懼恐，而且也不必懼怕外交逆境的動搖『國本』。」(許信良，1972，頁：17)。

⁸⁷ 如《大學雜誌》作為知識分子的大集結(郭紀舟，1995，頁：32)。

⁸⁸ 包括：許信良、張景涵、張俊宏、包青天。

目的在於分析臺灣社會各階層是否能促成以反國民黨為最大公約數的力量。

他們認為企業家是當時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因為在一個還未健全的現代化國家中，臺灣的企業家還不夠自主成熟到能支配政治，在必須倚賴和政府的關係與支援情況下，他們也無法成為有政治意識的社會力源者(許信良，1972：47~49)。另外，因為工業化後農村大批人力釋放到都市中的勞工階級則被認為會威脅到現代化國家安定的社會問題，無組織的勞工是暴亂的導火線，所以為了能馴服這條猛獸，只有組成工會，讓他們透過正當的途徑來獲得滿足，他們會很自然成為政府的擁護者，和社會安定的維護者。(ibid.：62~63)

對許信良等人而言，在七〇年代能夠成為推動社會的新興力量主要是在當時特定的智識青年身上。此書論點便是選擇性地賦予某些取向的智識青年具有改變的力量，是現代智識青年的傾向，而這些智識分子在過去威權體制下他們沒有發聲的機會，他們具有理想又受過教育有知識，政府不該打壓這樣社會變遷的力源者。(ibid.：33~44)

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革和社會運動中確實扮演著反省與知識論述的角色，對於社會的感受、不滿和情緒成為他們介入社會的動機。然而，本書所主張能改造社會的主體實則坐落在具有參政傾向的臺籍菁英⁸⁹，他們建議國家應當重視這群不得志的青年成為國家改革最有成效的社會力。除了訴求開放政治機會給臺籍知識分子之外，文中不乏對省籍、背景差異的不平情緒⁹⁰，但是這些因省籍差異而不同的知識分子和思想狀態則完全不是未被談論的，論者對自我身份認同的不滿，目的是為參政權的取得，而不是多元思想下的主體啟蒙，這種對主體的民粹想像也成為日後民進黨與綠色運動對主體認知的界定和判准。然而，省籍差異所帶來的教育機會和不平等畢竟沒有被認真的對待，省籍之外是否也有階級和性別問題，在此處一樣不被討論。該文僅是以特定的中產臺籍知識青年試圖代表臺灣知

⁸⁹ 但實際上他們的分類又是很粗糙的，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黨國支持者、現代化支持者、現實主義者、自由派、邏輯實證論者、社會主義者等等之複雜性群體。

⁹⁰ 如：有理想的智識分子因為缺乏輝煌的家世和優越的裙帶，而無法在官場有一席之地。(許信良，1972，頁：38~40)

識分子共同期待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為終極目標。

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和主體，現代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在此只是個開端，在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的七〇年代，農業衰退、城鄉差距和都市化都可以被合理化為現代國家發展的一環。七〇年代，臺灣在社會變遷下產生農業與工業社會的不平等和新興勞工階層問題，特別是土地改革後地主階級的沒落，零細化的農地和大量勞工人口湧進都市，在社會變遷中階級造成許多不安因素。論者認為過去封建地主制的穩定狀態在今日受到挑戰，農業人口無疏散之處將會為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⁹¹，是阻礙現代化發展的力量。

本書名為《臺灣社會力的分析》，顧名思義應當是要討論當時臺灣的社會力，也就是「階級」，然而本書未能扮演具有社會意識的論述，反而試圖去除主體的階級差異、一味給予同情，認為地主與農民之間和睦關係是社會穩定的力量，另外真正具有反抗動力的勞工階級卻是應當被壓制的社會亂源，「社會力」在這個思想脈絡中成為一個空泛的辭語。八〇年代後，以現代化發展為目標的知識分子結合環境運動，讓現代化的資本運作和思想宰制一再合理地進行，這不僅影響環境運動的論述方式，不斷消解人與土地的內涵，也架構出臺灣社會運動對主體和階級的想像，發展出去差異化的共同體，九〇年代與本土化意識結合後走向國族打造的社區共同體。

許信良等人企圖突破國民黨以黨國意志主導臺灣的發展，而不在於質疑國民黨的現代化發展策略。他們固然反對黨國威權體制的不合時宜，但反對勢力也在這個脈絡中被整編進一個更合理、更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思考裡。反對者與被反對者有強大的共識：現代化的臺灣才是真正革新與自保的前提(詹曜齊，2007：118~119)。

現代化做為西化的基調，逐漸與臺灣民族主義和本土意識合流，黨國政府在臺灣成為老舊傳統需要被革新的對象，在本土化論述中逐漸與冷戰體制下共產國家(指向中國大陸)被塑造成的傳統、落後，畫上等號。之後此類台獨意識在政治

⁹¹ 許信良，1972，《臺灣社會力的分析》，頁：25~31。

形態上開始進行全面對中國的消除和憤恨，成為政客扭曲歷史的意識形態，當初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精神和抗日愛國精神都付之一炬。

現代化下的知識分子顯然忽視其他社會階層的差異，而以中產階級為主要社會改變的動力，擁抱在西方自由主義的陣營。雖然許信良、張俊宏等人相較「洋」系的知識分子有更多對於本土和底層的關懷，但本質上不脫離中產階級的民權運動。戰後的臺灣在知識文化上大致籠罩在現代化潮流下；政治社會思想上，崇信具有新理性主義色彩的行為主義，以繁瑣的統計為傲；經濟上，以北美洲蓋爾布拉特的「富裕社會論」和羅斯托的「經濟起飛論」為顯學，仰望類似北美洲所自誇的「中產階級」；文藝上則繼承泛稱的「現代主義」，以個人獨特內心經驗的深掘為表現的理論和方法⁹²。

南方朔認為戰後臺灣知識圈的主流思想，基本上是中國自由主義者母國北美洲的延長。自由主義在西方的發展過程是由中產階級推動權力的遞嬗，它的過程是和平的、妥協的，它們定義的「社會大眾」是「中產階級」的。然而，自由主義的始源國實質上是帝國主義，是以亞洲、非洲等地的資源和市場肥沃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在帝國主義侵略下，亞非國家所要求的民族獨立、民權平等和民生自由，自然非自由主義的經驗和觀照對可以理解⁹³。然而，自由主義在中國特有的冷戰、分斷歷史和威權統治脈絡下，不只是移植西方歷史、文化和思想並對中國的醜化，同時斬斷多元思想的可能。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本身就內涵民族分裂、反傳統和民粹思想，而八〇年代中後至九〇年代，自由派的社會運動也並沒有超越這樣的限制。

4.2 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和內涵

十八世紀末因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政治文化開始受到壓力和挑戰，領導精英和知識分子有感從事西化自強運動，在軍事方面作皮毛的西化和模仿

⁹² 南方朔，1978c，〈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三)〉，《夏潮》第四卷第五期，頁：59~62。

⁹³ 南方朔，1978d，〈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四)〉，《夏潮》第四卷第六期，頁：44~47。

有如海市蜃樓。之後有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以君主立憲為目標開啟政治改革卻驚動二千年來的封建專制體制，最後由慈禧太后重新當政，變法失敗亦引發民間支持更加激烈的改革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中國的政治局勢仍然處在軍閥鬥爭及腐敗帝制遺命的內憂外患中。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中國政府要求外國廢除在華的勢力範圍卻遭駁回，並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給日本，列強打壓中國國權和北洋政府「欣然同意」日本辱國的勒索，引發中國廣泛群眾的不滿憤恨而罷工罷課對抗政府的愛國運動，另外中國學生和知青走上街頭要求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推翻封建專制，世稱「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後讓推翻帝制進而富國強兵重建中華文化和發展科學與民主，同時，蘇俄也爆發驚天動地的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以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政權，對於當時中國五四的知識分子而開啟另一視野，陳獨秀、毛澤東、李大釗等人便以反資本主義剝削，為貧窮、被壓迫的普羅大眾請命。另一方面自由民主主義者胡適、蔡元培與反西化、反科學的新儒家學派是五四運動中三派思想立論。

其中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民主主義批判傳統的中國文化，提倡「民主」、「科學」和「全盤西化」的思想，包括胡適、初期的陳獨秀、康有為等人都認為中國文化是古代文化，西方文化才是現代文化，中西文化並無實質差異，只有新舊之別、進步與落後之分，中國要現代化只有棄舊迎新，全盤西化⁹⁴。但是即便語言、風俗可以表面西化，中國的地理環境、人文社會卻不可能拋棄原有的歷史現況，因此當時全盤西化思想有實踐上的困難也未能提出具體主張。

五〇年代後在冷戰體制、美援、美國文化、技術、政治和經濟下台灣長期受到西化崇拜與模仿，1950~70 年在思想、音樂、文化、繪畫等舶來式的「現代化論」與政治上「親美、反共、反蔣」的自由主義、民主運動和民族分裂主義共同缺乏國家民族的自覺與主體性，同樣在不反美帝的立場上與左翼的中國民族主義

⁹⁴ 汪榮祖，1987，〈新文化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文星》第 107 期，頁：24~28。

者形成左右分歧。當時《夏潮》雜誌對於西化思想一方面以政治經濟的角度揭露美國帝國資本擴張與思想文化入侵的事實，另一方面則反省近代西化思想破壞中國社會的民族精神和道統信仰。

在近代思想中，胡適先生代表著反傳統的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在反對東方國家的舊政府和文明而推崇西方的科學方法與個人主義。他認為西方文明不是唯物主義可以說明的，「縱觀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藝，科學，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殺人的利器與侵略掠奪的制度，我們終不能不承認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胡適，1976：14) 透過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啟蒙運動和個人主義，胡適看到法國大革命裡「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人權觀念與階級解放，因此他認為東方文明的樂天安命遏止了新智力和改革的可能。相對的，西方文明追求真理產生了科學世界，在「社會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民權世界，自由政體，男女平權的社會，勞工神聖的喊聲，社會主義的運動。神聖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進化的動力。」(ibid.：15)

胡適思想雖然具有改革和反威權的內涵，韋政通卻認為中國沒有同樣的歷史和環境，那些西方思想仍然難以在中國實驗出來，不論是胡適、杜威和赫胥黎都欠缺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根本無法洋溢起中西傳統會合的智慧，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反而與中國傳統對峙也扼殺了中國文化再生之機。

並且胡適崇尚西方文明的態度將東西文化區別，對於自己的傳統難免落於醜化⁹⁵，若依循胡適所言，中國似乎只有全盤西化一條路可走。韋政通並非全然否定胡適思想中的自由、民主和科學，而是強調在中國歷史傳統的理解中尋求現代化路徑，否則個人主義中的自由反思與解放可能會帶來中國家庭社會的失序，政治自由的民主制度在中國成為傳統的主要對手，形成一股強大破壞力。

「假如年輕的一代，真要相信了胡先生的話，我相信他不會學著去認錯，也

⁹⁵ 「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現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東方文明的知足特色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胡適，1976，頁：17)

激不起『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的雄心，這些話只能助長年輕人的崇洋媚外的心理而已！胡先生說，一個現代的國家，決對不是一班奴才能建造起來的。我們同樣可以說，一個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民族，也無法建造一個新的國家。」（韋政通，1976：22~23）

中國自由主義的學子深受現代化主義與西方中產階級中心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其知識分子是可妥協、可收買的，因而被南方朔批評為是自由的無政府主義，雖然在政治革新上有進步的理念，但因其菁英主義而在民權運動實踐上是倒退的。同時他們也是排斥民族主義的，視民族主義為野蠻落伍，自然無法掌握民族革命的先導角色，另外又視帝國主義下的買辦經濟為當然而完全與民生革命脫節，失去三民主義的內涵自然和《夏潮》系統形成對壘，向「右」轉了一大步⁹⁶。

4.3 七〇年代的階級分析：現實主義、鄉土的左派

知識分子可成為階級的代言人，但不能自成一階級。 —王曉波

中國自由主義和左翼民族主義思想的分歧雖然取之知識學子立場身份的必然，但也反映他們對人、階級、歷史截然不同的觀看。

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延續現代與現實主義的討論，針對什麼是「鄉土」文學展開對話，1977年四月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的〈墳地理哪裡來的鐘聲？〉及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三篇文章為論戰開端及典型。同年八月彭歌則指名道姓批判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三人的文學評論文章，接著余光中發表〈狼來了〉劈頭就說「工農兵的文學，臺灣已經有人在提倡了！」之後對「鄉土文學」的攻擊大量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展開整個論戰⁹⁷。

鄉土文學從六〇年代以來文學思潮從西方文化轉向訴求對臺灣土地的歸屬意識和責任，認為重新認識自己社會生活、歷史和各個層面是鄉土文學家的使命，因此鄉土文學中的臺灣意識實際上是對家鄉充滿人與土地的情感和理解，而

⁹⁶ 南方朔，1978e，〈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五)〉，《夏潮》第五卷第一期，頁：72~76。

⁹⁷ 郭紀舟，1999，頁：201。

這使鄉土文學包含著民族性與社會性。七〇年代臺灣正面臨著美援銳減，同時經濟上正在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階段，社會上則因為保釣運動將過去壓抑的思想有機會發聲，民主主義、愛國主義、反帝反殖民、左翼思想，以及想要更認識中國做為相對於美國的另一種可能等等，思想界正蓬勃發展。保釣運動再次開啟臺灣傾左思潮的激盪，從三〇年代的舊俄思想、五六〇年代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能量在這個契機中再次得到釋放。這股力量在七〇年代以小說、文學的形式出現充滿批判能力和階級分析的傾向。

然而，《夏潮》未將鄉土文學論戰侷限在文學上的討論，而認為鄉土文學的內涵是臺灣歷史尋根和抗爭的過程，因此帶有反帝的民族性和鄉土寫實的社會性，提出三民主義與鄉土文學的關聯，重新認識人、土地、歷史和階級。

任卓宣以為鄉土文學是具有三民主義內涵的文學。民族文學就是站在民族立場維護民族利益，宣揚民族思想，表現民族精神和民族風格，並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在民權主義就是平民文學，就是與貴族文學相反的，一切從人民出發，從群眾出發，並具備有自由、平等的觀念，反對極權主義的統治和壓迫。在民生主義，就是社會文學，生活文學，注重生產、分配，關心農民、工人，民生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共產主義的沒收。這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並且鄉土文學和日治時期那些反抗民族歧視、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具鄉土色彩、關心大眾社會的作家實質上是相同的，論者認為鄉土的內涵就是關懷大眾，重視農民、工人和小工商業者，因為他們是社會的基礎、民族的中堅。資本家是靠不住的，他們愛財如命，情勢不對就將資金外流，完全缺乏民族觀念⁹⁸。

透過〈打牛湳村〉一文便清楚描繪六〇至七〇末臺灣農村人物的生活及困境，宋澤萊以蕭笙和蕭貴兩兄弟的生活道盡在資本主義壓迫下的悲哀。安身立命的蕭笙在永遠不公平的環境下自嘲地生活，而身為知識分子的蕭貴看盡了資本累積和市場交易的黑暗，他雖然嘗試著各種方式與之對抗或欲跳脫資本運作邏輯，卻越是得到沮喪的回應，尤其是打牛湳村的居民對於不平等的待遇往往只是聽天

⁹⁸ 任卓宣，1977，〈三民主義與鄉土文學〉，《夏潮》第三卷第二期，頁：6~7。

由命，使得有點想法的蕭貴無力伸張改變，只感到無止盡的黑暗。

商販對農民的壓榨，以及農民在無組織無資本無議價能力的方式被迫進入現代化市場競爭⁹⁹。農民的無奈、不滿或是企圖反抗也難以逃離資本運作網羅，只有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而能洞察及此的知識分子常面臨到對現實改變的挫敗感、對人民缺乏階級意識的無奈感。農民和工人生活的真實面透露出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壓迫。

〈打牛浦村〉反映出國民政府實行土地改革消除臺灣地主階級，結構的改變將農民農地零細化，中盤商成為解決生產規模零細化與現代化市場效率之間矛盾的產物。農民與農村被壓迫的實況則是隱藏在西方世界資本主義擴張與我國附庸美日的第三世界經濟運作模式，鄉土文學則是反映現實社會箝制於此結構，被支配、剝削和貧困化的揭露與批判。

鄉土，作為一種思想類型反映被殖民歷史的世界觀，將臺灣放在第三世界被殖民國家的歷史架構中，因此對歷史不再是陳述事實，而是「怎麼談，怎麼看」的問題。透過「第三世界」觀重新整理冷戰時期的國際勢力組合，並且指明臺灣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是「黨國－資本」附庸世界經濟中的初級加工經濟，一方面有利於邊陲國家一小群統治者的政治獨裁和經濟壟斷，也能提供多國公司更多機會來吸收邊陲國的利潤，為維持和確保霸權中心與邊陲的關係，整個資本主義系統也得以不斷凝聚資本，進行再生產。因此，在殖民歷史的社會脈絡中，對

⁹⁹「你的梨仔瓜不好，只賣二塊五。」

笙仔和他的妻子都嚇一跳，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當時大家都覺得很囂鬧，隱隱之中聽到有人喊三塊錢。

「賣不賣？」商人又問。

「不賣。」伊的妻子說。

商人便跑了。

那時太陽赤燄燄，大家都想趕快回去，整個市場繁忙動亂，但商人真會計算，伊們只是在那兒拖磨著。大約又過二十分鐘，又有一個瓜販走來，也不看他們的梨仔瓜，便說：「你的梨仔瓜不好，只賣二塊三。」

笙仔摸摸胖胖的後腦杓。想著，等二十分鐘沒賣得更好，價格反倒下跌。他的妻便嘀咕起來。這款的市場，一點準則都沒有！又過了一刻，忽然又走來一個年輕的販仔，伊也是不太用心來看梨瓜的。他又說：「不太好！只賣二塊錢。」

笙仔的妻子終於生氣了。他把聲音提到最高點說：「不賣！」瓜販又走了。

最後頭一個商人又回來，笙仔夫婦急忙以二塊三的價錢賣給他，後來才知道當時市上的行情竟是三塊二！（宋澤萊，1978，頁：232~240）。

臺灣社會階級分析的意識也成為鄉土思想的基本內涵。包含社會大眾的生活和意識，它們刻畫農人、工人、教師、知識分子¹⁰⁰等各式各樣的人們在生活中的掙扎，並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這些作品具有對社會大眾生活的關心及對社會的改革意識，在七〇年代也確實與反資反帝的意識結合發展出左翼的中國民族主義。

鄉土內裡的民族意識雖然是指稱臺灣與中國的普同性格，實則是連結臺灣土地與人民共同命運的意識形態，鄉土文學便是此社會意識的反映與創作，具有人與土地的感情基礎和社會改革的那一面。

然而，鄉土反帝的中國民族論成為黨國機器、保守派和自由主義者扭曲和批評的對象，指控鄉土文學「反帝」卻不「反共」，搞階級對立，1977 年後開始出現大規模對鄉土文學批判和圍剿，分別是針對鄉土的內容被評為是「農工兵文學」，成為防備赤化的對象，另外，指責鄉土文學引起階級對立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這樣的論戰辯駁持續至 1979 年，雖然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政府並未加以介入，但在政策上卻將之以「預防敵人的統戰、分化陰謀」的字句描述之。

國家機器的控制和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取向，七〇年代累積的愛國意識、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在論戰中扭曲帶來對於臺灣被殖民的歷史觀、社會階級分析及第三世界視角的中挫¹⁰¹。人與土地的關係和情感作為環境論述的核心，從七〇年代末的挫折，到八〇年代能夠延續的很有限，尤其是八〇年代後「本土」逐漸取代「鄉土」，所謂的臺灣意識延續冷戰後兩岸的分斷體制，至九〇年代更在政治運作下轉變為對立的統獨二元論。

¹⁰⁰ 如：在陳映真初期(青年時期)的小說內容，知識分子經常在不能言說的白色恐怖和分斷歷史下，懷有不得志與抑鬱心情。他們的結局常常是自縊、發瘋或在性行為中尋求解放與救贖，如：〈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淒慘的無言的嘴〉等等。之後陳映真的小說逐漸走出少年般的憂悶心情，開始轉為對社會和生命的批判，小說中的主人翁開始出現省籍和身份不同的角色，描述出他們各自處境中的掙扎和悲哀，如〈那麼衰老的眼淚〉、〈一綠色之候鳥〉、〈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等，反映出各階級作為主體的自我反省與批判，在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抑鬱中尋求自我鬥爭和解放的可能。關於陳映真文學與思想的轉變請參閱：趙剛，2011，《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¹⁰¹ 林載爵，1998，〈本土之前的鄉土－談一種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挫〉，《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77~87。

4.4 小結：

鄭鴻生形容七〇年代是一首青春的歌，由許多青年的血汗和熱情譜出的旋律，透過鄉土文學和小說，都真實且深刻地描繪底層人民最實際的生活困境，以現實主義表達具有生命的底層吶喊，透過文字也做為一種對現代化、資本主義的批判。這股思潮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發展世界主義的關懷，號召以第三國際的聯合反殖民反帝國的左翼論述。

然而，相對於鄉土文學的另一勢力延續六〇年代中西文化論戰的全盤西方論述而來的「現代化理論」厭惡代表舊有思想、腐敗、落後的共產主義，並認為國民黨為外來政權，省籍區分下掩蓋階級問題，其政治目標是臺灣本土勢力的崛起並朝著西方民主自由、進步文明的社會圖像發展。《臺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書作為現代化意識和台獨思想的經典，也幾乎掩蓋了同時期的鄉土文學現實主義的思潮，成為八〇年代之後本土勢力的起源。

從鄉土的消長和現代派的興起，可以發現他們各自論述臺灣歷史時卻發展出完全不同的路徑。鄉土派根植於中國近代歷史以來的連續性，雖然反共，但認同自身及大陸人民都同是中國人，都共同承襲同一歷史脈絡和文化，當時的民族主義也是建構於此基礎之上，並發展出與第三世界連結的民主主義。另外，透過臺灣日治時期的歷史而深刻明白臺灣的被殖民角色，洞察國民黨對美日的依附發展及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社會實景，鄉土文學也大多是市井小民生活的寫照。而現代派則主張脫離臺灣的殖民角色，跟進美、日資本主義式的「現代」發展，不論是在政策上、經濟與文化皆趨向西化，認為這是民主化、自由化的唯一出路。在冷戰體制的歷史背景之下，更是將共產黨等同於中國大陸，因此一種新與舊、進步與落後的二元分化便形成，而且包括中國的歷史、文化和一切也成為現代派極力欲擺脫的窠臼。

七〇年代隨保釣運動興起的左翼中國民族主義，我認為具有較積極的意義，

靠近趙剛所概念化的「自由民族主義」¹⁰²，這股力量來自人民主體與歷史真實的緊密連結，發展出反帝民族主義及階級分析論述。不過，此民族主義在臺灣並沒有進一步發展成為與第三世界連結(成為一種「民族」身份，非依照血緣、土地或語言)的實際¹⁰³，但它確實與臺灣的殖民歷史及階級運動產生強化的反應來衝撞威權體制。然而，七〇年代末，隨著現代化成為民主進步的象徵以及國家的鎮壓，原本第三世界觀的民族主義轉為在地化、本土化，在臺灣的民主化運動中又因兩岸分斷的歷史及二元對立，發展出以臺灣和臺灣人為主體的本土意識。八〇年代後黨外運動在黨派爭權的過程中以本土化及台獨為其意識形態的工具，逐漸形塑出對特定族群和歷史的認同。另一方面，地方上風起雲湧的自力救濟運動和解嚴後發展的各種社會運動全面興起，它們的論述及實際裡人與土地的關係是如何展現？對於人民、土地和歷史的論述方式及分析，反映臺灣社會的發展仍然是本文所關注，尤其是掌握主要論述的知識分子及書寫視角都引導著社會運動和思潮的發展走向。

¹⁰² 此概念由趙剛在〈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一文中為分析及理解而概念化，文中也使用瑞南(Renan, Ernest)在歷史分析中定義自由主義的公民角色為「一個民族的存在即是每天的平民決議」(趙剛，1996，頁：6~17)。

¹⁰³ 此類相似問題，如：為何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作為一個文化覺醒運動)企圖聯繫自身的歷史傳統、挑戰威權、走出象牙塔進入民間的行徑，無法在台灣形成一個持續的思想運動？趙剛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回到冷戰結構、國民黨政權、現代化意識形態霸權的歷史及思想結構來理解，說明在意識形態的控制、對歷史的扭曲和分斷體制下，左翼思想與知識分子沒有可承襲、可生長的在地的歷史資源是需要被重新建立起來。參閱：趙剛，2011，附錄一〈陳映真對保釣可能提出的疑問〉，《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第三章 風起雲湧八〇年代

從五〇、六〇年代以來快速工業化、科技化的發展主義，林俊義說明人類的經濟活動與生態發展息息相關，人類的發展需要在自然界可承受的範圍裡節制，並且經濟活動的發展策略需要政治、社會、經濟與生態學各方面的評估，否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引進科技時常造成反發展的效果¹⁰⁴。

第三世界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在環境問題的處理與解決方式並不相同，但由於國人並未注意到此差異，一味引進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而未能察覺西方科學化約主義鼓勵追求利益、個人主義和放任的民主政策，造成公害輸入和嚴重的生態破壞，所以林俊義呼籲國家要建立起整體經濟的生態觀和中國化的科學與科學家。

相較《夏潮》雜誌談反公害背後宏觀的中國現代史和反西化思想，林俊義的生態論述看似只有部份的交會，並無實際的理論深根。然而，作為一個生態學者林俊義曾經處在保釣運動、學生民主運動和反資反帝的氛圍中，他的論述確實鑲嵌在這歷史的洪流裡，因此也曾義憤填膺的反對跨國公司輸出汙染和西方軍事化的科技公害，表達他的生活哲學；並且在生態環境面對現代化發展時，提出生態學與經濟學之間的平衡與應用。

七〇年代《夏潮》雜誌以反帝反資的中國民族主義作為反公害的語言，然而包括《夏潮》系統反西化與中國文化的思想能夠延續下來的很有限，環境論述也隨著現代化主義、本土意識、威權體制鬆動後的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而產生截然不同的內容。八〇年代的反公害議題是否還持有人與自然的一元論及第三世界國際觀的反帝反資的論述？在資本主義衝擊傳統農業社會下產生反省現代化經濟復甦的論述和自力救濟運動，發展出怎樣不同的抗爭語言和理論基礎？透過環境論述的轉折、《人間》雜誌宏觀的政治經濟學與深厚的人文主義刻畫這風起雲湧的八〇年代。

¹⁰⁴ 如：埃及阿斯旺水壩和非洲的綠色革命。原文參照：林俊義，1989a，《台灣公害何時了》，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頁：53~60。

(一)、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

1.1 背景：

1971 年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所造成的法統危機以及 1973 年的石油危機引發的世界波動，構成對國民黨政權戰後的首度危機。不過當時反抗力量並未成形，並且在蔣經國政權的接班部署中號召「十大建設」舒緩了國內低迷的景氣，展開黨政本土化政策，大舉推荐台人進入政權核心，成功地閃開法統危機所糾結的歷史困局。

受到東、西冷戰體制制約下的兩岸對峙，使國民政府在僵持的國家意識中，藉由美援基礎形成的國家資本走向資本主義世界分工的邊陲道路。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為台灣經濟帶來緩慢性的影響，持續的經濟成長在八〇年代以成為明日黃花。一方面 1978 年美國與大陸建交讓台灣的國際地位遭受重大變化與挫折，在兩岸關係不明的情況下，台灣資本無法再擴大投資，同時馬來西亞、泰國、大陸等地區成為新興低工資提供國家，對台灣部份輕工業外銷產品構成威脅。此外台、韓、港、星等新興工業化國之間的競爭日漸激烈，台灣產業長期不做研究發展開發的投資，一時間無法向高附加價值、高資本、技術密集產業投資，產業升級面臨難以突破的瓶頸。另一方面，先進國的經濟力衰落，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對台灣各方面支配力強迫限制對美輸出，增加自美輸入。然而，五〇年代以來累積的經濟發展已使勞力密集加工外銷產業碰到它的極限，工資逐漸上漲超過勞動生產力，動搖過去 20 年台灣加工出口產業的基礎。

經濟成長進入緩和期的同時，長期作為社會底層根基的農業在低米價政策、肥料換米制度與其他工業產品與農業產品不等值的交換下嚴重衰退¹⁰⁵，並且台灣資本主義擴張下的工業化、都市化造成耕地零細化、農村勞動老化與農村土地、水源和空氣的嚴重汙染，長期被壓抑的農工階級則在普遍的汙染現象與農業衰退中陸續展開自力救濟與抗爭行動。

¹⁰⁵ 1953 年到 1973 年之間，台灣農業成長率一直維持在 4.4%；1974~1979 年降為 3%；80 年以後，再嚴重下降到 0.3%。(李疾，〈如果他們在為台灣農業料理後事〉，《人間》第 37 期，1988，頁：122~125)

此外，六〇年代中國民主黨遭嚴厲打壓後，第二波的組黨運動在七〇年代展開，大致以 1975 年 8 月〈台灣政論〉為轉捩點，主要訴求都以「反對法統扭曲體制，建立民主憲政」為重心，其組成人員縱跨地方勢力、政治犯、知識分子和律師，已經隱約顯現出黨外運動的雛型。1977 年舉行五項地方公職選舉，「黨外」一詞更進一步成為各地精英的共同參選符號，之後爆發的中壢事件展開另一波的組黨運動。從 1960 年《自由中國》到 1979 年的《美麗島》，其間雜誌名稱的改變實則也象徵出兩代反對運動在國家認同上的迥大歧異，包括 1976~77 年鄉土文學論戰後所深化的本土認同為日後黨外運動與本土意識帶下深遠的影響。

七〇年代保釣運動和台灣社會結構的巨變，反帝的民族主義、社會正義、國家統一的思潮湧起，台灣文學也展開對社會、民族與生活的全面反省，針對西化思想與文學提出中國歷史的民族性與社會意識，1978 年鄉土文學論戰即是針對外來的、西化與反中國民族主體性的文學，提出台灣經濟結構與階級分析，包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第三世界冷戰結構等重要的問題。左翼的中國民族主義自保釣運動以來成為反帝反資的主要論述語言，但這民族的民主主義並沒有能夠落地生根，七〇年代的台灣在國府唯恐赤化及右翼西化派的打壓中進入尾聲，台灣文藝與思潮至八〇年代，反民族、西化主義、無歷史、無民眾的現代主義在依附冷戰/民族分裂/國安體制下持續蔓延。

1987 年解嚴後，各階層的抗爭運動興起為環境運動擴大參與主體的可能性，知識分子、婦女、學生的介入為環境運動和論述帶來理論的深化和對台灣既有黨國政經結構的批評並在彼此結盟中形成龐大的反對勢力。然而，自七〇年代以來歷史思想的斷裂、左翼思想的貧瘠、中國自由主義的右傾性質和黨外組黨運動，以台灣意識為主體的本土論述限制了八〇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社運的力量(包括環境運動)集結為反威權的勢力，所謂民主實踐著重在選舉制度和取得政權，知識分子的論述逐漸無力對社會現實有深刻的批判與理解，在冷戰、國家安全與民族分裂的歷史結構下自主社運和公民社會都只是非歷史的主體。

1.2 台灣公害何時了

1978 年以後，隨著發達的經濟活動、跨國公司及引進生化科技、核能電廠等，「經濟發展的途徑與措施似乎變成了一隻魔怪，其最終的目的是，年終的營利額、成長率。這隻魔怪有幾隻大怪手，一面毫無顧忌的剝削環境與資源，一面用盡心思創造慾望，鼓勵消費。它絕不過問它的作法有什麼生態後果，會對人體有什麼影響，只要能銷售賺錢，能夠成長，就是最終的目的。」(林俊義，1989a1：61)

發展主義下的策略導致的是更嚴重的環境汙染，從〈環境的瘋狗—多氯聯苯〉、〈污穢的春天〉、〈死定的環境〉等文章可見林俊義對於汙染現象的急迫呼籲：「臺灣經過三十多年來的工業發展，環境破壞到處亮起紅燈。可是大家仍視若無睹。由於臺灣工業發展迅速，公害汙染四併八發，政府、工商業及民間如不快馬加鞭的尋求改善之道，總會有被汙染淹沒傾覆的一天，屆時再發出活著也沒有什麼意義的悲鳴，為時已晚矣!…。」(林俊義：1989a2：96)

過分強調「經濟」的原則加上政治經濟結構視環境為剝削的對象，促成快速的都市化、財富累積、人口增加及資源私有化、環境危機因而加速是嚴重汙染的導因。但是人類生存離不開自然環境，「一味的以成長及增加個人所得就以為改善了生活素質是錯得不能再離譜的觀念；一味的以為經濟不斷成長，環境的破壞也會自動的慢慢改善，也是離譜得無以復加的想法。」(林俊義，1989a3：94)

「林文」以埃及阿斯旺水壩與臺灣的達見水壩的例子，說明在環境開發和建設上若忽略整體的生態評估會造成水土流失和水壩淤積而帶來更嚴重的後果。由於臺灣海島地形不像大陸國家腹地廣大有緩衝修復的機會，在各種工業工程的發展上都需要有全面的評估，因為生態學與經濟活動是相輔相成的，若環境遭受破壞不但降低生活品質，也使經濟發展難以持續。(林俊義，1989a4：53~60)。

「七十年代所發生的環境危機使我們深信經濟分析必將慢慢的『生態化』，而生態分析也必將慢慢的『經濟化』，換言之，在一個國家發展中，生態學與經濟學將並駕齊驅；不是生態學家要同時變成經濟學家，就是經濟學家也要同時變

成生態學家，或彼此互相合作配合，始能使資源達到合理性的利用，人與環境共存。」(ibid.：59)

人與自然既然無法分割，那麼公害問題就不能視之當然，林俊義更進一步指出「環境公害的難以解決並不是技術性的困難，而是政治的、經濟和文化因素所使然，蓋環境公害的發生是由我們的生產與消費型態產生的後果，反映我們的文化價值觀，而非一般人要我們相信的是進步、成長和發展的必然產品，更非是偶然的差錯或一時的失誤所致。現代科技的進步更大大的加速破壞的能力及嚴重性。」(林俊義，1984a5：79~80)

人與自然二元化的觀念出現後，進步的定義即為工業科技的成長，隨著價值中立的科學觀及物質主義使全世界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漠視環境的存在。因此，要解決環境問題不單了解環境與政治經濟的關聯，還要把政治與經濟的危機以生態的觀念加以解決。

1.3 農工相剋

林俊義不斷提出對發展主義的反省和批判，並且他也注意到臺灣工業成長的背後，是來自於對農業社會的不斷擠壓。二次大戰後臺灣境內百廢待舉，農工生產力十分低落，政府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及打破地主佃農之間的不合理關係，於 1953 年實行耕者有其田以提升臺灣農業的生產力，這項政策在 1955 年以後的經濟成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¹⁰⁶。然而，七〇年代後農業開始式微，在持續快速成長的經濟政策中把農業的剩餘價值轉移至工業部門，臺灣工業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依賴經濟下的產物。

1982 年政府積極推動「農業機械化」與「第二次土地改革」以解決農民外流至都市和工廠的人力問題。但是，農業機械化雖然取代人力，卻難以減低農業生產成本。第二次土地改革則將農業部門視為企業對象，以「市場經濟」作為取捨的標準，農民仍然是失落的一群。另外，再以石油為基礎，以外銷經營為方向

¹⁰⁶ 林俊義，1989c1，〈台灣農業的再思考〉，《自然的紅燈》，頁：78~85。原文收錄於 1980，《時報雜誌》第二十一期。

的政策下，將使台灣農業部門陷入依賴泥漿，糧食的供應更加依賴國外的進口¹⁰⁷。

對於這種「犧牲農業，培養工業」的策略林俊義提出警告。

「堅持資源必須不斷投入工業部門的政策，工業部門會一天一天的產生人為的膨脹，農業部門卻一天一天的蕭條。農業部門一旦擠不出剩餘價值至工業部門時，工業部門又無法集結轉作加速發展投資之用時，整個經濟成長的策略也就隨著崩潰。」(林俊義，1989c1：81)

而且市場交易的條件不利於大多數貧窮的農民(如：糧價低落、製造品昂貴)，導致農民所得偏低，擴大農民與非農民所得的差距，在這惡性循環中農業生產低落會危及國家根本¹⁰⁸。

再則，國內不斷引進跨國公司的農業經營方式，由同一公司一貫經營：從農機、農藥供應，到農場經營、產品收購、食品加工與運銷，以獲取最大利益。但卻忘記開發中國家農業的複雜性和脆弱性，在機械取代勞力的情況下造成各種社會問題，在現代化的農業經營方式中也加速自然環境的破壞。外銷的農產品若取代糧食成為主要的農業生產，不但在市場困難時會發生糧食短缺，也讓基本的民生問題有依賴進口產品的危機，而「依賴的農業將逐步墮入經濟、政治及社會的依賴。」(林俊義，1989c3：70~71)。

以美國為例，1978 年在卡特總統執政以來，美元下跌、物價飛漲面臨經濟大蕭條的困境，就是因為農業商業化的經營方式過度地依賴石油能源。如今美國農業表面上年年增產，是因政府動用國庫下令拋荒農田來保持高糧價，並且以龐大農業公司進行國內外對農民的壓榨。但是糧價增漲畢竟有個極限，加上使用大量化學物品破壞生態，造成惡性循環，使得投資不斷上升，農民負擔越來越重，美國農業的生產制度不但不符合生態能量「淨額」與「毛額」的概念，還違背一個生態體系能量流動的法則。

¹⁰⁷ 林俊義，1989c2，〈農業無用論〉，《自然的紅燈》，頁：151~154。原文收錄於 1982/2/26，《自立晚報》。

¹⁰⁸ 林俊義，1989c3，〈農業商業化的危機〉，《自然的紅燈》，頁：69~71。原文收錄於 1979/1/11，《工商時報》。

林俊義認為全世界像是一個相互依賴的生態體系，均依賴自然生態與能源，這也是全世界人民與國家必須彼此互助互賴的原因。然而，美國因其農業生產制度引起的能量逆差無法從自己本身的體系中得來，一定要從其他生態體系來彌補差額，這就是美國每年從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大量進口石油的原因。在石油危機的政治經濟壓力下，美國對於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漲價戒慎恐懼，甚至拋棄自由市場的原則，民主自由的信念和美國精神，威脅出兵侵佔油田。因為沒有石油，糧食生產制度就會崩潰，美國的生活形式及文化體制就無法維持¹⁰⁹。

反觀中國的農業制度是能夠生產淨利也符合生態體系能量，能夠使自我的生態體系循環下去，建立以農立國的社會支持龐大的人口，創立自己一套獨特風格的文化。「我們相信國內的農業生產制度，應從中國的傳統生產方式加以創新，萬不可囫圇吞棗，模擬他人。」(林俊義，1989c6：55)

自七〇年代以來林俊義便呼籲人們不要過度相信西化的科技和經濟途徑，雖然「現代化農業」(或稱為工業式農業)主要利用機械耕種操作、化肥、農藥、灌溉、科學管理與「綠色革命」技術帶來高產量和高效能、省時省力，表面上看來是增加農產和解決糧食問題的唯一現代化途徑，但隨著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推廣，它的破綻也顯露無疑，不但造成嚴重的生態問題，還因為農業生產機械化讓農業過分依賴有限的石油能源，及農作物單一化帶來嚴重的飢荒災難而增加農業的不穩定性。

開發中國家在現代化農業的科技中走向「超級工業」¹¹⁰ (Superindustrial Society)的社會結構，也就是原本依靠自然資源的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以石油能源(無法再生資源)為主的生產方式，並且「農業人口越來越少，服務業人口越來越多；新興的『農業企業』(Agribusiness)與工業反而成了服務業的『經理業務』的附屬部門。…然而幾乎所有開發中國家的科技官僚們無不以『超級工業社

¹⁰⁹ 林俊義，1989c6，〈從生態學看世界〉，《自然的紅燈》，頁：49~55。原文收錄 1978，《中華雜誌》第 176 期。

¹¹⁰ 見圖一。出處：林俊義，1989c4，〈談現代化的農業困擾及出路—兼論中國農業前途的抉擇〉，《自然的紅燈》，頁：86~135。原文收錄於 1980，《中華雜誌》第十八卷第二〇六期。

會』的現代化農業為追求的目標。他們對這些明顯的事實卻視而不見，不考慮那些再三出現的因機器取代人力造成的都市貧民窟等社會問題。」(林俊義，1989c4：108)

他引用舒馬赫的話來描寫當代工業社會下的公害現象：「純粹以利益為前提的工業化社會，把農業包含在單位人工價值體系中，破壞了農業的自然組織的循環性。農業的工業化，分開了耕作及牲畜，使其專門化，更顯然地發生了『公害』。」(ibid.：123) 這樣的公害意義不只是破壞環境的循環法則和農業的生產原則，更是將人和土地納入工業化下的理性控管。

「現代工業的基本『原則』，則是從事一些人為操作過程(mandevised processes)，認為只有人造的無生命物質才可靠。…人造的機器工作起來也比『像人類有生命的東西』更賣力、更可靠、更能預測。工業的理性是剔除有生命的因素，甚至於包括人的因素在內，把生產過程交給機器去管…。」(ibid.：122)

七〇年代，《夏潮》體系的「公害」代表著具有帝國資本主義的侵襲現象，至八〇年代「公害」就是「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工業」所引起的環境汙染與破壞(ibid.：124)，這是中國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深受科技移植主義下的結果。

「現代化社會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指標，那就是一個社會農業就業人數比率越少，就越現代化。這個似是而非的指標是循由美國農業生產制度而演化出來的。」(ibid.：82) 現代化農業強調的農業機械化、商業化和擴大經營面積等並不適用於臺灣，但是許多人對現代化農業的認識有所誤解，在科技移植主義的影響下走入西方現代化的彎路，染上科技鴉片的毒癮。

林俊義認為「我們不贊成的是一些對『現代化』觀念的混淆及誤解，認為現代化即是『西化』，就該科技掛帥(或經濟掛帥)。我們不贊成的是對科技的狂熱及迷信，認為科技可以解決一切困難，是萬靈丹。我們不贊成的是與現代化俱來的虛榮面。我們不贊同的是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而不考慮現代化的『民族性及地域性』。」(ibid.：87、89)

中國和臺灣在面對農業改革時要依循著什麼方向？什麼模式？林俊義不斷

與現代化農業對話，並且提出「超工農業」¹¹¹(有機農業)的方式說明中國農業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落伍的，甚至我們自己也承認這點，不過許多誤認為中國農業的「缺點」已經被西方國家當成「優點」看待，像是有機肥料、間作、水產養殖、漁禽綜合生態農場等等。

「總之，中國農業的操作方式及基本結構上都具有了『超工式農業』的許多特性及要求，不像『現代化』的『工業式農業』是處於完全對立的地步。…中國對『超工農業』的抉擇，將會為中國帶來個愉快的、迅速而健康農業進展，會給中國帶來一個真正迎頭趕上，免除重走西方現代化彎路的機會。」(ibid.: 128~129)

林俊義以臺灣農業政策與發展為關懷，說明農業部門不能與工業部門相提並論，商業化的農業經營方式會帶來環境破壞、國內農業萎縮與外銷產品取代糧食、機械取代勞力，讓我們從自己自足的生態體系轉為依賴性的農業。但是當今政經計畫者常以為農業及農民是現代化社會的絆腳石，其實農業扮演一個穩定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的複雜角色。

「林文」不斷提醒臺灣在依賴的科學和依賴的農業政策的背後是美國科技文化和跨國公司的侵襲，並且西方現代化策略會讓我們失去以中國民族、地域和文化為思考的決策方向。從七〇年代末以來，林俊義的環境論述仍然交織在《夏潮》體系歷史化的政治經濟學中反抗西方帝國資本主義下的現代化科技和公害汙染，以人與環境相互調和的整體觀作為論述語言，認為中國的思想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出路。

林俊義引用《逸周書》〈大聚篇〉：「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認為中國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思想竟然在環保護法上就能如此現代和進步¹¹²。

「以現在生態學的知識，我們也得讚嘆我們老祖宗的睿知；他們知道生態學最基本的法則：一個社會如利用自然資源超過環境的負荷力時，一定會招致毀

¹¹¹ 見圖二。

¹¹² 林俊義，1989c5，〈我們該羞愧汗顏〉，《自然的紅燈》，頁：136~139。原文收錄於1981，《時報雜誌》第九十九期。

減。…中華民族能持續五千年，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產生一個環境維持平衡的哲學。」(林俊義，1989c：139)

自 1976 年林俊義提出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後，他的環境論述延續人與自然一元化的整體論，說明中國儒家思想是東方的生活哲學，這種生活哲學表達了對中國思想、土地和人民的認同與情感，並且具有中國傳統意義的整體觀是人民持續不斷享用的永續概念。

1.4 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學

1983 年韓韓以溫柔的筆觸刻畫臺灣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認為它們都是有歷史的，並且在幾千萬年來默默地承擔生態系統中最基層的工作。然而，人類自私的開發和傲慢的科學文化造成大自然的悲劇。

「人和推土機，在這裡不折不扣是一個文明極致後野蠻的入侵者，應該感到羞慚和汗顏。人類屈服於開發效益、經濟成長的考慮，著眼於一時經濟利益，用推土機殘忍地消滅了自然界千百萬年才孕育出的物種…。」(韓韓，1983a：21)

自然資源和土地不斷地在經濟發展中被破壞、犧牲，甚至人們對於生態的價值有一些錯誤的觀念，認為這些動植物若沒有實際的經濟價值就沒有保留的意義。

「『征服自然，宰治世界』是現代功利主義的精神，這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癥結。如今這種西方文明的基本信仰正面臨嚴重的考驗。首先是能源危機，告訴我們大自然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再者，成長和進步是否是一個絕對價值，在今天愈來愈值得懷疑。工業發展，人類好逸惡勞的貪婪造成了各種生態環境的破壞。」(韓韓，1983b：67) 什麼才是真正的文明精神？過度崇拜科學、物競天擇和人類恣意開發的今天，已經看見我們的自然環境所付上的代價。

在臺灣面臨西方文明和價值的衝突及工業化後惡果的同時，韓韓認知到在西方的價值體系中，要維持生態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東方，中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儒家思想卻成為人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智慧，是一種整體宇宙的概念。

我們中國人有我們的思想傳統，就是要將自然資源留給子子孫孫，「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這裡是我的國家，我們愛護這裡，……我們本都要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存，一代又一代，就像這水筆仔一樣。」(韓韓，1983a：31)。並且「『人』應該是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中國人應堅信，如果世界上任何科技—包括解決地球生態環境的科技—如果不考慮『人』的因素，則一切都等於零」(韓韓，1983c：266、267)。

「現代西方，已經逐漸有『唯有萬物並存，人類方可生存』的觀念，這個觀念，是他們繞了一個大圈子才找到的。而我們中國的儒家所主張的和諧與平衡，早已在幾千年即洞明先機。儒家強調的是一個融通親和的關係，這種思想，在今天生態環境失調的社會，尤足發人深省，令人深思。」(韓韓，1983b：67)

韓韓在關懷生態的問題中越來越明白，「生態環境問題到了最後，不過只是一個哲學的問題罷了。它應該是地球人類對近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化』和『現代化』迷思一個反省或不反省的問題。」(韓韓，1983c：226) 北方先進國家創造不斷獲取自然資源的生活哲學，但「我們不能要求北方國家們先去改變他們的文化及價值系統，可是我們似乎可以不要汲汲營營去追隨他們的文化及價值系統，不要將無價之寶的本土天然資源以廉價賣出，去換取對我們並不適合的高度經濟成長，努力地向『第一世界』或『已開發』工業國家看齊，學習工業社會對資源的剝削，擁抱工業社會的價值。」(韓韓，1983d：124)

然而，台灣在強有力的外來商品經濟壓力下，很自然地在社會上產生享樂主義、拜物主義及眼前主義，整個社會就很容易失去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培育出來對自然敏感度及對資源的道德觀。

「一個社會一旦失去了傳統文化臍帶的關聯，而盲目地追求看不出方向的『新』文化，後果是不難也不堪想像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開發中的國家一旦擁抱商品文明後，環境破壞及生態汙染更是變本加厲，比已開發國家更加可怕嚴重，整個社會更有不在乎且莫可奈何的麻木心理。」(林俊義，1989c5：138)

韓韓在以整體生態觀說明中國天人合一的精神，呼籲國人在環境問題上不要

做自己的殖民主—為了發展而奪取自己國土的資源和人力，她一方面關懷著生態問題，洋溢著對於鄉土、人民和國家民族的熱愛；另一方面卻也清楚指出工業革命以來的西化與現代化是我們不得不慎思的問題。這回應了七〇年代反公害的文化內涵，在生態汙染背後還隱藏更龐大的帝國資本結構與意識形態。

1978~1983 年間林俊義和韓韓的反公害論述試圖與現代經濟對話，闡述經濟的發展要能節制，在人與自然合一的整體觀中以中國思想與生活法則作為主要的語言，雖然他們的論述在當時還未直接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但也都先見地指出在現代化工業社會中人和土地的關係不斷也分化、被忽視甚至是疏離，並且以一種新的理性管理來定義人的價值。這個巨大的現代化結構如同烏雲一樣籠罩在八〇年代的上空，促使人們開始產生對自我的認知與自力救濟的反動。

(二)、《人間》實況

從七〇年代開始臺灣作為美日加工出口和市場的據點，利用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外資投入，不斷引進資本主義和工業化設備，衝擊著國內的生態環境和農業社會。然而，工業化帶來的不僅是環境汙染，也是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結構的改變，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盛行和農業衰微與人口的流失，衍生出城鄉差距和三農問題。八〇年代台灣社會由農轉工帶來巨大的社會變遷，環境論述也有別於七〇年代而出現更多貼近地方、人民和土地的報導，將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如何侵蝕農業傳統社會的面貌真實地呈現出來，並產生新的語言和論述方式。

2.1 失落的土地

八〇年代初期，公害所造成的汙染事件頻傳在各個地區，隨著台灣工業化發展相應汙染事件的擴大，1980 年初期桃園大潭村高銀化工鍋汙染及台灣西部從南到北難以回復的海岸線，到大里反三晃藥廠開始，汙染和死亡事件逐漸擴散，恐懼和憤怒開始蔓延在台灣各個鄉鎮。

1986 年《人間》雜誌從《悲泣的河海》專輯開始報導工業化後工廠林立改變農村原有純樸的面貌和自然環境，最明顯的是在台灣的西海岸：「遠望興達火力發電廠那兩支高大的煙囪，在低深陰暗的夜空中噴出兩道濃濃的黑煙，隨著海

風撲面而來，帶來一股難聞的煤灰味道。在夜空中，還不停有遠近工廠機器在操作開動的噪音傳來，讓人具體地感受到台灣工業發展的脚步，早已入侵到這個原本寧靜、恬適的濱海鄉間，而且毫不保留地、盡情地在欺凌這一片土地、水質、空氣和生態。」(王家祥，1986：108)

自 1984 年中油公司與台電公司分別在興達港灣上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及火力發電廠後，牡蠣的養殖範圍就不斷縮小，並且造成牡蠣死亡、蚵肉變綠的情況，工廠入境不只破壞環境造成汙染，也改變原有農村、鹽田、魚塢、蚵棚的景觀。政府徵收了所有養蚵土地將內海填平為海埔新生地，欲在西海岸設立臨海工業區等待外人帶著美金資本來台建廠，但是投入巨大資本鋪設道路、建設公共設施之後，卻又遭逢世界性經濟不景氣使工業美夢成為泡影，任其荒廢至今¹¹³。

農村生活和自然資源曾經是人民生活的記憶和賴以為生的方式，如今在工業化的侵蝕中不僅破壞永續經營的概念，也奪取農民的生產工具，在海洋、溪水和農田都逐漸變得汙黑惡臭的情況下，傳統的農業、養殖業都出現危機。

「民國 73 年在興達火力發電廠排水口附近放養的牡蠣，死亡率就已高達八成。…看見漁民一張張粗獷、悲愁的臉孔，望著嗚咽的海水翻打、碎裂在岸邊…一切都令我們感到那麼無奈和哀傷。那世代以來和漁民、蚵戶、鹽民朝夕為伴、相依為命的海水、河口，眼睜睜地看著即將從此因中毒、重病、重傷而死亡。」(王家祥，1986：111)

臺灣的養殖業已經面臨破產階段，牡蠣暴斃的情況一直惡化，毫無改善，政府卻沒有一貫的公害防制策略，化驗單位也總是避重就輕、迴避責任惹得蚵民煩擾不寧。

「驗、驗、驗！我們還得擱下手邊的工作，用竹筏帶著他們出海、進港，結果也沒有給我們任何交待，也沒有傳達出我們的心聲，來來去去像觀光客一樣。」(ibid.：112)

¹¹³ 王家祥，1986，〈綠牡蠣的惡夢海岸—台灣養殖業破產倒數讀秒的緊急報導〉，《人間》第 7 期，頁：106~116。

最後，雖然驗出銅離子汙染是造成蚵肉變綠的主因，但是牡蠣一夕間猝死卻是因為發電廠排放的水溫過高，使得海水溶氧量降低所導致。政府不負責的態度和不落實的檢測取締無法有效防制公害事件，農漁民在無處投訴的情況下只得將激動的情緒和怨氣化為實際的行動。

1985 年後隨著汙染事件擴大，臺灣各地都相繼出現嚴重的公害事件，農村原本純樸的生活一夕之間開始被迫面對的巨大工廠帶來的生存危機。

首先，台中大里在三晃藥廠排放廢氣之下，居民產生嘔吐、頭暈胸悶和皮膚長瘡的現象，並且大里溪充滿工廠排放惡臭的廢水，農民已經不敢赤足下田，造成大里鄉「水不能喝、雞不下蛋、豬養不大」¹¹⁴的情形。當地的居民氣憤地說：「從三晃在塗城路開工時，造成大里溪的魚翻肚至今已經十幾年了，也沒聽說過改善了什麼，卻一天一天越來越嚴重。」(潘庭松，1986：61)

鄉民投訴無門也曾向立法院、省主席、縣政府、省政府衛生處等公家機關請願但是都毫無結果，在政府公權力不彰之下，大里鄉民自己成立「公害防衛會」一方面要求三晃工廠三年內停工遷廠的切結書，另一方面向縣政府提出組織成立申請，認為保護家園是鄉民共同的責任。

再來，是桃園觀音鄉大潭村陸續出現鰻魚苗死亡和罕見疾病患者(痛痛病)，化驗水質才發現井水含鉛含鎘量皆超過安全標準，而肇因者是位於茄冬溪上游的高銀化工廠。原本安寧的農村因為鎘中毒事件產生恐慌，連飲水都需外界供應，加上農地已嚴重受到鎘汙染成為廢地無法耕作，農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如同台中大里鄉的村民一般，大潭村民也多次向政府請願而不得回應，只得走向抗爭運動。

大里反三晃和大潭反高銀的事件是台灣經濟發展三十年後與其他工業化發展國家不可避免的過程。潘庭松認為「從世界反公害運動史來看，反公害居民行動受到工廠資方和政府的抵制，是常見的一個階段。但是這個階段過去之後，資方和政府都會正視公害的嚴重性，通過立法，有效改善和管制公害的惡化。當然，這需要一個容許居民反公害運動的民主主義。」(ibid.：66)

¹¹⁴ 潘庭松，1986，〈水不能喝、雞不下蛋、豬養不大〉，《人間》第3期，頁：56-68。

然而，政府處理汙染的效率不彰讓居民飽受遷村和病痛的苦楚，在資方鉅大投資中未能以客觀公正的立場出面調查與仲裁，而加深社會的不安。採訪記者官鴻志認為在處理公害上，政府應當堅定站立在人民利益這一方，並且對於不能不自力救濟的受害者反公害行動應給予鼓勵和支持，並有效解決公害問題（官鴻志，1986：21）。

其實政府處理公害事件的緩慢態度以及總是「絕對安全」的保證和國家發展主義的策略與依附經濟有關。以台灣的核電廠為例，自核電廠興建後生態破壞、工人猝死和罹患惡疾事件不斷，如同大里和大潭的村民一般，核能電廠興建時也曾為在地人民帶來「工業發達可增加就業機會」的想法，甚至在對科技模糊不清時，當地人還認為核能電廠是現代尖端科技的代表，建在自己的家鄉是一種光榮¹¹⁵。但是 1985 年七月份位於恆春的核三廠發生大火意外，加上隔年蘇聯烏克蘭地區發生的車諾比爾核能電廠意外事件，讓人民聞核色變，因為小小的臺灣島上竟然有三座核電廠，第四座竟然還在計畫動工中。（李明，1986：88）

《人間》的知識分子們意識到核能工業實際上是整合在跨國企業、軍事需要的獨裁科技。核能作為人類史上無前例的巨大工業之一，其科技知識、資金和技術都遠遠超過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決策者所能理解的範圍，對於它的風險、安全性、幅射範圍及副作用，還有核廢料的處理都仍有許多未知數，許多發展中國家卻在以經濟成長為宗教的迷思中建立核電廠，這反映的不只是對「科技」、「進步」、「繁榮」、「發展」的崇拜，也是對於人類一切存在、創造和文化意義的發問（ibid.：92）。工業化不只是破壞原有的農村生活與面貌，更是輸入一種新的生活態度，讓我們對於土地自然的意義和人的態度產生分歧。

2.2 覺醒吧！自力救濟

八〇年代發展主義盛行的臺灣，以追求物質、利益和快速的觀念讓人心在為財貨物資不知饜足的貪慾中狂奔，瘋狂、無知、全面高速地破壞自然生態。

像是寧靜優雅的美濃黃蝶翠谷原本擁有三十多種蝶類，如今卻遭到捕殺、外

¹¹⁵ 李明，1986，〈核電危鄉行—徘徊在核一、核二的邊緣〉，《人間》第 8 期，頁：84~93。

銷的命運而大量減少中¹¹⁶。自十九世紀初，日本的昆蟲研究所在台灣南投縣埔里，正式成立昆生昆蟲採取製作中心，這是利用蝴蝶翅膀製造及出售裝飾用的手工藝品的商業之始，也是台灣蝴蝶工業的肇端。面對將自然界整合至工業化的蝴蝶工業，恣意的破壞自然、屠殺野生動物，洪素麗反省中國人對於大自然藐視態度：「我們曾經有過『天人合一』的觀念，那只怕是個假象罷了。…我們的『人文主義』的觀念是利己排他的、自我中心的、沙文主義！」(洪素麗，1986：39)

如今全島各處開發、築路、建遊樂區、觀光區、發電廠等，將台灣的自然景觀弄得面目非，像是美濃這樣豐富多樣的生態環境，如今也只有消失的命運¹¹⁷。

另外，臺灣東部偏遠的吳江村本來因開發較遲而保存較完整的自然生態，「但近十年來，遷移到東部的人口卻不斷激增，大量的土地被開發成農業用地，殺蟲劑、化肥、農藥一再撒佈在這一大大片新闢的農地上。小樹林砍倒了，山坡上翻開一片又一片褐色新耕的泥石。」(心岱，1986a：85)

鄒運寶和他的鄉親，在那遍遠的小村莊裡也毅然地起來，為那受盡傷殘的小溪立下禁止毒殺的警戒牌，對無知和貪慾，放大聲說出了大斗大的一個「不」(ibid.：84)。

環境樣貌在繁榮帶來的社會變遷中，早已影響了村人的傳統生活結構，秀姑巒溪新興的泛舟活動近年來為富里鄉帶來猝然的「繁榮」，取代原有自然生態的是橫貫公路、都市遊客、餐館、旅店和停車場等等，大批的租舟行沿街招攬生意，如同「十五年前城市消費經濟開始滲透到廣泛的西部農村時的情況。土地和農業收入長期不敷投資與支出之後，連祖父輩的鄉人也得去外從事非農業性的勞動以謀生。原本務農的鄒運寶，也在這個大趨勢下，放下被他的汗水長年浸磨得光溜溜的鋤頭柄，每天騎機車到玉里鎮上的加油站充當一名加油工人。」(ibid.：86)

新的消費主義和現代化建設正在侵襲這傳統的村莊，沒有人想到利用環境需要整體性的開發規劃，單向的鼓勵遊客蜂湧而入，除了大肆破壞和帶來廣泛的

¹¹⁶ 洪素麗，1986，〈消失的蝶道—有誰能了解蝴蝶蛻變的痛苦〉，《人間》第12期，頁：26~39。

¹¹⁷ 心岱，1986a，〈向天地贖罪—保衛一條河流的故事〉，《人間》第7期，頁：82~93。

汙染與公害之外，勞工意外事件的悲劇也層出不窮。

然而，就在這村落裡，驚醒的村民開始自發地組織起來，用告示牌的方式傳達一種懇切的聲音：「呼籲著人們正視自己的良知，遵守法制，再不可以貪癡地掠奪、糟蹋大地自然的資源和福澤。」(ibid.：92) 人民對家園生態環境的保育覺醒了，還進一步採取具體且合法的行動，整個村子開始自主地動員與組織起來。

「任教於吳江國小的謝石年老師，是吳江村生態保護區的重要成員之一。除了起草委員會的文件，收集、編寫有關自然和生態保育的資料，謝石年老師經常利用自然課對學生講解和宣導自然生態保育的思想和知識。」(心岱，1986b：95)

年輕的村民黃持佳也主動參與保育行列，自己收集資料，動手製作宣導圖文發與村民閱讀，提高村民對環境認知的層面和視野。魚類生態學家曾晴賢和許山木律師也都提供自己專業上的觀點來評估河川整治的整體觀念，並建議在法律規範不足及取締破壞生態困難的處境中，地方人士自發的保育協會要能經由地方政府授權負責管理，讓廣泛民眾參與保育工作，認識到「守法」不僅是義務，也是權利，「先有良好的人文生態，自然生態保育才有可能」¹¹⁸。

一條小溪將吳江村的村民連結起來，鄉民們逐漸意識到「我們真正能留給子孫的，不是銀行存款，不是田產和房屋，而是一片豐厚、充滿著生命的自然環境。」、「住在臺灣的人們，以無可彌補的自然破壞去換得衣食豐足之餘，應該停下來想一想，這樣下去，成嗎？」(心岱，1986a：93)

這條保育行動的道路集聚各樣專業人士投入參與，不但自發地編寫文宣，也透過教育認識自己的家鄉，提升環保觀念和環境意識，吳江村的組織行動實為八〇年代人民覺醒與自力救濟的一個縮影。

2.3 「傳統」與「現代」：鹿港反杜邦

1985 年政府欲在臺灣西岸推動彰濱工業區，但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機，國際經濟低迷，經濟部則轉為通過美國杜邦公司來臺設立二氧化鈦廠的申請，引起鹿港居民激烈、長期的反抗成為反公害運動的里程碑。反杜邦事件造成鹿港居民如

¹¹⁸ 心岱，1986b，〈重回桃花源－吳江村的未來〉，《人間》第7期，頁：94~97。

此大的反動有幾個原因：

首先是「鹿港人是從太多具體的經驗中，再也無法相信政府有決心和能力去『嚴格要求』和『嚴格管制』工業汙染。十多年來，鹿港人民看見許多其他地方的人民放鞭炮、舞龍舞獅歡迎各種工廠到地方上來設廠。沒有幾年，因為工廠的嚴重水汙染和空氣汙染，漁產消失或毒化、房地產暴跌、水不能喝、稻子打出來有異味…老百姓陳情、抗議、甚至砸工廠辦公室的玻璃窗，工廠卻依舊排毒煙、排污水、一點兒辦法也沒有。」(蔡明德，1986a：17)

臺灣各處已經有多起汙染事件，包括：大里三晃藥廠、西海岸蚵綠事件、林園石化廠等等，在政府的經濟成長策略及環保政策不全的前車之鑑，讓居民對公害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理解。並且在整個鹿港反抗事件中由知識分子、教師和在地居民集結成深厚的群眾基礎，帶頭的李棟樑縣議員並非黨外政治人物，但支持他的「有地方青商會、扶輪社、教員、校長、地方和外地知識分子、文化人，也有廣泛的鹿港鎮民、漁村的漁民、蚵民和農夫。」(ibid.：23)

第二，具有強大國際科技和政治力的美國杜邦公司對農業生活的鹿港居民來說儼然是外來的龐然大物，加上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外洩和美國太空梭意外事件都讓他們無法信任科技帶來的安全保證。

在地居民施文炳說：「美國也許取締標準和執行上很嚴格。可是它在國外設廠，怕有另外一套標準。」、「印度波帕爾廢氣外洩死了多少印度人！才揭發那家美國工廠在印度的安全措施簡陋、落後得喪盡天良。再說，美國地廣人稀，大自然自淨力強，台灣是地狹人稠吧，適合美國的標準，我看未必就適合咱台灣…。」(ibid.：18)

第三，鹿港人民擔心杜邦公司造成的公害會危及他們傳統的養殖業，從二仁溪「綠牡蠣」和東港西施舌中毒事件讓魚貝市場中挫。

「我們鹿港人有的，就是這兒的近海養殖。從老祖宗來的時候，我們就種蚵、種文蛤過日子。杜邦會把這老祖宗和老天爺留給我們世代子孫的生計全毀了。能怪他們抵死反對嗎？」(ibid.：20)

鹿港居民欲保護其傳統農漁村的生活方式，除了經濟因素還包含文化因素。當時鹿港被內政部正式列為臺灣古城並具有歷史保存的地位，居民認為鹿港的文化和古蹟是不能被經濟取代的，因此傳統文化也成為他們抗爭的訴求。

「文化、農業、海產養殖的百年老城，如今要進駐一個污染性工業，合適嗎？」

杜邦若在鹿港設廠成功將是多年來工業侵入農業的惡夢，有如「工業木馬屠城的故事」，這次所要殺滅的卻是鹿港三百年的傳統和文化(李文吉，1986c：13)¹¹⁹。

從《人間》雜誌的報導中可觀察到八〇年代的反公害事件及論述都鑲嵌在工業化侵蝕農業的結構中，工業化改變原有的農村生活型態、農村面貌，汙染破壞自然生態擠壓農漁民的生活，而引起地方的自力救濟。

由鹿港反杜邦事件和其他地方的反公害現象提供幾個認識八〇年的線索：第一，人民在公害汙染和工業入侵農村的生活中真實經歷到傳統產業、文化在現代化社會中衰退而產生對土地的認同與環境意識，便自發地組織起抗爭運動。但是在快速工業化與消費文明、商品行銷體制之下，現代化工業取代原有的傳統產業為要進行更有效更大量的生產方式，原本的農業生產方式因為傳統生產工具的式微，竟一步步走向沒落、蕭條的境遇¹²⁰。

自 1955 年起，農業機械化的政策被積極地推動起來，雖然農業機械動力節省農村的勞動力和畜力，看似提高農村生產力，增加農民所得，農業原有的勞動方式也被農業機械取代，原本和農業相互依存的打鐵業在農村衰退及鋼鐵器具生產為主的現代化打鐵業中迅速地沒落了¹²¹。

同樣在高雄岡山擁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傳統市集：販賣農漁產品、手工藝品、農業生產工具、南北土產的「籬筐會」，原是居民約定俗成的生活時序具有社交娛樂功能，但是在大量生產和鼓勵消費欲望的今天逐漸被工業產品、商品取代。

¹¹⁹ 李文吉，1986c，〈一種人文悲情—杜邦爭議下的憂思〉，《人間》第 7 期，頁：10~13。

¹²⁰ 蔡明德，1986a，〈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工業污染下的人文反撲〉，《人間》第 7 期，頁：14~23。

¹²¹ 如：蔡明德，1986b，〈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的——一條日漸消失中的打鐵街〉，《人間》第 11 期，頁：118~127。

大眾消費的價值取代原有勤儉惜物的態度，傳統手工品是以耐用為目的，而現代機械壓製品的目的是用完就丟，再買新的¹²²。

蔡明德認為傳統產業象徵台灣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歷史，像是打鐵業就曾扮演拓墾、種植、生活利器等等，其中嚴格的師徒制度、工作倫理和知足觀念都已不再，像是日頭要下山一樣擋也擋不住。

「僅僅最近一、二十年的時光，打鐵業卻已在我們的眼前和心中倏然隱沒了。我們的下一代，也許將無從認識這一項和台灣三百多年的歷史，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有著密切關聯的技術和行業。」(蔡明德，1986b：127)

工業化後的社會不只是農業衰微、傳統產業文化的逐漸消逝，農業衰退造成農村人口外流到都市而引發的不適應與勞動壓榨，勞工階級的職業傷害與貧窮問題。

在都市的邊緣《人間》雜誌觀察到許多廉價、臨時的違章建築是大多農村移民居住所在，而城市街頭、公園、火車站、地下道等也成為許多流浪者的棲所¹²³。

台北近郊的三重市在經濟不斷發展之下成為農民外流人口的收納地，根據一項三重人口調查中發現遷入三重的人口有 18% 是雲林彰化的農民，20% 則是外省籍的退伍軍人，同項研究指出遷入三重的人口有 20% 是原籍失業者，絕大多數與農村經濟的蕭條有關¹²⁴。

「教育水平低、沒有特殊生活技能的這些離鄉農民，絕大多數只能依靠勞力的出賣來營生。在十年前台灣建築的鼎盛期，這些群集在三重的外地農民，以『板模工』、『土水師』(水泥匠)，投入了蓬勃發展的城市經濟，因而也吸引了更多農村人力，流向類若三重這樣的中介城鎮。」(李文吉，1986a：102)

然而，多數的農村移民只能找到重勞動的初級生產工作，有時候趕上經濟起飛在建築業當水泥工能賺較多錢，卻處在超時工作與職業傷害的危機中。像是台電公司的核電廠工人就有多名雇工在幅射汙染的環境下罹患惡性腫瘤甚或死

¹²² 李疾，1986，〈岡山籬筐會：台灣傳統市集的沒落與蛻化〉，《人間》第 12 期，頁：10~23。

¹²³ 阮義忠，1986，〈在流浪的路上……〉，《人間》第 13 期，頁：94~99。

¹²⁴ 李文吉，1986a，〈三重？三重，好得很！〉，《人間》第 12 期，頁：100~111。

亡，但在約雇工人的制度下，死亡的雇工不但沒有遣散費或退休金，還要自行負擔龐大醫療費，卻也無力提出疾病與核能幅射的直接證據¹²⁵。

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僅將自然資源整合到工業資本，也把人的生活、價值和傳統編組進新的市場交易中，改變人的消費方式和欲望，使得人與人、人與土地成為彼此競爭、對立的關係，也失去中國原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歷史傳承。

第二，這些地方的抗爭運動雖然以反發展、反科技為訴求，但《人間》雜誌的知識分子以較宏觀歷史性的角度來論述反公害背後反美的第三世界觀，同時也意識到公害問題常常與我國的人文價值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以鹿港反杜邦為例，楊憲宏認為「無限的經濟成長，可以創造無限的生活福祉」是個不存在的夢幻，打破「經濟成長」為唯一真理的觀念，是當務之急。並且報章雜誌上對杜邦公司處理汙染能力的有利說明是記者在無知狀況下的道聽塗說，在未有事實根據之下報導出：先進國家處理環保問題的能力，所以國內汙染者「應該可以做到這麼好」，卻不知美、日兩國力圖將環保工程設備打入台灣，儼然成為一個新的角力話題。另一方面還要為將來購買日本設備做為宣傳，卻不知日本只處理都市「中央」地區的汙染狀況，不理會許多偏遠「邊陲」的問題，製造公害已解決的假象¹²⁶。

臺灣幾十年來鼓勵外商投資，相信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可以引進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可以帶動全面經濟發展的梦想破滅，但台灣環境的實況是「我們的河流臭了、髒了、死了；空氣中瀰漫著混濁的有害廢氣；我們遼闊的河岸汙染了；原來豐富的近海漁場逐漸消失；我們的土地一寸寸死亡；我們的菓蔬沾著各種農藥殘留；我們豐富的魚貝養殖場受到嚴重的汙染……除了這些對自然的破壞，如果再算上這高成長經濟行程中人性的破壞和文化的破壞，二十多年來，我們所付

¹²⁵ 有許農村移民在都市工作卻沒有保障而遭受到職業傷害，例如：李文吉，1986b，〈死於惡病體質〉，《人間》第13期，頁：110~117。和黃小農，1986，〈致癌前後〉，《人間》第13期，頁：118~136。

¹²⁶ 楊憲宏，1989，《公害政治學》，頁：21~25，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的自然成本、社會成本、人的成本和文化成本，與物質財貨的成長兩相抵減，我們的帳面上究竟是黑字還是赤字，就很值得重新估算了。」(蔡明德，1986a：16)

公害問題從來不只是單一的汙染事件，而是西方強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汙染的輸出，同時又不斷輸入對經濟發展、繁榮富裕生活的消費欲望，改變國人對生活、環境和人的價值觀看。這種經濟發展盲目追尋的現象，關乎到對於「人」這個基本問題的看法，人的精神與物質、他與大自然的關係、他的尊嚴、他的文化需要等等，是不是該在經濟成長中失去其中心價值，讓人不禁要問：

「究竟唯成長主義和崇拜成長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成長？為了誰的福祉而成長？為了國際分工中，按照別人的需要、規格、數量和單價的成長、為了別的國家的經濟擴張策略、為了別人公害工業的輸出的成長，還是為了我們自己民族經濟發展具體需要的成長？成長，又該怎麼發展？依賴別的發展需要而發展、按照別人而不是自己的發展目標而發展，還是按照自己民族的具體思想、方向、需要和選擇去發展？」(ibid.：16)

恢復我國民族的人文價值，透過自己國家的思想和需要來發展經濟策略的問題意識再次被提出來。顏匯增認為在反核運動與環保運動中要超越「反台電」意識的限制，重新反省人在自然中的位階，批評「唯開發論」和「成長崇拜」，沉思核害巨大陰影下的「生」和「生命」，再次反思那恆古不朽的話題：「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何？」、「人與宇宙萬物間的關係為何？」他以老子：「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說明人類當以謙卑心態面對自然界，與自然回復「天人合一」的和諧關係¹²⁷。

「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或是共產主義國家都迷信經濟的無限成長，而且都認為經濟是靜止在當前『社會』組織結構裡的現象，而不是『自然與社會環境』『共同』改變與演進、互動的現象。…這意味環境保護：原本這塊屬於大眾公有的自然資源，如今卻被某一團體或組織轉換成其社會資源後，其他人卻無法再轉換成

¹²⁷ 顏匯增，1988，〈尋找反核運動的意義〉，《人間》第32期，頁：119~135。

『自己的』社會資源(因為已經受到汙染)。所以,『環境保護』並『不單純』的在維護自然環境的原始狀態,而在於其維護人類更久生存的『社會環境』。(顏匯增,1988:134~135)

台灣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與建設附上農業凋零、生態崩潰、環境汙染難以復原、人民主體喪失自我進入超低工資的勞動市場及人與環境的物質化、機器化的種種代價,並且正在持續以非人為中心、非自己民族主體性為主的發展計畫和策略,來換取唯成長的「富裕」與「繁榮」。包括地方環保運動在自然與社會資源利用之間的衝突,還有人民切身感到社會公義的問題,都和人類的生存息息相關。

自《夏潮》、林俊義、韓韓到《人間》雜誌,雖然都曾在反公害議題上宣稱重建中國民族思想和認同的重要,但是八〇年代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天人合一並非主流,在現代化的潮流中常被視為歷史的窠臼而無法深化,並且在一切以開發成長為主的現代化經濟論述中逐漸消失殆盡。

《人間》雜誌實地採訪的報導指出八〇年代一連串的自力救濟和環境運動不單只有表面呈現的經濟因素,也包含了國家機器與跨國企業之間的政治因素,而複雜的政治關係則和我國的人文思想與歷史的文化因素有關,就是在成長背後存在著臺灣對先進國家的政經依賴,造成國內發展毫無方向、盲目跟從的後果是破壞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鹿港反杜邦事件是個警告,表示我們的農業、傳統產業、文化和一些生活方式正在消逝中,取而代之的是繁榮表象下的汙染、負面景觀和重工業為主的鋼鐵產業,更重要的是我們逐漸失去對於人與土地價值的關懷和理解,這些都是現代化社會不得不慎重面對的問題。

(三)、《人間》雜誌的歷史論述分析

七〇年~八〇年代初的環境論述雖然指出現代化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影響,但都是較宏觀與較高層次的討論。《人間》雜誌的論述除了揭露現代化工業擠壓農業的實情,也指出現代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已滲透到個人的社會生活中,將人和土地納入理性記算和資本利益。現代化意識全面蔓延的同時,《人間》致力於恢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中的愛和關懷,其內容有許多社會寫實面來

突顯社會的各種問題，以民眾的觀點來認識、體驗、關懷人、歷史、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延續《夏潮》體系中宏觀的第三世界觀和冷戰體制的遺命來解讀八〇年代的自力救濟、農業衰退、城鄉差距等現象，並且在這些問題的背後都有共同的一種自覺的意識，就是對於台灣歷史的連續性和台灣當代社會在地的及世界的關聯，透過台灣在地的社會現象，反映、反省在歷史上、政治分斷上所造成的民族的失根，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下的階級壓迫和政經依賴。

3.1 國際分工下的第三世界農業

1986 年鹿港反杜邦的抗爭因獲得階段性目標的勝利而成為自力救濟的里程碑，但是，大部份自力救濟地區的汙染和人們的生活問題其實都未能獲得解決。

1987 年水源里居民與李長榮化工公司的抗爭形成兩方膠著對峙。自 1983 年 9 月李長榮化工廠的廢水未經處理即逕自排放到頭前溪，汙染滿雅淨水場附近的頭前溪水源，新竹市區曾一度停止供水，引起水源里居民氣憤地集結抗議。1985 年後居民又和李長榮工廠進行多次訴訟抗議並要求停工，長達二年之久，期間衛生署環保局曾進行檢驗、審核與協調，卻無法強制要求工廠停工，居民認為在企業主強橫與政府無力，他們只得自治自救抗爭到底。

相對於鹿港反杜邦事件，水源里居民和大部份反公害居民一樣，他們面對的不是「影子工廠」，而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在台灣法律不全、執法不嚴的環境下不得不採取圍堵抗議的策略¹²⁸。

1986 年大潭村鎘汙染事件引發「痛痛病」事件至 1988 年村民生活不但未有改善還已經遷村三次。鎘汙染遲遲未解是因為環保署與衛生署在觀點上不能一致，使原本公佈化驗的結果一再拖延。環保署說：「本單位只負責土壤汙染防治工作，稻米汙染外流的問題應由農、政、衛生單位負責。」衛生局的反駁是：「環保、農政單位在採樣時既已決定將結果告知，但迄今無下文。」農委會則強調專責收購稻米。三個行政單位彼此推託，真相卻沒有水落石出¹²⁹。

¹²⁸ 林美娜，1987，〈還我一瓢清淨水〉，《人間》第 21 期，頁：22~47。

¹²⁹ 官鴻志，1988，〈鎘影幢幢的荒村〉，《人間》第 36 期，頁：46~57。

一位大潭村民說：「是資本家買通了一切！每一回，高銀公司把廠房和廠房外的樹木，排水溝沖刷得很乾淨，才有人假惺惺地跑來作汙水檢查，這是哪門子的檢查？」(官鴻志，1988：54)

一連串的反公害運動、公權力、環保單位、衛生行政系統中，竟然對鎘汙染束手無策，官鴻志認為大潭村鎘汙染在反公害運動上的分歧與挫敗，有其社會結構的意義。土地死亡和水源難以回復的汙染程度為社會帶來無法估計的社會成本，然而「工業界巧妙地把汙染成本轉給社會，其中暴露了地方勢力與行政官僚同是製造公害的共犯結構。」(ibid.：53)

這項結構的支配權威性是官僚資本與民間企業把持農村社會的經濟路線，以經濟開發和提供農村就業機會作為意識掛帥，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逐漸顯露了貪得無厭的獨特性質，並且使農民在生產作物上遭受重大損失。在反公害事件中國家政策法律和執法單位常常不能有效匡正汙染、救濟人民；在農業政策中，「農業培養工業，工業發展農業」讓農戶在農業資金的投資大幅提高，但單純的農業收入卻逐年下降，甚至虧損，地方政府無法扮演保護者的角色，在公權力不彰、矛盾無方向的農業政策之下反而成為地方的壓迫者。

一個關懷農業政策的農家子弟說：「在省主席邱創煥提出『精緻農業』口號之後，台灣農民的種植習慣漸漸改變，譬如北岸一帶已推廣種植花卉，但政府又設置所謂『水稻綜合栽培中心』，貸款給農民購買機器，這不是與要求雜糧轉作的政策矛盾嗎？接著，在雜糧轉作的政策下，政府又大批進口玉米，使國內玉米價格連連下跌。現在工業起飛，農業卻漸趨蕭條，農業政策至今搖擺不定，大概也是主因。」(王墨林，1986：60)

台灣農業的政策方向不穩定，開發也沒有統合的計畫，農地農戶不斷零細化、農業人口老化與外流使台灣農業不斷地凋零¹³⁰。

1978 年美國跨國性菸酒資本憑藉強大的國際政治壓力，打破台灣煙酒四十年獨佔利益將對台灣市場全面傾銷。看似和農業政策無關的決定卻引起二林農民

¹³⁰ 王墨林，1986，〈流過多少五穀豐登，農村凋敝的故事…〉，《人間》第 13 期，頁：58-71。

集體北上陳情抗議。原來十五年前，二林農民在政府大力輔導轉作下將水田改成葡萄農園，但是公賣局長期以來以葡萄甜度的水平來決定收購量，農民不但要自己克服地理上、技術上的困難還得承擔天然災害帶來的損失。如今台灣政府允許美國「物廉價美」的洋酒在台灣市場長驅直入，勢必對二林的果農們產生衝擊¹³¹。

同樣因此受到影響的還有屏東的菸草農民，在公地放領後擁有新地，卻在市場波動中不斷更換耕種的作物。當地農民說：「拿香蕉來說吧，17、8年前，我上國小的時候，我們翻了稻作，改種香蕉才不久，就碰到台灣香蕉對日本外銷的低潮，造成大量的生產過剩。香蕉擺在廣院和蕉園裡面，沒人要阿……像這樣，因為產銷失序，造成生產過剩，價格暴跌而致血本無歸，在農村真是屢見不鮮啊。」(李疾，1987：83)

農民在不穩定的農業生產結構中越來越難以生存，所以大多轉為由公賣局負責輔導、控制和保證價格收購的菸產銷。如今為了「平衡」美國和台灣的貿易，美國將在台灣的菸酒市場上自由進口，而政府在依附的政經體系中竟對美方大幅讓步降低關稅，顯然我國政府在總體經濟的衡量上並沒有把民眾的反對意見擺在優先地位，這是官民矛盾之處。

官鴻志指出「四十多年來，台灣亦步亦趨地朝向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去發展……但依賴理論曾提出這種歷史教訓：『國際貿易，經濟分工對於一個國家影響極為深遠』在國際貿易中的分工壓力往往不是一個政府官僚體系，經送經濟發展模型就能夠抵擋的！」(官鴻志，1988：56) 而政府的退卻策略曝露出我國與美國的依附關係，在長期的壓迫下終使農民走上街頭。

1987年「1·28」、1988年「3·16」、「4·26」的農運包含農民長期在工業擠壓下遭受環境破壞、缺乏農業生產保障而無法生存的抱怨情緒，也包含對「中美貿易談判」的杯葛與控訴，提出了反對美國農業帝國主義的口號¹³²。

苗栗縣卓蘭的果農徐超群說：「我們農民沒天沒夜的幹，到頭來卻成為大家

¹³¹ 李疾，1987，〈褪色的金葉子〉，《人間》第16期，頁：80~91。

¹³² 王墨林，1988，〈台灣果農的怒吼〉，《人間》第28期，頁：66~77。

剝削的對象。像裝水果的紙箱，冷藏水果的冰庫，每次到了產收期就開始漲價，現在連政府都和美國人聯合起來剝削我們農民。人家美國為了保護自己的農民，硬要把這些水果賣給台灣，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拒絕這些水果的進口，來保護自己的農民呢？」(王墨林，1988：68)

台中東勢鎮的民眾自行發出這樣的傳單：「果農們！請您仔細算算看您今年的水果一斤賣多少錢？獲得多少利益？再回想3年前水果一斤賣多少？今天一切生產費用漲價，而水果價錢漲了沒有？這是什麼原因？您是否曾去想一想？政府為了平衡中美間的貿易，一再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使國內農業屢受打擊，以致農民淪為次等國民，成為被遺棄的孤兒，任人宰割，台灣的農民竟成為貿易平衡的代罪羔羊。果農們，覺醒吧！自己的生存，自己的權益要靠您自己去爭取！……。」(ibid.：70)

農民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正視農民權益，在立法院門口高舉「台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布條，說明美國政治對我國農業政策的支配隱藏在美國跨國資本、國內資本利益和國家機器的共謀結構中，這是台灣在戰後最大的農民示威抗議運動。

3.2 跨國資本下的新殖民主義

隨著國家機器與跨國資本的共謀結構越來越清楚，八〇年代台灣社會下的公害汙染、農業凋零、跨國企業進駐、國家政策不明執法不彰等等現象一一被拼湊起來，是台灣作為強國經濟體系下國際分工的一環，並且這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共同面對的處境。

衣索比亞有六百萬瀕臨餓死的饑民，他們和非洲其他地區大都需要聯合國運送糧食來賑災，然而表面上是富國對窮困災厄國的物資援助，實際上非洲長期向富裕歐美國家進行著龐大的出血性輸出。原來非洲和其他落後國一樣也以農業生產為主，向富國輸出經濟作物，如：可可、咖啡原豆、蔗糖等等。這種為了換取外匯的作物使非洲各國業成為單一作物，影響自己的糧食生產，雖然非洲每年約輸出2000億美元的農產品，但是國家只獲得350億美元，其餘1650億美元則落入居中買賣的歐美國際公司。這種對於先進國家的經濟依賴性結構，源於過去殖

民地時代，並且二戰之後，這種結構也不因非洲各國形式上的「獨立」而改變¹³³。

菲律賓是世界第十位的砂糖生產國，1920~1977 年砂糖是菲律賓最大的外匯收入項目，但是蔗糖工業並非菲國土生土長的產業，而是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的殖民強權利用這一區域的天然資源及廉價勞工建立起的蔗糖工業。然而，強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不只有經濟上的依附關係，而是以其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來干涉他國內政。

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美國以資金援助菲國戰後復興，並於 1946 年 7 月與菲國簽屬「貝爾通商法案」確認兩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關係以及美國公民、企業在菲國享有菲律賓公民相同的權利。菲律賓「獨立」後仍然受到宗主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制約，在美國的支持下維持大農莊資本和封建特權階級構成的寡頭獨佔，導致菲國貧富差距大而尖銳、農產品因輸出取向而專門化、工業部門落後等等，菲國農民創造的剩餘無法經由資本主義合理性再投資到菲國人民，而是被國內地主、資本家、西班牙和美國的投資者私分了。

在農業政策上，菲國的馬可仕政府實行「農業企業化」卻使菲律賓的農村衰疲，造成失業、離土的農民大量向城市移動形成龐大的無業人口。馬可仕還在呂宋島和巴丹島大幅開闢「保稅加工出口區」，結果宣傳中的技術轉移、增加就業與外匯的好處沒有落實，卻帶來廣泛嚴重的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並將屬於全體公民的土地、公共設施、水電等以超優惠條件為外國投資人服務¹³⁴。

最後菲律賓市民、工人和農民對現況不滿升高，在極權政府的鎮壓和圍剿中組成「民族主義同盟」，號召一個反對「美國·馬可仕獨裁」為目標的戰線，以真實的民主代議為基礎倡言國家若干基幹產業的國有化、保護民族資本、反對新舊殖民主義、以和平達成正義自由與民主的民族主義，結束了馬可仕的極權統治。

殖民主義下的菲律賓模式對於台灣是個提醒，八〇年代各地的自力救濟與汙染事件，農業凋零確實和菲國有相同處：對美日政治、經濟的依賴；以加工出口

¹³³ 江淮生，1985，〈飢餓—來自衣索比亞的緊急報告〉，《人間》第 1 期，頁：110~120。

¹³⁴ 趙國樑，1987，〈「菲律賓 模式」？〉，《人間》第 16 期，頁：34~37。

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為圍堵世界共產主義的戰略前線而受到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上的深刻影響。二次大戰後，美國挾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在世界各地干涉他國內政，甚至為了保護美國的政治利益而支持各地專制的傀儡政權，打擊各地民族獨立運動，用跨國資本、糧食、貿易壓力為武器，使世界屈從美國利益，這是 1950 年後各東南亞國家、中南美和亞洲國家都極力抵抗的。

從歷史中來看，台灣的農業在戰後就一直受到美國政治、經濟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在冷戰期間美國欲將台灣改造為一個政治上反共的保壘而給予有目的和條件的「援助」，在農復會援助下進行土地改革，和平地消滅台灣的地主階級，解放佃農，使台灣農村的土地關係成為無數小資產階級獨立小農所有制。並且台灣農業與經濟又一道被編入美日資本主義經濟圈，以日本的肥料換穀制度；對日輸出農產品以換取工業產品；輸入美國廉價的過剩雜糧；低米價政策等等都逐漸脫離中國的民族經濟¹³⁵。

台灣正式編入美國圍堵赤色亞洲大陸的戰略配置後，便在台灣進行美式資本主義改造的兩大基礎：土地改革和匯率改革。土地改革後使大量佃農獲得解放，得著新土地，小自耕農產生後提高了農業勞動的生產欲望也提高農業部們的剩餘價值，加上匯率改革，為台灣低工資加工輕工業在六〇年代編入世界分工系統的出口，準備了具體條件。包括加工出口工業和農村剩餘不斷向工業輸入政策，都在國民黨親美反共的國家安全體制與實行威權獨裁政治下完成。

將近四十年在獨裁政治與資本主義下的「美—日—台」三邊分工關係，讓台灣的土地、水和空氣都難逃全面污染的宿命。公害產生後造成地方民眾苦不堪言，一再提出陳情、訴苦、要求地方行動人員、地方勢力和民意代表向製造污染的廠方協商斡旋，但結果幾乎是民眾一方失敗。公害法令不周全，資方和地方官僚、警察相結推託，宣稱沒有明文法條可以取締，加上官商勾結偽造工廠排水或排氣安全的檢驗報告，使公害因果關係的鑑定曖昧化、爭論化，並且拖延時間；對於嚴重公害的居民，資方以「輔助」之類推卸法律責任的名義進行局部賠償，

¹³⁵ 陳映真，1988，〈台灣戰後最大的農民反美示威〉，《人間》第 30 期，頁：10-16。

軟化居民公害抗議以取得妥協不了了之。

到了八〇年代，在上述「黨·政·地方勢力·汙染資本」綜合體的肆意為虐情況下，台灣公害不斷增幅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¹³⁶。

如今從政府錯誤的決策、官商勾結，無責任無倫理的領導現象，讓《人間》的知識分子們進一步思考我國的公害現象不單是自然科學論證的問題，而是一門國際整合的「公害政治學」，是現代資本主義以世界為範圍進行生產與擴大再生產，而形成世界規模的分工與階級的編組。

3.3 小結：

八〇年代《人間》雜誌描述台灣社會在現代化的潮流中進行發展主義、個人主義而塑造出新的消費欲望和生活方式，這與林俊義反西化思想公害的論述相互呼應，並且這現代的資本主義確實一步一步滲透在我們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立、競爭、孤立、他者化，在都市化光鮮的背後隱藏著城鄉差距下的農村移民、勞動人口的權益、族群和階級不平等的問題。

此外，《人間》雜誌在各地層出不窮的反公害事件裡感受到人民生活的真實處境；在國營企業、在地資本和跨國公司的龐大利益中，環境法律制度和執行都淪於工具化而不以人民的權利為優先，資本家與地方官僚勾結、國營事業以政治利益為掛帥，八〇年代一連串的自力救濟和環境運動實在是官逼民反下的現象，人民在忍無可忍之下走上暴力抗爭一途¹³⁷。

地方反公害與環境運動在自然與社會資源利用之間的衝突，還有人民切身感到社會公義的問題，都和人類的生存息息相關。在這些汙染與反公害事件中不單只有表面呈現的經濟因素，也包含了國家機器與跨國企業之間的政治因素。《人間》從第三世界國家的角度分析美日在台的殖民歷史與經濟政治的依附結構至今並沒改變，而且在強大資本現代化的潮流中更重新塑造台灣人民的思想、教育和歷史觀，這種知識的建構下，台灣的知識分子和學子青年逐漸失去對中國歷史的

¹³⁶ 陳映真，1989，〈台灣經濟成長的故事－台灣公害的政治經濟學〉，《人間》第42期，頁：58~61。

¹³⁷ 楊渡，1987，《民間的力量》，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連帶認識、對民族的認同以及對現實認知與批判的能力，在環境運動和論述中轉變為針對統治者與威權體制的反對運動，尋求抗爭意識、運動成形的組織方式，逐脫離對人與土地的描述與體認。

(四)、批判的年代

自 1949 年國民黨撤退來台也帶著官僚政治下封建、特權等思想，並且在冷戰體制下列為美國的戰略地位，透過在美軍協防台灣的軍需及民生用品初步緩和通貨膨脹的現象，並且實行土地改革控制土地生產力和當時社會基礎的農民，使得強控制系統得以開始運轉。八〇年代初期，隨著資本主義擴張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與人性腐化，及美國在亞洲戰略位置的轉變，中美建交帶來國府正當性的政治危機，使反共、戒嚴、強控制的合法性意識形態降至底線，原有的戒嚴體制在面對內外交迫之繼於 1987 年宣佈解嚴。

解嚴之後，學生運動、婦女運動、農工運動、少數民族運動等等急速地發展起來，加上黨外勢力壯大、民進黨的成立，在政治、經濟、教育、環境都不斷進行著反抗和改革，說明台灣的社會結構正在劇烈地變動中，五、六〇年代以來的威權體制正受到民間力量的挑戰。

4.1 環境運動的潛在主體

1987 年後的反公害運動在公權力不彰、環境不斷惡化中尋求社會正義，隨著同年政府宣布解嚴後各種社會運動興起，也擴大環境運動參與的主體。從在地受害居民、農民、在地知識分子到學生、婦女、菁英份子，他們以反汙染、設立公害防治標準為目標，認為政府當在農業、環境政策有全面的防治方案和策略，另一方面則強調當教育人民對環境意識的認知，鼓勵學生下鄉運動和婦女環保運動，各階層主體的結合與重組在解嚴後的台灣形成一股民間力量。

八〇年初反經濟成長的環境論述主要反映工業化與現代化下發展主義、提高私人消費欲望、追求資產累積造成浪費及奢侈的人文觀念，而二十年來隨著加工工業貿易推動的經濟奇蹟已帶來嚴重的生態汙染。1985 年《新環境》雜誌成立，目標在日漸汙染下為求改善人類生活品質，需要調適或根本重建人與環境原來的

秩序。它們報導國外新知，倡導新的環境倫理觀念，在環境科學知識、環境立法上要求政府當民主化建立環保相關單位及人民申訴管道，同時民眾需要加強環境教育以提昇對環境問題的覺醒層次，民間自力救濟團體當尋求成為壓力團體和督促政府的力量¹³⁸。

林信和認為臺灣過去未能重視環境權益，在工業日漸發達、經濟成長之下汙染破壞空氣、水和土壤並危害人們的健康、生命和財產安全問題。因此，人們開始要求立法保護生存空間，體認到自然環境竟也是一項極待保護的基本人權。公害與經濟之間相伴牽聯的關係通常發生在先進國家，在公害之後更是環境保護的先驅之國。他們在法律中把「環境權」獨立出來，和工作權、財產權、自由權等列為人類生存權，應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並認為環境保護不是一鄉一境，一邦一國的工作而是全體人類必須攜手努力共同任務¹³⁹。因此，環境權的擁有者非個人，而是國民全體，還包括目前生存與未來的國民，環境權的維護是預防重於救濟，所以各國設立環境影響評估是最顯著的標竿，事先在調查可能發生環境不良影響的程序，從公害防預走向自然保育之途¹⁴⁰。

我國經過四十年來現代化的努力固然使人民所得提高，預計在二千年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1977 年前後的公害問題如今已在「環境立法」的要求，「環境權」的觀念也慢慢建立起來，但因為我國特殊的政治考量，中華民國憲法一直未被考慮修改。林信和及柴松林都表示我國在社會變遷當中，原有的法規已無法適應現況導致無法可用的窘境，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條文都明文規定民意必須受到尊重，像是政策制定的法定評估程序和聽證會，加上在野勢力的監督及執政黨都必須透過定期公正的選舉來爭取執政權，因此各方勢力都必須迎合民意，進步立法的目標也較易達成。

¹³⁸ 馬以工整理，1985，〈柴松林、龍應台對談/如果你還想繼續生活在這裡!〉，《新環境》試刊號，頁：4~6。

¹³⁹ 1972 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屆人類環境會議中通過「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保護及改善人類環境，乃影響世界人類福祉及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亦為全世界人類所迫切期望、及政府之義務。」(林信和，1986，頁：15)

¹⁴⁰ 林信和，1986，〈不要讓你的環境權睡著〉，《新環境》第 11 期，頁：15~16。

另外，西方國家政府對民間團體不但不能限制，依法還得獎勵並給予各種方便，使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提高能夠匯集民意力量來影響行政及立法，為要改善國內現實政治體制下民間團體處處受限、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無知、漠然甚至心存畏懼的情況。柴松林與林信和積極主張人民參與公共事務及社會運動，在正確的人權觀念中爭取環境權益，如何使人民從消極被動轉為積極主動，並形成輿論造成壓力，使人民、政府、議會都能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和行動便是《新環境》成立與努力的使命。

《新環境》一方面提倡環境意識教育、進入體制內改革，另一方面由其主編柴松林、徐慎恕和馬以工積極鼓勵婦女加入環境保育的行列。馬以工開始帶領婦女成立婦女聯盟，目的在於家是社會的基石而婦女則扮演重要的角色，婦女若能增進環保意識便能在消費知識和行為上做出明確的選擇，像是鋁箔包裝過程可能有產生致癌物的危險、減少使用塑膠袋、垃圾分類等等，環保運動要由每個人做起，先由居家環境的整潔乾淨做起、美化它以提昇生活品質¹⁴¹。

主婦聯盟的成立開啟消費者運動，自 1975 年柴松林便開始提倡消費者自覺意識和消費者運動並成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說明消費者運動將是未來社會運動的趨勢。他認為相對於環境運動中對環境權定義的爭議，消費者權利是可以很容易界定，又環境迫害比個人權益間接，而且環境迫害的結果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判別和顯現，環境受害的地域性和較高的技術檢驗知識亦非普通人可以參與發言，通常直接面對政府和大企業家的反對力量而形成運動的阻礙¹⁴²。

這些文章先說明環境問題是遍及全民的，是每個人都應思考到的切身問題，因此鼓勵民眾參與，並且現代婦女、學生、代議政治之士提出環境相關政見來爭取民意等等都指向一個方向就是介入政治。

《新環境》指出先進國家之環境運動都是以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力，因為富裕者自有其專用較優良之環境，而低收入者每日為生存而奮鬥無暇兼顧環境問

¹⁴¹ 馬以工，1986，〈我們出發了—新環境發起主婦聯盟〉，《新環境》第 11 期，頁：9~11。

¹⁴² 柴松林，1987，〈從消費者運動到環保運動〉，《新環境》第 15 期，頁：24~26。

題。因此國內需要支持環境政見的代議之士重視選民的生存空間，包括民意代表、議員等民選公職人員當對環境知識更深認知在選舉中提出更多公害防治、環境保育的政見¹⁴³，透過體制內的選舉能夠選出為社會大眾爭取利益的民意代表，由政府來執行公害防治和環境保育工作。

臺灣社會變遷在教育普及、所得提高、都市化、傳播媒體發達和社會開放，不但政治民主化增強，具有改革願望的年輕人崛起而能以人民的行動來督促政府，消費者運動確實將環境運動的潛在主體擴大至中產階級和一般消費民眾。然而，由白領知識分子提倡主體擴展參與的環境運動在現代化意識形態下將民眾視為是需要被教育的對象，他們對環境知識無知、漠然，沒有保育觀念隨地大小便，覺醒層次低等，其號召的主體仍然是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民權改革運動。

從《新環境》雜誌可以看見反污染的公害運動經過知識分子的介入而逐漸轉為人人可參與的環保運動和政治改革運動。潛在主體的擴大喚起知識分子注意到地方上反公害事件需要對整個社會結構進行批判和反思，因此呼籲學子青年要走出象牙塔才有社會改革和實踐的可能，他們以反污染、設立公害防治標準為目標，認為政府當在農業、環境政策有全面策略，強調當教育人民對環境意識的認知，鼓勵學生下鄉運動和婦女環保運動，這一股力量以反對威權的封建、保守和思想壓制，為環境運動的社會落實帶來新的契機，但同時也干預了環境運動的發展方向。

4.2 知識分子的下鄉運動

八〇年代初期，隨著自力救濟在各處不斷興起，環境運動背後政商勾結、跨國公司與冷戰國家安全體制等政治經濟結構面一一被揭露，國家的政經策略未以普遍民眾為利益的態度擴大社會運動的潛在主體，參與抗爭的對象由農漁民和污染受害者擴展到學生、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尤其是解嚴後政治逐步開放自由

¹⁴³ 如：馬以工，1985，〈怎樣才真的在做環境影響評估〉，《新環境》試刊號，頁：2~3。
柴松林，1985，〈對民選公職人員及民意代表的環境期望〉，《新環境》，試刊號二，頁：2~3。
柴松林與吳柏雄對談，1985，〈環境問題與選擇〉，《新環境》，試刊號二，頁：4~5。
林信和，1985，〈如何改善當前的環境立法〉，《新環境》，第4期，頁：4~5。

化，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和黨外運動等各種民間力量蜂起彼此結盟合作，為環境運動及論述帶來不同的內涵與轉折，豐富了八〇年代的社會。

以鹿港反杜邦為例，《人間》雜誌的報導者鍾喬熱血沸騰的加入，其好友盧思岳與范鎮國也參與其中。楊渡認為知識分子在環境運動中為反公害議題提供新的視野，像是反杜邦事件因為鹿港本身的文化背景，反公害宣傳大多停留在古蹟保存上，鮮少批判到公害本身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而知識分子的加入為鹿港反杜邦提供向上批判的層次，由哀怨訴求轉而為台灣政治結構與經濟發展史的反省，同時對台灣倚賴性邊陲國家的諸多矛盾處提出具有「第三世界」性格的剖析。

反杜邦宣傳藉由媒體報導展開，議題隨著知識分子更深刻與廣泛地推展環境意識，反杜邦事件日漸成為反公害事件的典型與焦點所在。於是有來自各地的大學生參與，而運動本身也有了自己的步調，不再是摸索中的嫩芽。楊渡指出知識分子的參與只是在這股社會力量的洪流中增加助力，使其加速或加深，反杜邦主要的動力還是自民眾本身，若幻想知識分子能主導運動全局或是動員群眾更是空想¹⁴⁴。范鎮國在與杜邦居民陳情、請願和抗議的過程中學習到以質樸堅毅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以謙卑的胸懷與人及土地和平相處，並且認知到生態破壞背後有著龐大複雜的結構，為了爭取更美好更平等的生活而認識到一個知識分子該擔負的責任¹⁴⁵。盧思岳則有省士大夫一貫驕傲的觀念，認為知識分子常以為「先天下之憂而憂」便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其實是躲在「知識分子的象牙塔」中，在咖啡室裡大聲小聲地批評這個時代與社會好像是一種時尚與流行病，卻是在自利的城堡裡發揮著並非「無知」的冷漠。他認為現代的知識青年若能去除「自利」的冷漠性格，進而培養出關懷他人、社會的心胸才能具有實踐的可能¹⁴⁶。

此外，當時台大、政大、東海等各校學生們有感對現下社會提出反省，鹿港反杜邦事件標誌著一個以廣大民間力量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運動的胎動，而台大學

¹⁴⁴ 楊渡，1987，〈反杜邦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新環境》第 14 期，頁：22~25。

¹⁴⁵ 范鎮國，1987，〈覺醒的心路歷程〉，《新環境》第 14 期，頁：27~28。

¹⁴⁶ 盧思岳，1987，〈走出書方，進入民間〉，《新環境》第 14 期，頁：26~28。

生和其他學生的介入參與，更是台灣各大學校園學生運動長期脫離社會脈動之後的一次覺醒，標誌著台灣的學生運動開始自覺地與社會脈動緊相搭扣，走向社會實踐。

鹿港反杜邦事件後，台大學生組成「杜邦事件調查團」利用暑假期間進行在地訪問工作，希望以大學生的角度去了解這個運動的來龍去脈，提供社會大眾較寬宏的視野去省察其意義，並將其結果整理成「綜合報告書」。

台大學生的報告書中指出「當國家機關或政府機關的行政能力或者公權力，無法適度保障民眾的生活目標時，民間社會即可能衍生自力救濟以及社會運動……。」固然經濟成長帶來豐衣足食，但其重大的代價是破壞有形的生活空間及嚴重扭曲我們的社會價值與人文關懷，所以「不但要挽救生存的空間，更要設法尋回或創造出未遭污染的社會價值」，「這種全民運動的力量，將對轉型期中的臺灣社會造成震撼和某種程度的推力。」對政府則重申每個公民都有參與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活動，並發表意見的權利。在「無限成長的發展神話」下政府應當重新釐定環境政策，建立一個「當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發生衝突時，應以環境保護為優先」的政策，並儘速建立完整妥善的公害法則。對杜邦公司則鄭重忠告鹿港擁有數百年的人文傳承以及文物古蹟，這些民間智慧是無形的財產，不是任何物質承諾可以補償¹⁴⁷。

學生們富有理想又浪漫的心靈，期許當地運動的領袖及運動組織者必須意識到該運動與整體國家發展的聯繫，而不只是侷限在地區利益的關心，他們建議要深化這個運動的內涵，不管杜邦來不來都必須持續基礎性的環境教育工作，讓運動的生命繁衍下去。

然而，層出不窮的污染公害事件與自力救濟並不是社會一時的脫序現象，或是制度結構性危機的徵候，而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杭之以為環境運動顯示國人對成長的崇拜，這種成長狂熱的意識形態是西方文化現代化理論的價值，以為的財

¹⁴⁷ 杭之，1986，〈反杜邦運動的歷史意義兼介「台大學生杜邦調查團綜合報告書」〉，《文星》第 102 期，頁：29-38。

富能提供更多就業、降低汙染、帶來平等與除去貧窮。而台灣也在這種追求經濟成長的潮流行一種以經濟建設為主體的「現代化運動」，卻不思考成長背後我們負擔什麼樣的社會成本。另外，近來方興未艾的環境運動反映民眾失去對既存的制度構與規範體系的忠誠，社會之代議的、組織官僚政治制度僵化無能，不能有效因應社會問題，也不能迅速傳達民間社會的聲音。當社會制度及規範在不同社會力量衝突時不能發揮功能，而使社會中某些成員受到持續地損害時，這些成員勢必會與既有之制度結構的優勢價值決裂，進而反抗這種優勢價值形成一種抗議運動。抗議運動若進一步重新選擇新的價值導向和社會目標，並以批判既存的支配性文化和制度，期望新的社會整合和建立新的道德秩序，那麼社會運動就產生了。

論者說明台大學生參與反杜邦運動是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實踐運動，代表八〇年代以來校園文化和學生活動開始出現較持續的政治、文化自覺批判。雖然剛開始仍較侷限在校園民主化、自由化的問題或是受到黨外影響，但一些具有獨立反省能力的知識青年從自我反省批判中感知要走向民間，知識分子要能突破「民間/知識分子」的分野，立足在社會中進行啟蒙、批判與實踐使自己成為有機的知識分子（杭之，1986：38）。

學生下鄉運動及杭之的論述中，以突破既有體制和價值的抗爭意識已經逐漸形成，知識分子為主的抗議運動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期待人民更加自由、社會更加民主，並試圖建構社會運動和思想的內涵。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學生渴望認識土地、實踐民間的動力和《人間》雜誌以人民、土地、歷史為觀看；知識分子以自我反省為核心；對黨國依附經濟為批判的第三世界觀有本質上的不同。學生們雖然試圖打破既有的象牙塔走向民間，卻侷限在個人對現實的反抗；欲奮力地掙脫壓迫和束縛卻忽視現實各階級的矛盾差異；雖然反思殖民歷史和現代的消費文化，卻縮限在反黨國威權與反中國，失去以中國民族主義對美日兩國自冷戰以來對帝國主義性質與意識形態的批判。

4.3 結盟、教育、反體制的改良主義

八〇年代中後期台灣社會已經逐漸邁向政治開放與民主化的過程，反汙染的公害運動揭露國家體制的無能、公權力不彰和官商勾結的結構問題，方興未艾的自力救濟與社會運動蜂起擴大了主體的參與。同時，自中美斷交後國民黨在面臨政治危機時逐步開放政治自由化，黨外勢力陸續展開新生代的民主運動，認為國民黨以禁忌、神話隱蔽社會進步，《美麗島》雜誌的目標就是要脫離權勢束縛、反對軍事特務統治並以選舉、地方自治、民意監督政府為民主實踐，其知識言論和反抗運動都指向國府腐敗的系統。隨著美麗島事件激化，黨外政治運動也開始擴張至校園的學生領域，學生與黨外之間雖然在主體與客體及運動目的形成爭論，但黨外運動的拉力與抗爭行動引起部份學生就此投入黨外運動。另一部份的學子則在校園運動力圖學生政府的理念經營，建立代議制度與普選，要求學生自治權、參與校政，尋找脫離教條主義與父權制度宰制的反抗運動。

自 1972 年 11 月底蔣經國政權民主化方向實施第一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大畢聯會發起學生的監票員活動，以此為機會做為學生參與民主政治的行動象徵。保釣之後延燒的台大校園民主運動，學生帶著「走出校園，走出象牙塔，走向社會，走人民間」的理念在這次的行動中發展出「擁抱斯土斯民，參與民主選舉」的口號，鼓勵學生參與民主選舉並痛陳識份子與斯土斯民疏離的錯誤¹⁴⁸。

七〇年代末，受到美麗島事件所造成的巨大震盪催化台灣社會、政治環境變革，也促使一些知識分子和學子青年開始透過校園的政治、社會環境來反省自身的角色和處境。面對台灣加速工業化造成的農村問題，擁抱斯土斯民的理念促使知識分子介入現實社會。八〇年代學生運動在反杜邦事件中以實踐走出書房進入民間，將反公害運動的拒絕公害提高至批評公害結構的層次，學生開始有能力向

¹⁴⁸ 謝史朗在《畢聯會訊》61 年度第 2 期發表〈擁抱斯土斯民〉認為知識分子在歷史角色中常因為擁有權力後產生腐化與投靠在位者的現象，這是誤用「道統」的觀念，因而疏離斯土斯民並成為對立，藉此呼籲知識分子當擁抱斯土斯民。鄭鴻生回憶認為當時「擁抱斯土斯民」的觀念透露出學生時期浪漫的民粹傾向。(鄭鴻生，2001，頁：175)

社會發言介入公共事務，而不僅是父權體制下只能學習與接受的客體。

然而，台大學生自發性到民間去的行動卻遭到校方及有關權力體制的壓力。介入反杜邦事件的主要社團「大學新聞社」被校方以部份文稿未依規定送審即以刊登為由，處以停社一年及三名負責同學記過處分。這次的事件引發學生以言論自由為訴求對校方官僚制度及僵化教育體制的反抗，展開一連串言論自由的改革運動。

自八〇年代中期，台大就經歷「台大普選事件」、「李文忠事件」而在校園裡展開民主化、自由化與文化批判¹⁴⁹的理念，在台大校長孫震的高壓政策中，也產生多次校園抗爭事件。大新社事件後的自由之愛運動則是學生長期對於校園父權式法規對學生言論行動自由的諸多限制、黨政機器介入校園的特別的權力關係以及國家在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上給予適度開放的軟性控制，在潛意識或非意識面削弱學生思想與認知現實的能力之總體批判。

學生們認為人們應有表達意見的自主權，但是在校方權力管控的高壓與黨國機器的意識操縱下使學生面臨恐懼威脅、公私領域生活失去尊嚴和主體性的喪失，為了「挽救主體」－學生們欲從盲目的束縛力量和宰制關係中解放出來，為自身行動自主的決定，凡壓制人性自由的體制就是在道德上越軌的不合理體制，我們就有權向它進行反抗和挑戰，不要向支配權力低頭，脫離宰制為愛自由獻身行動¹⁵⁰。

學生抗議行動的基本立場是和校園既有的支配性規範徹底決裂，進而尋求建立大學校園裡新的公共生活領域、自主的規範倫理，形成支配與反被支配的衝突，在「反被支配」的抗爭中學生要求對「大學權力結構」加以全面檢討進行改

¹⁴⁹ 1985~1986 年台大大新社提出「新民粹」與「社會實踐」，內容是針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做批判，認為這是體制進行再生產的機制，也是造成校園群眾冷漠的主因。他們認為消費社會物欲化的傾向，導致學生認知的空洞化與表面化，而「職業」與「利益」的誘因致使人在學生的過渡階段無能面對台灣人民現實的苦難，校園與社會的分離使學生缺乏本土意識，並且無法吸收到社會進步與開放的空氣。所以學生們必須向民間學習走出校園到民間去，再把民間進步的意識帶回校園，以豐富學院貧血的文化。(鄧丕雲，1993，頁：45)

¹⁵⁰ 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1987，〈新社會宣言－大新事件與民間哲學的確立〉，《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頁：149~153。

革，並且以自由之愛運動的「新社會宣言」來確立其理論基礎。

「新社會宣言」認為在反杜邦運動中國家權力、官商資本與多國公司聯合對民間社會的壓迫；在校園民主運動中，則是學生與少數教授對抗強大的行政支配體系，二者的抗爭形式都是反體制(不認為透過體制內的權力遊戲規則運作，即能改變現有的不平等關係)；可是由於現存民間社會的相對薄弱，以及學生團體資源動員的匱乏，其抗爭內容不得不限於局部，乃至採取改良主義。對反體制改良主義言，社會實踐的原始動機是植根於生活世界中具體束縛的逐步超越，而不再仰望終極目標，之於統獨、道德使命感及左右派有本質的區別，所以是一種沒有彼岸、不斷向前的抗爭過程。由於改良主義突顯主體認知及實踐的有限性，個人的投入運動勢必將基於生活世界中有效資源的掌握及動員，因此這種不斷向前辯證否定的過程並不是革命的累加，而是基於具體實踐策略，逐步擴大改革的領域，這些策略，可能在不同時空中呈現階段性發展，也可能採取暫時性妥協¹⁵¹。

再來，知識分子當拋卻道德使命感的空洞虛矯身段，他們認為到民間去的意義在於確認自我是社會整體的一部份，透過深入民間有效掌握社會脈動，才能對自我實踐加以定位。校園只是整個控制體系的一環，所以「社會包圍校園」策略是經由民間反體制力量的聯合進一步壯大校園民主運動的資源。另外，學生透過民間反體制作見證而脫離傳統家長主義的意識形態，建立學生言論的公信力。

簡言之，反體制改良主義作為個人的實踐哲學，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上為謀求自我解放及社會解放，採取有效動員資源和自我辯證的生活觀。由此，統獨迷思、台灣結對中國結、政黨區分、省籍區分，乃至階級區分預顯得次要而必須加以揚棄，以粉碎所有教條主義，把抽象化的神聖教條納入具體的實踐考驗。因此，個人參與實踐的原始動力變成是體認到個體必然是社會整體的一部份，為求自我解放而邁入社會解放的過程。新社宣言就是要「還力於民」，民間力量的成長就現階段的台灣社會來說具有對抗支配霸權的重要意涵，所謂的「民

¹⁵¹ 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1987，頁：151~152。

主」和「自由」才能在現實中紮根，這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唯一希望¹⁵²。

學生運動是社會整體改革的一環，像是台大學生要求教育改革與自由之愛運動的操作模式在規範內取得組織權利，爭取類似「校園議會」模式的發言權，促成教育體制改革、反父權管理、爭取學生參與權、取消審稿制度等。台大學運在層次上雖然有升高之勢，但同時也可說是到了法律和校規規範的頂點，朝向政治民主化自由化的體制內改革。同樣，在環境運動抗爭上也只是形成壓力團體以促成環境保護署的成立。

1987 年以學運為主的《南方》雜誌將高雄後勁反五輕運動視為人民與國家機器的對決，認為汙染事件突顯的是國家壓榨人民的基本生存權，這是人民民主實踐的考驗。他們將台灣戰後的國家資本壟斷經濟與公營事業的支配性揭露出來，並指出這是黨、國、資本的共犯結構，國民黨以黨國權力意志、利益和意識形態貫徹行政、立法、司法等情治體制，並全面掌握傳播媒體與學院，因此後勁居民當以不可被剝奪的人民生存權面質經濟神話，並與進步知識分子、專業學者結合對中油－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批判¹⁵³。

左不野的論述大體上代表學運號召環境運動、工運、黨外運動等彼此結盟串連及民眾知識教育，透過人民向國家不斷施壓、監督，以達成「人民包圍國家」的抗爭行動為組織的目標與展望。但是這些論述將環保運動與公權力介入形成絕對的關係，環保運動也轉為是對現有政治體制的改造，反抗的主體不但無法因為議題擴張相同地擴展，環境論述的對象、內容、觀點和論述主權轉移到特定的菁英階級身上。

改良主義者看到的教育問題是現實政治體制支配的關係或扣合造成的，但其一元化的思考和分析路徑使許多複雜的問題都被化約成「國際兩極的政治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下的束縛」、「政黨－國家型態的霸權支配」的結果，此種泛政治的化約論述使當前學生喪失反省和全面關照的能力，在原因和結果之間缺乏辯證

¹⁵² 同上。

¹⁵³ 左不野，1988，〈人民對決國家機器－後勁人民民主的實踐〉，《南方》第 15 期，頁：65~71。

關係，所謂的「真理」變得非常簡單，就是唾手可得的「自由」，這世界似乎不存在同胞、民族和土地之愛，只有極端的「權力之愛」¹⁵⁴。學生運動雖然有越來越多具體的反抗行動¹⁵⁵但其論述內容和行動卻傾向疏離歷史、人民和社會真實與需要。

4.4 非歷史化下的主體

以結盟和教育民眾的反體制運動為環境運動開啟某種組織結盟與運作的模式，環境議題也開始與每個人的生活層面息息相關。然而，由中產階級(某一特殊階級)主導的環境運動(包含婦女與消費者運動)，將整個運動的方向帶往現代化意識和其特殊階級利益的體制改革，社會運動的發生不再藉由老百姓平日生活中的政治活動與反身性，而是建立在非社會化、生活化的理論上。這股以白領階級為主的反對勢力不僅干預了環境運動的發展方向，也成為日後反對運動和論述去歷史化與民粹化的濫觴。

1971 年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這是國民黨政權一世代以來企圖代表中國的第一次重大挫敗。自 1949 年國民黨退守台灣與冷戰、台灣附庸美國的架構、兩岸的分斷體制¹⁵⁶中，便試圖在政權上建立「真正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和正當性。在地緣政治上，國府獲得來自美國強權的支持和經濟支柱，廣泛被視為最「現代」與「文明」的外爍正當性。另一方面，國民黨自北伐時期陸續與五四的新知識分子有所結合，但在國共分裂時則將左傾勢力越來越明顯的新知識分子逐出陣營，並全面斬斷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五四傳統。同時以兩岸分斷為背景塑造國民黨雖敗退卻仍是真正中國文化命運所在，是中國在大陸進入「俄化」黑暗前唯一燈塔的內在正當性，這雖然是國府能夠進行動員的手段，但在歷史分斷下造成兩岸二元對立的深遠影響。

七〇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面臨新的內外情境與政權合理性的挑戰，在此背

¹⁵⁴ 陳道，1987，〈校園動盪下的「自由之愛」〉，《文星》第 109 期，頁：26~27。

¹⁵⁵ 抗爭、絕食、聯屬活動及行動劇等等。

¹⁵⁶ 分斷體制(system of division)指出一個結構性事實：兩岸分斷，但同時又共構、共維一個相互制約、相互影響以及相互需要的一個「體制」，從而兩岸都是這個體制的構成部份。此概念由白樂晴教授提出，論者著有〈為了克服“分斷體制”運動的“日常化”〉一文。

景中，戰後台灣普及教育成長下的新興階層、中小企業者(大多屬本省人)開始對政治長期緘默感到不耐。以現代化理論為主的留美學人、青商會幹部、黨國本省籍英菁英等力量形成《大學雜誌》並陸續發表〈台灣社會力分析〉一文，文中強烈表達本省青年在政治忽視上的不滿，並半遮掩地宣告本省中產階級與本省新興中小企業主即將進入歷史舞台¹⁵⁷。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興起，其論述也開始以實踐民主、破除窠臼為目標，反對國民黨的軍務政治，並且在赤化中國的意識中視國民黨成為外來政權，反共等同於反中國，進而中斷歷史思想的連結和廣度。國民黨為持續其統治權而以道統自居，為達其政治目的：正當化中華民國法統及「去正當化」對岸政權，從而鞏固此政權的威權與家父長統治，但至今國民黨沒有面對帝國侵略、國共內戰、中國現代化路徑的挫敗和國府失守台灣等史實。

八〇年代末，學運激烈反叛威權體制的「自由之愛」引發出對於五四運動以來的自由、民主的訴求，並重操中國現代化與政治文化制度發展的問題，五四運動的內涵和除舊佈新的精神儼然成為台灣自由民主和現代化依循的方向。最常見的文化論是把中國一切反民主、反自由、反平等、反理性、反現代的落後現象，都歸於二千多年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封建專制傳統文化，認為這個傳統帝王思想太長遠，歷史包袱過重，且這個體系裡面根本沒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治等現代觀念和價值系統，因此五四運動的民主政治和現代化運動在中國根本沒有適當的土壤讓它生長。另外，自由主義者為了追求一個更合理的政治與社會體制而與威權鬥爭，在精神上直接聯繫上五四新文化運動¹⁵⁸，但在挑戰黨國威權卻是以一個為理性所啟蒙、為自由所召喚、為個體所激發的主體才是挑戰威權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唯一主體。其社會歷史哲學架構是反共親美，不質疑資本主義的經

¹⁵⁷ 趙剛，2008，〈超克分斷體制下的歷史與主體：從學習做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中國人開始〉，頁：145~146。

¹⁵⁸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後來雖然分裂為左右兩股思潮，形成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知識對壘，兩者的共通點乃是對「舊」的揚棄，並各自提出現代化的方案。所謂的「傳統」是一個絕對的貶抑，要擺脫歷史的負擔只能機會主義地使用歷史，自由主義者也未能超越這樣的思想限制，反而為後起的民粹主義所包抄整編。」同上，頁：145。

濟與社會發展意義，重視召喚並教育個人主體的出現，並與台美斷交和中美建交等內外雙重挑戰下萌芽的台獨意識逐漸有效地連結起來¹⁵⁹。

自由主義思想曾在白色恐怖時期扮演反威權反鎮壓的思想啟蒙導師，也為七〇年代的保釣知識分子提供民主自由改革與抵抗權威的知識和養份，但在釣運之後的民族主義議題上卻和國家威權、右翼份子連合圍剿左翼反資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指稱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三世界觀反美反資卻不反共，有赤化的疑慮，同時在國民政府宣稱是中國政府的合法地位下在思想、歷史、政權、社會等各方面產生脫中(國)的分離意識，雖然當時台獨思想仍為國府所不容，但其思想演變和黨外運動的發展卻深化台灣意識去歷史、形式化和右轉傾向。

從國府在冷戰體制下塑造文化思想、歷史的分離主義，將中國他者化的意識形態，以及台獨意識加深對中國的全面妒恨與消除，台灣戰後自主社運所號召的主體和知識分子在左翼思想中挫、現代化意識和歷史分斷下根本沒有文化傳統可繼承、可批判。雖然四十多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財富累積，在資本大國粗俗的商業文化移植始終沒有和生活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努力使台灣的中國人和中國現代主流文化(五四文化、文學傳統)切斷關係¹⁶⁰，長期禁止的結果是台灣人民、土地、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獨立於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台灣的自主社運和公民主體並沒真的建立起來，所謂的自由在個體解放的概念下顯得蒼白無力，而所謂的民主更是反共(對立於中國的封建傳統)和反威權(國府軍事特務統治)的意義下進行，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召喚，而非主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實踐。

4.5 現代意識下的反叛

八〇年代，國民政府在台美斷交與中共和平統一攻勢、黨外政治運動、民進黨成立和國內層出不窮的自力救濟運動中陷入控制體系崩解的危機，蜂起的社會運動中尤其以環保和工農運動直接打擊既有的經濟體制，從論述當中解析黨國資本的經濟結構對國府政權的威脅也最大。

¹⁵⁹ 同上，頁：139~143

¹⁶⁰ 呂正惠，1987，〈國民黨與五四新文化傳統—從二、三十年代文藝長期不開放談起〉，《文星》第107期，頁：66~68。

然而，長期戒嚴和安全體制阻滯了思想、文化及知識創意的發展，尤其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的生產力空前大量地生產，遠遠超過人類內在和自然的需求，這種快速生產、分配，迅速換成現金利潤後繼續投資擴大生產的消費方式，成為現代生活與社會的一種嶄新體制。人類欲求和需要的「創造」和「管理」經由企業家刻意塑造一種享樂主義和官能解放的「新」社會氣息。

八〇年代台灣的文化落入低俗、官能和野蠻化，社會上風行的樂透彩券和青年飆車現象，象徵新的消費欲望和道德低落，在地方抗爭運動興起的同時，還包括另一種反叛的類型。這種反抗幾乎無所不在，面對父權體制、僵化教育或單調非人性的工作內容、主體喪失，以一種毫無拘束、立即的激動情緒及自我中心反抗權威。此種經由個人對現實社會的挫折、忿怒以及肉體打扮、內體極限的官能直接反叛，是在既存體制的妥協與懦弱中獲得一種自我調侃。但是整個社會被化為個人欲望和意志的表現，而沒有團體目標與公共生活。這種新興虛無主義式的反抗因為堅信「自由只能透過個人實踐獲得」，公共生活衍生的價值規範則被視為或多或少的權力壓迫，因此他們雖然試圖以新的理論來拆解台灣的符號體制，卻不曾將自己擺入社會運作中來考察，使批判者的言論虛無飄渺而荒謬¹⁶¹。

不論是虛無主義的反叛還是學運的「自由之愛」，在長期黨國威權的壓制與思想控制下，台灣將近四十年的民主抗爭運動由於歷史因素及思想貧瘠與壓制，整個民主抗爭乃是一種簡單化而未經思辨的方式來呈現，有著「為反而反」，卻沒有「為超越而反」的抗爭。抗爭未曾思辨化在進入大眾消費時代的八〇年代，更被大眾文化侵蝕而虛無化、庸俗化，儘管八〇年代的社會運動活潑無比，但彼此之間卻無法成立雄壯而智性的聯盟。在「東方式的專制」下我們產生「東方式的自由主義」，一種機會主義性格的自由主義；以及「東方式的反抗」，一種與汝偕亡的虛無式悲情與吶喊，台灣也就無法展現出雄壯而智性的民主力量¹⁶²。

回顧八〇年代充斥著社會力興起、虛無反叛，體系失控和社會失序，在紛亂

¹⁶¹ 江迅，1988，〈從荒蕪到荒謬 1945~88〉，《人間》第 38 期，頁：145~152。

¹⁶² 南方朔，1987，〈一起來做英雄〉，《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頁：10~15。

的吶喊與壓迫中若輕率地指責人民「短視、急功近利、粗暴不安、不知珍惜、沒有尊重」是一種欠缺歷史同情的偏執，對於台灣戰後歷史的清理和回顧，解構統治者對待歷史的野蠻有助於人們跳脫太簡便保守的價值批判，而給予歷史人民多一些同情和理解(江迅，1988：145~152)。

第四章 台灣意識興起的九〇年代

八〇年代，隨著台灣各地自力救濟與環保運動蓬勃發展，包括高雄後勁反五輕、反核電、反核廢料，更在 1987 年政府宣佈解嚴後農工運動、環保運動、學生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少數民族運動、黨外運動等揭竿而起，在社會力爆發的年代也產生不同的思想論述。

《人間》雜誌以地方人民、底層階級和工農階級生計生存的論述，以及反現代化反資本剝削和歷史分析下的第三世界觀，這樣的思想架構和視角至八〇年代中後期的環境論述幾乎中挫，在思想知識貧瘠和壓抑的年代，與中國連帶具歷史、階級分析的第三世界面向並沒有延續下來，特別是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連結在鄉土文學論戰後深化為統獨論戰，政治正確將論述、運動、主體和歷史分殊化。

另外，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發展從雷震的組黨時期、五六〇年代殷海光的科學實證論到七〇年代已產生轉變，在反共和不反美帝的歷史淵源之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台灣的發展與內涵被南方朔批評是西化派的延續，在歷史社會哲學架構與三民主義的《夏潮》體系形成左右分歧。

左翼思想中挫、自由主義右轉、威權鎮壓和黨外運動都直接和間接地影響環境運動和論述的發展與方向。知識分子們雖然企圖提供人們爭取更加自由、民主社會的養份，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新的價值觀，卻僅能以符號式的反威權自恃，受壓迫者找不到明確、具體的正義概念作為自衛屏障，無足以揭露民間生活裡多重壓迫的實相，在政治逐漸自由化、民主化；經濟朝向民營化及政府開放勞動基本權利的同時，卻隱藏著階級壓迫、統獨問題、國家獨占資本等複雜問題。

歷史走過七〇年代國府政權鬆動、八〇年代社會力與民間反抗意識蜂起，至九〇年代台灣社會的主流思想包含現代化意識、台灣族群意識和去歷史的民粹思想，同時社會上面臨後資本主義發展下產業依賴、傳統衰退、城鄉差距、工農運動、環境運動等現象，國家角色趁勢而起扮演資源整合與文化重整，試圖建立起全國性文化生活學習運動。

然而，三十年來左翼思想的中挫與現代化發展下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冷漠，人

民普遍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熱誠，也未能建立起真正對土地和自身的認同。九〇年代族群意識高漲，在脫中的歷史觀、兩岸分立的台灣意識以及社運的政治化/國家化¹⁶³，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層面都宣告國家機器的介入。

(一)、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

1.1 背景

八〇年代末，冷戰的後期效應隨著蘇聯解體開始產生一連串的反共論述及意識。1989 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共產黨對人民民主自由的無視與鎮壓引起國際撻伐，國際間反共聲浪不斷，而在台灣有長足發展的本土意識與現代化意識思潮認為共產黨包括蘇俄都是非現代化與落後的表徵，反共與反中國畫上等號，將中國貶抑為政治赤化國家，將中國他者化，視中國為落後、非民主、野蠻的象徵，而台灣四十年來的經濟成長成為現代的指標，是民主、自由的一片淨土。

經濟方面，由於美援中斷、強國實施保護政策與台灣外交孤立的原因，為要讓台灣經濟升級從經濟成長到成熟社會而提倡產業民營化、全民付擔國家經濟。台灣長期的加工出口經濟不著重產業技術研發，產業升級受到阻礙，加上國際情勢的孤立，外商流失，政府開始積極呼籲國內企業扶持國內經濟而開放大規模的民營化。民營化讓企業家、資本家以環保之名有效開發在地資源和工廠設立，將土地資源和勞力都更進一步納入資本的運作邏輯。此外，由政府及企業制定法規和福利措施進行環保防治為抗爭與賠償建立一套運作機制，逐漸消除社會中的矛盾和階級差異，降低環保運動中以農人、工人為主的反宰制力量。

風起雲湧的八〇年代在各種社會運動與正義之聲中逐漸落幕，九〇年代的環境保育工作逐漸由國家及企業接手，擔負起環境改造和汙水處理。汙染現象地改善與金額賠償降低地方上的反抗聲浪以及普遍社會運動的消沉¹⁶⁴。另一方面，國

¹⁶³ 趙剛以為社會運動本就應該是政治運動，但不必然是「朝向國家」的運動，國家一直以來在台灣政治、思想和社會、社會運動上都有其威權角色，現階段社會所面對到的問題並非政治化而是國家化。趙剛，1994，〈公眾、國家與民主政治〉，《小心國家族》，頁：29。

¹⁶⁴ 李丁讚視八〇年代初期的自力救濟為一特殊的民眾力量，從人民受苦、受害的身體產生不可侵犯的環境權感受，這是「社會力」發展的源頭，也帶動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的高峰。但在九〇年代之後，民眾的身體失去行動者地位，在專家的領導下組織化而減少民眾的能動性，他解釋這

家挾其強勢的行政權力與資源介入市民社會，企圖主導社會運動及價值體系，國家對於自主社運和市民社會的壓制與控制，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及科技精進都變得更加完備，社運在常規化的限制中不再具有任何改變既存體制的理想與前瞻性，而是由上而下的政治國家動員的召集令，與朝向國家發展取得政權的運動。

九〇年代李登輝政權與民進黨一同共構在現代化意識與分離主義下，台獨意識將中國他者化，形成地緣的、省籍的政治認同，分化國內的族群問題，並同時進行國族主義的打造。

1.2 生態主義與「本土」意識的浮現

七〇年代以來的環境論述，包含《夏潮》、《人間》中以第三世界來反公害的論述，及《環境科學通訊》、《科學月刊》以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知識為主的科學研究，後者多是分析環境科技的認識，或是介紹環境保育的相關法令。

八〇年代初，環境保育已成為十分專門的學問，包含生態學、地理學、氣候學、水文學、經濟學等等的法則與實務，從早期回歸自然的浪漫運動到資源的更生用與經營，從反西化公害思想到反威權體制下的思想禁錮，環境運動的論述方式隨著台灣思想本土化與作者的核心關懷不同也產生改變。

首先，是從具有中國儒家思想的生活哲學轉變為以台灣在地化與現代化發展為認同的歷史觀。

以八通觀的開發為例，清光緒元年與日據時代都曾派人到過八通觀開鑿道路，進行布教化、通番情，如今八通關雖然也遭到一些破壞但已自己形成一個生態系，政府卻要在其上進行新中部橫貫公路的工程規畫，並開設八通關車站。韓韓認為百年後的今天，登山隊帶來塑膠袋、鋁箔包、塑膠瓶，這些現代科技文明產生的合成化學物與工程計畫下的推土機、怪手，將是整個八通關生態系的破壞者。人類的生態問題，都是因為「發展」活動造成的，一切都是為了開發。然而，馬以工則描述八通關具有沈葆楨來台建設公路的文明意義，並且在劉銘傳巡撫時

一弔詭的過程，就是「社會力」在組織化與理性化中轉變為 Foucault(1975)所謂的規訓的力量，讓身體變得服從、柔順而可以駕馭，稱之為「社會力的馴化」。李丁讚、林文源，2003，頁：110~113。

繼續開山撫番外，積極推動現代化的建設，八通關的古道是人類活動的軌跡與歷史的發展¹⁶⁵。文中不乏對八通關自然景觀的陳述，包括溪流、山谷、林木與花叢。馬以工認為八通關古道的完整有保存我國文化資產與古蹟的價值與重要性，她以美國為例說明先進國家設立國家古道的法定地位，並且發展國家景觀步道作為文明社會中人類休閒運動的場所。

「如果我們按吳光亮的舊跡把古道的棧道、吊橋整修，沿途再把營盤舊址恢復成為休憩所在，公路則開在公路應該經過的地方。這一百餘公里的八通關古道雖然與美國比起來微不足道，但很可能，保存這條古道，將是我們這一代的人能夠送給後世萬代子孫最好的禮物。」(馬以工，1983a：256)

林俊義以為八通關不僅是台灣歷史文明的象徵，更是具有台灣精神的地方¹⁶⁶。「多少年來，『美麗寶島』對我也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已。在都市長大的我，壓根難以想像台灣還有什麼自然的景象。……直到年前，偎依在玉山東麓下的八通關呈現在我的眼前時，我才忘卻了世界還有其他美麗的地方。走遍了世界，發現世界就在這裡。在那一刻，『美麗寶島』才給了我實質的意義。」(林俊義，1989c7：159~160)八通關的景色讓林俊義認識「美麗寶島」的實質意義，他呼籲國人要認識鄉土，留下一塊乾淨的土地，「八通關代表的是一個精神—台灣的精神。它的完整性，才是代表我們經濟發展的成功。留住八通關吧!留住它，才能留住你我的精神!」(ibid.：161)八通關雖然有其生態文化的保存價值，但上述文章卻表達在片段與簡便的歷史中發展出抽象的民族情感與在地認同。

此外，隨著環境污染與破壞陸續嚴重，林俊義目睹國內環境的齷齪與破壞後，難以相信天人合一與自然一體的說法真的內化在國人心中。他尋問：「為什麼我們的環境破壞得如此透徹？為什麼我們如此善於污染我們自己的環境？據說，中國大陸的環境也是烏煙瘴氣，破壞的程度可以與我們相比擬、爭長短。我

¹⁶⁵ 馬以工，1983a，〈今山古道—八通關〉，《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242~256。

¹⁶⁶ 林俊義，1989c7，〈不再跳躍的綠野—台灣高山野生動物的命運〉，《自然的紅燈》，頁：155~161。原文收錄 1983/4/21，《自立晚報》。

們中國人在自吹自擂時，總是看不出這種天大的矛盾。…理想與實際的差距常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徵。人與自然合一的理想與糟蹋破壞環境的事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不禁對我自己過去的胡言慚愧。我再也不敢大言不慚的向外國人說出這套中國文化的大道理了。」(ibid.：162~163)

林俊義認為今天國人隨地吐痰、到處小便、把殘餚剩飯往地上掃的生活習慣來看，很難想像中國環境衛生是清潔的，更不要說是否真的達成天人合一的理念。19 到 20 世紀初，中國人為了滿足糧食增加而將山林砍伐成為耕地，還有傳統的燒山習慣，以及中國在書法、建築上需要大量木材而對自然界的開墾拓荒都成為「林文」中討伐的對象，認為濫墾與燒城是中國的老習慣，甚至對台灣命脈的森林濫伐、對野生動物的殘殺、對環境的汙染、毫無秩序的交通與核電廠計畫都沒有長遠的計畫，也沒有培養出對下一代的義務與責任。

「我們不但是一个沒有未來倫理的社會，也是一个沒有生態倫理的社會。中國人曾自詡代表天人合一、人與自然打成一片的文化，其實，森林的破壞、農業經營觀念(如只以糧為綱、圍湖造田和開墾的觀念)、水利的控制、對生物的態度、公害的現狀以及工業布局的錯亂來看的話，中國一直都是以『人定勝天』和『愚公移山』的蠻橫態度來對付自然。」(林俊義，1989c8：179)

「林文」認為國人不但喪失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也沒有前瞻未來的能力¹⁶⁷，然而當他試圖批評國人沒有素養時，也否定了台灣與中國儒家思想的連帶性。

八〇年代初期，環境論述有許多以保育台灣自然生態、動物和古蹟文物為主的環境訴求，雖然林俊義和馬以工的論述透露出對於台灣本土歷史與人文精神的情感，但是因為切斷與中國思想文化的臍帶關係而失去歷史宏觀的角度及對未來道路的遠見，而只能在現代化潮流中尋找狹隘的台灣精神和歷史文化。

第二，人與自然合一整體觀的論述核心從以人為主體轉移到以動物、自然生態為主的生態主義，將自然、土地和資源納入國家體制與現代化經營。

¹⁶⁷ 林俊義，1989c8，〈沒有生態和未來倫理的社會—論公害與生態危機的解決〉，《自然的紅燈》，頁：56~65。原文收錄 1984/3/15，《中國時報》。

八〇年代環境論述開始著重在地野生動物與生態保育，認為這是維護自然生態體系的解決之道，設立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有助於各種物種的保存¹⁶⁸。為了保護野生動物的生存與自然棲息地的維持，台灣各地開始設立保護區與國家公園¹⁶⁹，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育樂及研究。馬以工認為設立國家公園是將自然資源由國家妥善維護保存下來，為子孫萬代提供永續與享用。環境保護由人的生活哲學轉移到某些特定生態、生物與古蹟為目的，並且為環境設立界線與理性的經營方式，在此前提下開發與保育能夠彼此共存。

「…就主張保育的人，並不表示什麼建設開發都不要了，而是在開發與保育之間我們要做一個評估…。推動自然環境保育的想法，在全世界都一樣，特別是落後國家，都是一件極為艱鉅的工作。」(馬以工，1983b：217~227)¹⁷⁰

如何有效地利用資源成為生態主義的核心論述，強調經濟生態化與生態學經濟化，也都使環境管理變成經營的一部份，在任何大工程建設中確實實行環境評估，讓生態與經濟平衡發展，一方面政府要有配合能源的政策，製訂相關法令，另一方面還需要教育國民對於生態知識的不足¹⁷¹。環境問題在於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資源與教育人民時，也就失去對現代化的批判。

1987 年林俊義以〈建立環境價值倫理與生態理想〉一文說明台灣各地產生的自力救濟是民主社會發展下的現象，特別在長期僵化的威權社會要更新復甦的時候，政府應當加以鼓勵並藉此認識民意與提高民眾環保意識。但是自力救濟還不算「運動」，因為自力救濟是人民奮不顧身的求生反應，大多缺乏統一策略，又無正式組織難以持續行動，常常事情暫時「解決」後，行動就減退或消跡了¹⁷²。

¹⁶⁸ 林俊義，1989c，頁：143~150。

¹⁶⁹ 1982 年 9 月 1 日，墾丁國家公園為中華民國第一座國家公園。

¹⁷⁰ 馬以工，1983b，〈一個國家公園的誕生〉，頁：217~227。

¹⁷¹ 相關文章：〈我們要健康的活下去〉、〈健康的環境才是經濟發展的保證〉收錄於：林俊義，1989a，《台灣公害何時了》，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頁：102~107。

¹⁷² 林俊義，1989a6，〈建立環境價值倫理與生態理想—預祝民眾環保自力救濟運動的成功〉，《台灣公害何時了》，頁：183~188。

「這種行動還未構成運動的要素，因為一個運動的主要成份，除了策略一貫、組織嚴密、行動持續外，最重要的必須有一主宰行動的指導思想。在環保運動中，如缺乏一個環境價值觀及生態倫理或生態主義(ecologic)為思想的後盾，一切運動終將是短命的，…。」(林俊義，1989a6：185)

林俊義認為行動的背後需要一個對自己土地及生態的環境價值倫和生態理念，並且政府落實環境政策才是提昇環境和生活品質、遏止惡化的唯一快速力量。因此，目前環境的解決之道在於政府的決心，政府當積極肩負改善污染的責任：成立獨立環境保護機構、制定國家環境政策法、要求環境影響報告、整頓工業區的污染，並且鼓勵人民提出檢舉抗議，成立民間團體幫助受害者與監視公害，另一方面加強教育並提高全民環境的意識，第三是讓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提供公害資料和事實，以減少損害。

環境運動確實需要一個對環境價值的理解，然而，從七〇年代以來具有中國思想的人文價值觀在八〇年代中挫，在生態主義與本土意識下的環境倫理離開對人的關懷而進入環境保育議題，對歷史的理解也趨於片面，失去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面向。

第三、從反西化的科技文明到反獨裁政權。

八〇年代台灣在蔣經國政府推動的十大建設中分別在交通運輸(高速公路)、能源(核能發電)和重化工業(石化、鋼鐵、造船)投入大量資金，終能在國際石油危機中渡過難關。其中高速公路和核能電廠是為補足六〇年代飛躍成長下基本建設不足的補充建設，但是核能電廠一開始就沒有受到監督，而「原子能委員會」又缺乏責任心和知識的、社會的公信力，至八〇年代核電內部和環境安全及公害問題都嚴重地顯露出來。

七〇年代林俊義指出國人應避免對科技迷信，因為科技背後隱含國與國在軍事、政治上的競爭，也是強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和西化思想的入侵。至八〇年代末，「林文」仍然說明科技不是萬能並提出核電廠的各種安全疑慮，將美國如何以科技勢力和核電技術控制作為促成第三世界國政經依賴的手段揭露出

來，但是他卻未延續七〇年代具歷史內含的反資反帝論述，而批判第三世界國家及政府缺乏整體評估的核能文化。

「美國核能工業雖然可動用各種力量傾銷核電廠至第三世界，但是第三世界的國家如有一定健康的情況和心態，美國核能工業縱有三頭六臂，推銷技倆也很難得逞。」(林俊義，1989b：238)

但是第三世界國家通常都缺乏民主、公開的政治體制，在極權體制中進行密室決策，加上都有科技官僚都相信西方經濟發展模式是第三世界國唯一發展方式，因此深信科技代表進步和現代化，官僚體系也利用科技的集中化握有政治權力的集中化¹⁷³。

「第三世界的科技官僚常常挾持著威權或極權的政制，所作所為也都不須向民意交待，又自覺掌握經濟的命脈，久而久之就會產生一種目中無人唯我獨尊的特權心態。」因此反核是為了要民意參與，「我們反對核能，並不是反對核能的科技；我們反對的是制定核能政策缺乏民意的過程。」(ibid.：241)

林俊義表示他曾一再對核能發電提出看法，並非反對核能發展，而是了解台灣脆弱的島嶼生態體系，加上人才短缺、法規不全、組織不善和監督不力，深恐核能發電帶來的災害，因此台電公司必須公開其決策過程、營建、運轉經營的過程，按部就班比照美國核能法規的規定來運作。

八〇年代末，環境論述逐漸脫離中國人文精神與對人的關懷，強調人民自覺與環境權利的覺醒，轉向以中產階級為主的體制內改革，並建議政府以先進國德國¹⁷⁴、美國為參照設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與「公害汙染防制法」以制定更完備的環境法規。然而，生態主義的論述方式讓環境論述中的人與土地失去歷史脈絡下的社會面貌，這樣的環境論述不但脫離人類生存實際的現況，也孤立於我國

¹⁷³ 林俊義，1989b1，〈反核是為了反獨裁〉，《反核是為了反獨裁》，頁：228~241。

¹⁷⁴ 德國在 1971 年設立內政部直屬部長的「環境問題鑑定委員會」，1975 年制定「聯邦公共措施環境負荷評估原則」，規定聯邦政府一切行政行為均須從事環境負荷之評估，不論是具體開發行為或措施，還是環境相關的一切命令都要經過環境負荷的評估。從事評估的鑑定委員由內政部提名，由聯邦政府中的「環境問題內閣委員會」來決定。(摘自：李雅卿、林信和，〈不要讓你的環境權睡著了—政府的責任〉，《新環境》第 12 期，1986，頁：23~24。)

歷史文化之外，在本土意識興起的同時借鏡美式的環境運動與組織、文化資產的保存及體制內的改革方式，欲尋找台灣的發展路徑，卻逐漸切斷與中國的關聯及第三世界觀而發展出以台灣本地為範圍，但實際上充斥著現代化意識形態、移植西方的環境論述和運動模式。

1.3 綠色革命

1962 年生態學者瑞秋·卡森以《寂靜的春天》一書批判二次大戰中美國軍事科技對環境所造成的各式難以挽回的傷害。這是源自於人類對化學合成劑和農藥的誤用和無知。她的論述指出人類不能為其他生物代言，也不能將自然生態做為支配工具，主張人類應向自然學習，規範科技重新反省工業革命以後人類以欲求為主的發展典範。

《寂靜的春天》沉痛呼籲人類正視發展對環境與動植物所帶來的災害，強調生態體系和環境保育的議題，形塑出一套生態主義的論述，也就是環境至上抵制一切污染和破壞¹⁷⁵，進而要求更好的生命品質與生活水準，且理解到自然環境的生態系統與人文環境的社會系統有許多共同的元素，因此主張環境問題需從人類的社會、政治、思想等方面進行全面改造，在做法上除了挑戰現有政經體制外也主張重塑社會價值建立新的環境典範，例如「環境正義」與「生態倫理」等課題便成為新興的理念，這些理念以生態學做為連結自然與社會科學的介面，對於重建現代社會理想有深刻的影響。

但是此文並未對美國在二戰期間製造化學藥品及核武的暴力手段，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生產被迫納入資本主義的運作¹⁷⁶有更多分析，純粹在生態學上指正這些化學物質的使用可以得到改善。《寂靜的春天》批評的顯然是那些使用農藥化學和科技的對象，包括推動化學藥品的國家、製造出農藥的研究人員和市場化中不得不使用農藥的農民們，其中不平等的階級關係和美國強勢帝國主義並非

¹⁷⁵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著/李文昭譯，1997，《寂靜的春天》。

¹⁷⁶ 像是瑞秋·卡森所批評農人過度使用農藥造成水質、土壤、空氣等等的污染。但使用農藥造成污染的背後，可能隱藏著農人被迫在市場機制下進行單一作物的種植，又在效率、品質、價格和各種競爭方式中受制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

「寂文」所討論的。

另外，由《夏潮》、《人間》所記載七〇年代中期台灣地方上的汙染事件，顯示由農業進入工業化社會後所產生的階級衝突、城鄉差距和汙染影響生計等問題逐漸浮現。從報導上看來台灣的汙染情形多是煉鋼廠、化工廠對水源和空氣的汙染，並且這些汙染常常直接影響到第一級的產業，如農業、養殖業、漁業。以此來看，台灣的汙染狀況與《寂靜的春天》的背景，以化學和農藥為汙染源的形態並不一致，因此以《寂靜的春天》之論述作為參照發展出的生態主義其實並無法反映當時台灣真正的公害問題。在社會工業化、城市不斷發展中，較缺乏社會層面的分析，無法觸及隱藏的社會真實和階級衝突，或對既存社會進行批判和質疑。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的核心，是特定且少數的人在資本上進行壟斷、集中和剝削，若以人類全體的欲望應當受到節制簡化之，則是掩蓋強國在經濟、文化、政治的侵略，也深埋第三世界所受的壓迫。生態主義雖然傳達對自然環境保護的教育和知識相當重要，卻也常陷入發展與汙染之間的零和遊戲，並且在論述上失去對主體的理解、描述及歷史的宏觀角度。

綠色革命源自於西德綠黨提出人與自然共存的概念，在消費、發展等各方面都以環保、回收的方式進行。他們質疑工業主義和消費文化，並發展出超越左右派的政治觀，綠黨所相信的就是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關係和永續經營，要解決生態危機就必須建立新價值觀和個人精神生活，進而培養出一個全球性的生態意識和新社會¹⁷⁷。在台灣，以關懷土地與在地文化結合的綠色革命，雖然與德國歷史思想和政治的背景不同，但仍持有對依賴發展經濟的警覺和距離，以及對國內族群問題的敏銳度(例如：蘭嶼反核)。然而，在冷戰、國家安全與民族分裂的歷史結構下綠色運動、綠色正義，是以台灣本島及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運動，以進入體制改革、強化全民生態教育，發展出的不是超越政黨的民主運動，而是分斷下的民粹主體、運動以及結合台獨意識的本土論述。

1987年後環境運動大量出現以綠色為主的論述，林俊義、高清波和粘錫麟

¹⁷⁷ 可稱為「生物地域主義」及「深層生態主義」。

等人合作成立「綠色和平工作室」，全面推動汙染改善工作、環境影響評估工作與政策的民主化，欲聯繫民間環保團體形成一個超越地域性和相互支持的環保組織，從「我愛鹿港、不要杜邦」到「我愛台灣、不要杜邦」¹⁷⁸。中產階級興起的「綠色生活哲學」，以不同純度與深度的環境主義形成前所未有的綠色漸層台灣島，從都市到鄉村，從意見領袖到平凡住民，「只有一個台灣」成為理情共同的呼聲。

綠色革命的發展與環境論述的轉折象徵台灣本土論述的出現，在台灣意識飄漲的九〇年代，重新建構出一套歷史論，將黨國威權與其特殊的中國身分綁在一起，反黨國就走上反中國之路，而民進黨則與其特殊的台灣身分綁在一起，反對民進黨就成了反台灣¹⁷⁹，但對於冷戰下的依附經濟、日治殖民的殘暴、鎮壓和隱藏在族群背後的階級問題，以及文化上的去殖民化始終沒有被面對。

1.4 第二次認同歧路

八〇年代後期，台灣意識成為主流並且形塑出一套歷史哲學思想，林俊義和馬以工論述的轉變，反映八〇年代以中國及中國歷史文化為針對性的台灣意識與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中反西化主張台灣文學裡鄉土的、中國的、反帝的民眾性有根本的不同。包括去中國化，視國府為外來殖民政權，但卻對於台灣與美日的依賴發展關係與戰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意識毫無批判能力，在環境運動及論述的轉變中可窺見民族分裂的軌跡。

1971 年保釣運動以來反資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台大校園民主主義運動對於中國近代史、國共內戰、戰後兩極對立的冷戰構造與中國道路等等提出嚴肅的反省與討論，至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彭歌、余光中等人指控鄉土文學有政治目的，只「反帝」卻不「反共」，搞「階級對立」、「共產黨的階級理論」等赤化成份，文壇上風聲鶴唳在疑懼中禁聲。以台灣的歷史和社會角度分析戰後台灣經濟結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第三世界冷戰體制的內涵就此中控。

¹⁷⁸ 林俊義編，1989d，《綠色種籽在台灣——一九八八綠色和平報告》，頁：26~27。

¹⁷⁹ 鄭鴻生，2008，〈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台社二十週年：超克當前知識困境》，頁：130。

同時，留美派學者則謂：「談鄉土莫忘大陸和城市；談民族莫忘中共狡詐和民主建設；談自立自強莫搞義和團。」力言台灣工農收入在增加，外資對台灣沒有控制力，對美日依賴必要論與西化有理論。八〇年代在反民族、西化主義、無歷史、無民眾的現代主義下依附冷戰/國家安全/民族分裂的結構下展開。

從日治殖民時期至國民政府退守來台的這段歷史，台灣在分離主義與反中國意識下滋養出台獨運動和思想，是將民族認同建立在地緣、血緣和政治上，所謂「中國結」與「台灣結」、「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也就是「統一」和「獨立」二元爭論的開始。

1950~1954年國民黨威權下的白色恐怖及美國全面支配下50年代以《自由中國》運動為起點的，由撤退台灣的大陸右派民主人士和台灣資產階級聯手發動的反蔣民主鬥爭，先天就帶有「反共、反蔣、親美」的侷限性。這個右傾的台灣戰後民主主義發展到了八〇年代之所以和同樣反蔣、反共(連帶反中國)、親美的台灣民族分裂主義合流，毋寧是自然的歸趨(曾慶瑞、趙遐秋，2003：10)。

當時有島內的「台獨」運動與島外的「台獨」運動都強調「美中關係的正常化，不能犧牲台灣人民的利益，有關台灣未來的前途，必須由島上的全體住民自決。」但兩者在「體制內改革」和「改革體制」之間時有衝突，「改革體制」路線直接承襲海外「台獨」運動，側重「台灣主體性」，主張推翻國民黨現行體制，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體制內改革」則主張突出「民主化」在現行國民黨統治下的可行性，主張打著民主化大旗進入體制，改變體制，使之逐步台灣化，也還是主張與中國分離，實質上仍是一丘之貉¹⁸⁰。

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則斷絕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台灣在國際上日益孤立，投資意願低落影響人心安定、波及政治局勢及社會動盪。在政治上，蔣經國的「革新保台」方針也面臨國內日益強大的人民民主運動和分離主義反對派的挑戰，及「法統」的危機、繼承危機、開放黨禁、報禁以及解除「戒嚴法」等政治難題。還有大陸「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政治挑戰，而

¹⁸⁰ 曾慶瑞、趙遐秋，2003，《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台北：人間，頁：33。

不得不做出若干開明的、進步的改革措施。同年 12 月 9 日美麗島雜誌高雄服務處的工作人員向外宣傳黨外人士將舉行世紀人權紀念的演講大會，引起警民衝突與大批軍警鎮暴行動，次日國民黨利用傳播媒體全面歪曲和詆毀美麗島事件，當中核心的黨外菁英也分別遭到拘捕起訴，世稱「美麗島事件」。然而，美麗島事件對八〇年代以後台灣政治、文化方面影響深遠，程度不同的台灣主義和台灣人主義在美麗島事件後有了長足的發展，也成為今日島內台灣「自決論」到「獨立論」的總根源，第二次使民族認同再次陷入歧路¹⁸¹。

分離主義的活動不久便發展為「台獨」政黨的建黨組黨活動，而民進黨也在這潮流下產生。

1987 年黨外反對力量加速組黨步伐，國民黨也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政治改革議題，但在社會力蜂起的八〇年代，這股黨外力量在台灣反帝國殖民的政治經濟議題上：包括農業萎縮、環境汙染、工人權益、現代化下的城鄉差距等，卻是缺席的。民進黨主張體制內改革，教育民眾成為壓力團體，以中產階級為首的民權運動雖以台灣人為名，但並非為農工運動發聲，也未能對現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進行分析。

1989 年蕭新煌、吳介民、郭正亮等人主持解讀台灣的反對運動座談會，會中以張俊宏先生的《到執政之路》一書為主題，以民進黨的組織運作和策略為主軸。他們主要的共識都認為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並且民進黨的成立主要是進行政治鬥爭。張俊宏提出從地方包圍中央，因為是以政治權力的取得為主，所以民進黨並不能也不適合成為一個階級政黨。論者認為如果讓所有民營資本家都認為和民進黨對立起來，即使擁抱農民或工人，民進黨仍會在實踐上面臨：因為國會沒有改選，無法透過國家立法來保障社會運動的成果，所以現在看到的社運都是零星而且分散的，其間根本就沒有累積效果。此外，這些事件涉及的是個別議題，

¹⁸¹，李翠瑩，1988a，〈異花同根〉，《人間》第 37 期，頁：99~100、李翠瑩，1988b，〈第二次認同歧路〉，《人間》第 37 期，頁：105~108。

針對特殊的一個社區¹⁸²，一旦議題解決後，整個運動可能就會結束¹⁸³。

《到執政之路》的目標是取得政治社會的擴張而非市民社會的擴張；不理會社會內的人民矛盾問題，也不是服務於某一階級，「長遠來看，運動的目標是獨立建國，也就是該書所謂社運政治化與政運社會化，組織型態就是用一個非派系的列寧式的組織型態。」(劉若韶，1989：13)

民進黨的建黨原則基本上以爭取政權為主，這已透露出其台灣模式及建黨的意涵，只在部份文化上認同與中國的關係，卻在歷史、政權和社會上劃分開來。

七〇年代反資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到八〇年代幾乎是微弱之聲，八〇年代的現代化論述和分殊化的主體動力也在七〇年代就已出現，同樣認為台灣的現代化路徑是「除舊革新」，取而代之的將親美反中根植為台灣的本土化論述，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意識形態糾葛下的政黨、組織和知識分子，陷入族群鬥爭與奪取政權，而並非服務於社會人民。

不論是民進黨與在台自由主義者的理論架構都試圖斬斷台灣歷史思想與中國的連續性，同時更在親美反共、現代化意識與資本主義發展路徑下對現代社會反動性之撤退，至九〇年代被吸納進入國族主義的召喚，在國家整編之下共構出國族的、民粹的虛空主體論述，市民社會的公共性和地方自治便難以成長茁壯，這也是九〇年代以降社會力量消沉的原因。

(二)、小心國家

隨著解嚴和政治逐漸自由化，各種社會力量相湧而出並渴望建立一個較民主開放的社會，學生運動和環境運動等都代表著民間社會在思想、生活各方面解放的力量，校園民主化、批判父權體制、爭取言論自由以及積極提高學生政治意識與社會參與，市民社會的雛型開始發展。

這股力量雖然有各階層及族群的參與，但是由於統治者的鎮壓、國際冷戰作祟、以及黨國引導下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台灣人的集體意識一直相當破碎貧

¹⁸² 原文是 community.

¹⁸³ 〈解讀台灣的反對運動〉座談會，主席：蕭新煌，參與：吳介民、李建昌、郭正亮，整理：劉若韶，1989，《中國論壇》第 335 期 28 卷 11 期，頁：6~19。

瘠，也不容易形成較有體系的公共價值論述。這種情況下反對者往往只能仰仗個人的道德資源和道德感受以掃除威權體制為名，但所謂的反對僅剩「反對國民黨」的意思，而反對的理據也萎縮到「台灣意識」的底線本能¹⁸⁴。

八〇年代以後的台灣開始快速「民主化」，在去威權化的過程中，黨外勢力與民進黨創造出一定的結構條件有利於各種社會運動的興起，社會的公共部門開始走向政治化。解嚴之後，被釋放的民間社會力，在政治領域爭取制度的變革下開始對原有社區發展工作所規範的社區角色產生質疑，包括爭取社區生存環境權益的抗爭運動、與居民共同生活的「蹲點」社區工作以及由社區居民直接參與環境改造與規劃工作。然而，國民黨面臨黨國機器鬆動與基層崩解的政權危機之時，開始提供社區導向的基層服務，社區工作在黨外勢力、反對陣營發展的基層方針下成為黨派競爭的場域。

九〇年代，面對國家與社會新的關係重組，由於政治脈絡的特殊性，新國家建構過程所需的意識型態重拾了「社區」的概念，置換不同的內容以回應草根；在新的歷史時勢中，主角是被重新建構、界定的國家與社區，戰場也轉移到文化的領域。(黃麗玲，1995：8~13)

2.1 新國家「造人」¹⁸⁵運動

八〇年代社會運動的出擊號召出不同層級的合作與多元思潮，也有知識分子和人民之間的有機連結。1987 年解嚴後，釋放出更多體制內學者的參與，出現許多具有「民間力量」的新身份：自力救濟、環境保護者、消費者、黨外人士和學生運動等等，作為對國家霸權、官僚體系腐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動。尤其是環境運動和勞工運動最具殺傷力，1988 年林園事件因為創下高額的補償金，引發資本家對政府的壓力，1990 年郝柏村上台後，政府開始有系統地壓制使環境

¹⁸⁴ 錢永祥，2001，〈青春歌聲裡的低調〉，《青春之歌》，頁：311~315。

¹⁸⁵ 「造人」源自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造人的永續工程－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中強調社區是個生命共同體，因此重點不只啟動環境、社區和文化的改善，而是以人為主的工程。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本質就是在「造人」(陳其南，1995)。

抗爭事件在統計數字上明顯下降¹⁸⁶，同時，政府為應對社會上普遍的反抗現象而實行有限度的開放，如集會遊行法、1992 年的公害糾紛裁決委會、公害糾紛處理法、1994 年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等，有限的開放實則是國家機器控制的表徵，是政府看似軟性回應公害污染的環境政策。

當社會上延續各種社會運動和民間力量試圖穿透威權體制，培養市民社會的土壤時，一個全新的黨國機器打造過程已經悄悄開始。

國民黨在八〇年代民間力量崛起後面臨統治危機，在政治轉型中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改革派與台灣本土政治勢力及資產階級結盟，欲將舊勢力的國族建構掃出政治核心，從此台灣邁向新國家且展開新的國族認同。此後李登輝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台灣認同建立起「生命共同體」¹⁸⁷，結合台灣政權獨立論述、強化台灣意識認同感及在教育政策上推行教材本土化¹⁸⁸。

1994 年 10 月 3 日行政院文建會正式提出「以文化建設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中說明「以文化藝術形式做為切入點，以社區為對象，啟動社區意識的建立，整合相關的社區建設和社區活動計畫，在鄉鎮地區更以振興地方社區之文化產業和產業文化作為目標，在市鎮地區則以社區環境空間的美化和生活形態的改善作為目標，期望透過這一類計畫的推動，激起居民自主意願，主動推行『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與做法。」(文建會，1995：60~61)。

文建會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生命共同體」的概念落實對於社區意識及社區倫理的重建工作¹⁸⁹。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又加入「造街運動」及「地方文化產業」的論述，並重新界定社區、土地和人民的概念和關聯性。他以為「文建會所提的『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全面改造文化面貌、環境景觀和生活品質的長期

¹⁸⁶ 詳情請參閱圖三的折線圖，引自《綠色民主》，2006，頁：141、367。

¹⁸⁷ 1993 年李登輝總統重申「生命共同體」並結合其他概展示重建國家的積極企圖。他說：「面對一個人人相當肯定自我的社會，要怎麼辦呢？我認為就是要建立『生命共同體』的整體觀念，透過溝通、協調的方式，凝聚這個共同體的共識。」、「我們要努力建立一個全體認同的社會，建立一個『生命共同體』的共識，也就是為現在以及未來的中國人開創一個嶄新的歷史開端。」(黃麗玲，1995)。

¹⁸⁸ 黃麗玲，1995，頁：18。

¹⁸⁹ 之後文建會調整工作目標包括「加強縣市文化活動與設施」、「加強鄉鎮及社區文化發展」及「文化資產保存與發展」。(黃麗玲，1995)。

工程…。」此外，「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並不只是營造實質環境「最重要還是在於建立社區共同體成員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意識，和提昇社區居民在生活情境的美學層次。…所以『社區總體營造』已經是在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換句話說，『社區總體營造』就是在『造人』…。」¹⁹⁰。

文建會嘗試透過落實對社區意識及社區倫理的重建工作，培養社區的共同意識為要形成一具體有內聚力的生命共同體。因此，主張雖然社區營造工作宣稱由下而上建立台灣基層社區的共同意識，但由於台灣社會過去威權統治下長期經歷政治的壓制，所以台灣人民很少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市民社會力量的成熟需要由文建會發動相關的學習活動，以致民眾有一天能自發地「由下而上」的參與¹⁹¹。市民社會和公共論述是民主進步的要素，在於透過人民自決和自主的過程中建立。然而，以國家為主導產生的公民想像，讓社區成為國家在地方的基地，不論是在勞動力、意識形態和社區動員等都成為國家社會控制的服務來源。

國家力量宣稱社區營造是解決人民缺乏公民意識、政治實踐，產業困境、農村衰退與台灣社會在文化教育、生活品質、環境汙染過度開放等問題的答案，而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參與者都認為社區總體營造為社會運動在社區尺度找到新空間，社會改造的基礎和社會運動的能量從街頭抗爭走向深耕文化的寧靜革命，期許社區營造作為台灣基層發展與培力改革力量。

2.2 地方文史工作湧現

1987 年政治解嚴之後，台灣社會逐漸朝向本土化、草根化，地方上的社會運動蜂起象徵人民面對腐化的黨國機器、惡劣的社區環境、不堪的選舉與政黨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經驗到的種種剝削與支配，開始表達一種人民參與和改革的聲音，人民開始走上街頭、組織工會、結社、組黨並且積極參與地方下鄉運動與文史工作的實踐。然而，欣欣向榮的地方文史工作景觀是由文建會與地方政府的政策鼓勵與資源挹注，推動全國文藝季與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強化了地方文史工作

¹⁹⁰ 羅中峰，2004，《共同體的追尋－解析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理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¹⁹¹ 林澄枝，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頁：26。

的蓬勃發展¹⁹²，同時也轉變文史工作的內涵。

九〇年代的社區運動風潮，由於地方文史寫作強調的歷史建構、培植民間力量而產生社會動員力量，隨著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推展，地方文史工作逐漸被定位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準備工作及社區紮根的動力¹⁹³，文史工作者與社造工作者合流，社區研究工作轉化為以社區營造為目標¹⁹⁴。

羅中鋒認為九〇年代開始各地蓬勃興盛的地方文史運動是一集體社會現象，反映當時人們集體的心理需求和歷史意識的崛起，參與者試圖鑽進世界以尋求身份認同，渴望釐清本土化的特殊性、建立嶄新的文化主體。而書寫社區歷史的社會功能為促進居民之自我了解、激發社區情感、凝聚社區意識、樹立地方自信與榮譽感、產生社區認同與義務感，最終促成歷史自覺、文化自尊和社區自信的群體。也就是說，地方文史書寫是一項從草根重建文化自覺和社區認同的社會運動，一方面透過共同成長經驗增進相互認同和對社區的義務感，另一方面則培養民眾的歷史意識、對本土文化的認識，從而成為反制外部控制社會變遷方向的抗衡力量。

文史工作建立起一種新的歷史書寫機制，強調在地史觀而企圖擺脫國族歷史的觀點和支配，拒絕社區歷史落入官修史書脫落生活世界的特質，並且鼓勵書寫者寫自己的歷史，把歷史書寫與被書寫的主體推到草根層次，讓社區居民有機會透過共同參與的過程來寫出共同的歷史。但是由國家主導的文史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是脫胎於臺灣的本土化運動，是對於過去的記憶和懷舊，一種鄉愁的慰藉¹⁹⁵；是在政治情勢的轉變下島內各族群長久的共同生活經驗的累積，以及面對外來干

¹⁹² 首先，文建會於1994年將全國文藝季活動交由各地方文化中心或教育局承辦，強調活動內容應呈現出地方文化特色。從而促成了地方文史工作室的成立，以接辦史料蒐集、尋找老照片、民俗采風、產業調查等工作。此外，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後，社區文史資源調查工作逐漸成為專業團體進入社區前的基礎工作。“文史工作者在社區營造運動之中，變成一種運動之前的需要”，亦激化了部分文史工作室響應該政策的理念而成立。

¹⁹³ 陳東松，2001，〈文史工作者與政府部門互動〉，臺灣新聞報：<http://www.tsen.com.tw>

¹⁹⁴ 它意謂著社區文史工作的目標已從「文史紀錄」轉變為「文化重建」；其二，表示文史工作者的立足點從「從旁觀研究者」轉換為「參與建構者」；其三，則顯示文史工作者的動機，已從「認知與詮釋」轉型為「實踐與改革」。(羅中鋒，2004)

¹⁹⁵ 陳其南，〈文史工作與台灣本土化〉，《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會議報告暨會議實錄》，台灣省政府文化處展顏文化事業工房版，1999，頁：11~15。

預與威逼的共同處境與危機，所產生的命運共同體的感情。因此逐漸形塑了臺灣人意識與臺灣主體意識，視為認識鄉土、瞭解地方需求的因素，強調臺灣人意識與臺灣主體意識的臺灣本土化運動是催生文史工作的原因。

台灣長期處於威權體制下，自八〇年代政治運動及新興社會運動之後的社區自主運動所進行的地方記憶書寫或創造歷史的行動，是對抗穿透台灣社會的「去歷史化」、「去社區化」及威權體制所進行的嘗試¹⁹⁶。但是九〇年代的在地社區運動，主張以社會改造的基礎在社區，透過對社區民眾的凝聚與集體行動發揮草根力量，從營造一個新的「人」（公民）開始，進而營造「社區」（社區共同體）、新的「社會」（公民社會），最後期許能建設新的「國家」（公民國家），社區共同體成為國家生命共同體的基礎。社區總體營造和此類文化政策的推動，簡而言之乃是由國家主導企圖改造社會目標¹⁹⁷。

1987 年台灣政治解嚴之後便陸續進行新國家的打造。國民黨內部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改革派在政治上逐漸台灣化，經濟上則結合資本家，一方面取得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還化解反對運動外來政權的批評，而社區營造的政策正是政治與權力的重新分配與重新界定新的國族認同。1993 年後李登輝政權開始對外宣稱台灣為一個實質獨立的政治實體，並以國家機器致力於社區文化建設、強化台灣意識，有別以往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文化道統轉移至台灣本土認同上，強調台灣經驗在四十年來發展出一種極具地方性的特殊成果；對內則透過本土化教育、社區文化建設「生命共同體」和台灣意識的認同感區別以往國民黨的「中國認同」，以強化國家意識。此種「新文化」提供一種新的素材和刺激足以供給中華文化一個反省與重建的機會。

在新的論述建構過程中，國家選擇了「社區」這個曖昧的語意，一方面與政治言論市場上的許多概念相連結，滿足了國家建立新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需求；

¹⁹⁶ 黃麗玲，1999，頁：16。

¹⁹⁷ 自 1965 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開始便將社區發展列為政策的七大措施之一，並由政府單位主管推動此工作進行各項社區建設。在台灣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試圖以社區為最小單位作為廉價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基地，在經濟、生活和文化思想上按照國家的意志動員及控制。（林澄枝，1999）

另一方面，新的社區文化建設方向的宣示也以一種側面的、委婉的姿態回應了草根社區要求自主的主張（黃麗玲，1999：45）。國家以提供資源的方式帶領地方進行文化建設與社會倫理的重建，強調落實社區工作結合地方工作者深耕地方文化、歷史整理工作並進行鄉土與社區民情的調查研究與現代公民意識和社群共同體的凝聚作用，運用了在文化領域的優勢，以文化的議題進行動員，試圖以文化的認同整合政治的認同。

由國家所推動的社區營造雖然看似將社區、土地和人民緊密地扣連在一起，建構以家鄉、社群和社區為一想像的共同體，號召人民集體情感，但是政權面貌由威權教化轉變為汲汲營營爭取「人民」的選票與認同時，菁英與「群眾」之間的表象差異、甚至一些實質界線愈來愈模糊，「人民」彷彿鐵板一塊，收編、掩蓋在「生命共同體」當中，尤其是藏在「人民」之中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俗擱有力」不再是底層勞動者的專利。另一方面，調動「民間活力」的口號產生大量圖利財團的私有化措施，也將更多民間社團力量整合進國家施政的各種公辦民營、委外經營、補助案等等¹⁹⁸。從而模糊了「國家機器」與「人民」的分際，造成地方上的對立，也無法形成有效的集體意識。

九〇年代以後，李登輝政權所依恃的台灣本土化運動實則反映國家權力的擴張和戰後資本主義在全球化下的全面支配，在思想脈絡來看更是隱藏著民族分裂與認同政治的歷史論述。

2.3 去中國的本土化運動

七〇年代末黨外運動重新解讀台灣自抗日時期以來不同於日本也不同於中國的殖民歷史，試圖將三百年來台灣因政治鬭爭而產生的本土意識確立其深厚與客觀的基礎¹⁹⁹。八〇年代初期的思想以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爭論及統獨爭議展開如何解讀台灣近代史的分歧論述。1983 到 1984 年台灣黨外陣營內部出現一場空

¹⁹⁸ 陳信行，2004，〈我的野百合——一個 1990 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4 期，頁：253~276。

¹⁹⁹ 參閱：施敏輝編，1988，《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總決算》，台北：前衛。游勝冠，1996，《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

前的論戰，以揭露「中國意識」的虛偽性和虛構性及提昇台灣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的本土精神，強調「台灣意識」的理論基礎在將近四百年的歷史已經發展出獨特性格的文化傳統；在地理、社會都與中國斷絕之下自然而然發展出「台灣民族」的意識；在政治壓迫與經濟發展的經驗中累積形成共同的意識，絕不是傳統、虛無的中國意識可以概括的，此論戰被視為台灣黨外運動思想理論的里程碑。

解嚴後，「本土化」的呼聲甚囂塵上，從民間和各地方政治的文教活動，到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本土化」成為最具號召力的響亮口號，至李登輝政權上任達到高潮，國民黨從教育、政治、文化浩浩蕩蕩加入本土化的隊伍。

台灣的本土化論述自八〇年代後期，在全面蜂起的反威權聲浪和學運反父權體制中逐漸被建構起來。解嚴後，國民黨威權受到社會各方面嚴厲的反撲和挑戰，除了黨外質疑國府的政治權威外，學生們也開始反省僵化的教育體制和國府意識形態，在壓抑和束縛中尋求個人解放和自由出路。

學生運動及改良主義者對教育的反省延伸到對台灣歷史、社會、思想上，雖然對官僚意識形態及威權進行反抗並試圖建立台灣本土的歷史思想觀，但是在反共親美架構與長期對官方意識教育的反動下，本土化內涵去中國、將中國他者化的內容，並且批評鄉土文學和民族統一的思想是對台灣本土知識的貧瘠²⁰⁰；中國文化與台灣的關聯性是空想的漢族主義；是將十億人的民族主義壓在一千八百萬人的頭上²⁰¹；是民主政治與現代化的需要潛藏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爭論當中²⁰²，將中共、國民黨、中國和政治權力、支配者、封建國家、傳統落後連結起來(相對於台灣人等同被殖民者、受壓迫階級以及民主進步國家等)，否認一切中國近代史中共同的民族記憶、情感和價值。

透過歷史性分析，陳昭瑛將台灣的「本土化」²⁰³運動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

²⁰⁰ 李明駿，1987，〈七〇年代的文學光影—對鄉土文學的省察〉，《南方》第 14 期，頁：71~75。

²⁰¹ 林世民，1983，〈龍沒有穿衣服〉，《前進》週刊 12 期，頁：14~15。

²⁰² 夏台生，1987，〈當政治神話逐漸崩解之後〉，《南方》第 13 期，頁：30。

²⁰³ 陳昭瑛在〈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一文中引述殷海光先生譯述的話闡明兩種本土運動的形態，一種是「向後看的」、「延續性的主位文化崇拜…排斥客位文化傾向」、「宗教形式的」，可形容台獨運動寫照；另一種則是「向前看的」、「吸收式的」本土化運動。

「反日 1895—」、「反西化 1949—」與「反中國 1983—」時期。

1927 年以前，台灣抗日知識分子的民族思想中「中國/臺灣」的觀念重疊，此後則有了分離的跡象。一方面臺灣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就發生在這一年，而國民黨也是在這一年於上海展開清共，國共合作崩壞的打擊把急進的「祖國派」青年推向「臺灣革命」論的方向。在中國無力協助臺灣解放的情況下，臺灣與中國意識產生分離²⁰⁴，但是當時主張臺灣自決與臺灣獨立的「獨立」訴求一直是獨立於日本之外，在抗日時期產生的「台灣人意識」在當時並未與「中國人意識」發生衝突，「獨立」只是階段性的策略，抗日並求與中國復合才是終極的目的²⁰⁵。論者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一文說明臺灣人為尋求與祖國結合而付出的慘痛代價與內心煎熬，並且當時在文化、文學和思想上的「本土」意味著傳統中國文化在臺灣的遺產，在左翼知識分子的概念裡更隱含民族性與階級性，這便是鄉土文學思想的概念肌理。

第二階段反西化時期則延續與祖國連結的民族性和普羅大眾的階級性精神來對抗逐漸西化與殖民化的思想，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即是一次反對殖民主義、買辦文化強而有力的出擊，是對於冷戰體制下依附美日的政治經濟條件與殖民母國文化思想入侵的反動，因此在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都極為明顯。陳昭瑛認為反西化的「本土」運動在日後擴展為對現代化的反省，在台灣工業化對環境破壞達到一個臨界點的同時，環保文學(馬以工和韓韓)對現代性與西化的迷思反省對台灣「本土」運動及對自己土地的感情向前跟進了一步。(陳昭瑛，1995：23)

接著，陳文說明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在 1983 年後進入「反中國」階段，

「陳文」中並未清楚界定「本土化」運動的概念，但大至包含現存統派、獨派、執政黨所使用「本土化」辭彙。但就左翼的鄉土文學而言，所謂「台灣本土化」並未如陳文所述從「反日」、「反西化」至「反中國」般地連續。實際上八〇年末後的「台灣本土化運動」與七〇、八〇年代的鄉土文化在思想意識、社會哲學概念上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本土化」一辭並未能恰當說明台灣歷史的思想運動，而「陳文」的考察其實正好說明了這個斷裂。

²⁰⁴ 「臺灣/中國」的分離模式要透過中國無力協助台灣解放的前提來思考，當時的台灣革命者並未如今日的台獨論者將「台獨」的價值與目的絕對化，成為台灣人至高無上的命令。(陳昭瑛，1995，頁：10)

²⁰⁵ 陳昭瑛，1995，〈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9 期，頁：6~40。

也就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對立、分裂的階段。按照陳文的分類將台灣本土化運動分為「反日」、「反西化」到「反中國」三階段，會發現「反日」與「反西化」有歷史和思想的連續，但與八〇年代以後的「反中國」及九〇年代台灣人主體意識在社會歷史思想結構上實則有極大的差異。

論者以為台灣意識尋著原先自我意識形成的道路發展出一股異己的力量，反過來對抗自己，台獨意識是中國意識的異化。但從歷史中看來，「台灣意識」的形成道路正是在抵抗帝國主義壓迫並在殖民體制加害下發展反帝的中國民族意識，這樣的「本土化」運動無法「創造」或「生產」以中國、中國民族、文化對立的台獨「本土論」而成為異己的客體異化。因此，若說台獨意識是中國意識「異化」，恐怕在哲學上不能成立，在歷史上也不是事實²⁰⁶。

然而，與前兩個時期在本質上完全對立，即反中國、反民族解放、親帝國主義的台獨派「本土化」如何與前兩期相提並論？「台獨」思想以扭曲歷史的方式為自己尋找立論依據，包含切斷與祖國的臍帶下的台灣中心和台灣人主體論述，以中國(包括現存之政權與文化)為抗爭對象，視中國為仇敵，與中國徹底決裂的台獨理論，是戰前台灣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此外，台灣意識還自動與民主畫上等號，因而否定《自由中國》時代自由主義者的貢獻，也主張民主必須排除中國意識，從而肯定美日在台灣進行的資本主義化建設與政治經濟共同體。依賴美日取向的台獨非但不能視為台灣本土化運動，還是反本土化、充滿被殖民心態的²⁰⁷。

2.4 進步、連續，還是倒退、反動

七〇年代以保釣運動為契機，發展出台灣左翼思想運動以及現代主義詩的批判和鄉土文學論戰，是直接向一九五〇年代以降美國新殖民主義的冷戰意識形態和依附於冷戰體系下的國府意識形態高舉反旗，其思想脈絡和台獨論在歷史、性質上是全然對反的。

1949 年末至 1952 年國民黨反動派以鮮血和暴力確立一個納入遠東冷戰戰略

²⁰⁶ 陳映真，1995 年 4 月，〈台獨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對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之回應〉，《海峽評論》第 53 期。

²⁰⁷ 陳昭瑛，1995，頁：24~26。

的體系，以「反共國家安全」為藉口建立高度獨裁、反共的軍事國家，在美國經濟、軍事、外交和政治的強力支持下使國府流亡集團取得國際外交和島內統治的合法性。二〇年代以來以血淚建設起來台灣的民族解放的社會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理論被徹底地破壞和消滅。接踵而來的是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包括美國製的自由主義、現代化論、實證主義和行為科學論，以及形形色色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在白色恐怖肆虐中成為台灣的主流價值²⁰⁸。

戰後台灣由國民黨持續發動全面徹底的反共恐怖肅清，以雷震為領導，以《自由中國》月刊為中心的資產階級性反蔣民主運動展開，表現出反蔣、親美、反共的特質，在冷戰雙重構造中發展成「為反共而倡民主；民主必須親美」的右傾路線，對戰後台灣民主主義影響深遠。此一民主運動在六〇年代初遭到鎮壓，七〇年代後黨外民主運動再起，繼承了戰後民主運動「反共、親美、反蔣」的右傾傳承，到八〇年代逐漸與同為反共(反華)、親美、反蔣(國府)的台獨運動合流。

八〇年代以後，台獨論述將鄉土思想中的中國傾向和對於具體台灣「土地/人民」的認同和關懷對立起來，強調「脫中國」和「去中國」的台灣「獨自性」；以兩岸分斷和隔絕為合理現實，與中國分裂對立永續化，即五〇年以降支配台灣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生活的「冷戰/內戰構造」的合理化。是放棄主張現實主義，也不談美日在經濟、外交、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帝國主義性質，以依附美日帝國偏安為基礎，發展反共不反帝，在現實上執行民族分離的反中國論。台灣本土論力言台灣主權早已獨立，不存在美日新殖民主義支配，沒有階級差異和壓迫的「命運共同體」論和「生命共同體」論浮現，他們的台灣「人民」是沒有階級差等、掩蓋社會壓迫、反共(反華)、民粹的國族意識。

如果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是台灣思想史上的一個飛躍；是對反動的冷戰和內戰意識形態的一次顛覆；是台灣思想上的民族與階級解放運動，那麼八〇年代以來的台獨反共、親美、親日、民族分裂、脫中國等思潮無疑是七〇年代鄉土進步

²⁰⁸ 石家駒，1998，〈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從王拓「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批判展開〉，《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255~279。

思潮的一個倒退、反動、右傾和保守化²⁰⁹。

2.5 民粹與後威權時期

自後美麗島時期的台灣社會已逐漸走向以省籍身份為軸線，透過選舉達成民主化的政治，1993 年李登輝已掌握黨政軍於一身並與反對黨相互奧援，開啟民粹威權強人時期，李登輝積極將國民黨本土化，不只是政權要本土化，文化更要本土化，在多元價值和左翼傳統中挫的台灣，這個本土化的過程藉由對「中國」的妒恨政治，企圖透過單一性的國族認同政治，由上而下對民眾進行教育與動員，並建立自身之主體性。在這個階段，政治強人可以繞過體制直接向人民發話，然後回過頭來挾持、擴政權機器。人民在妒恨政治中被動員、控制，無法期待公民在公共領域進行慎思明辨，雖然有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台灣優先等話語卻是民粹威權確立的過程。

另一方面，民粹強人為要遂行他的政治意志，政權大幅提高對資本的補貼和傾斜，而無法對發展中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做出合理的反應。一九九〇年後，資本外流、關廠、廉價勞動力的跨國引進造成台灣勞動情境惡化，一九九六年起失業率開始顯著攀升、貧富差距拉大，財團資本家成為民粹時期的受益者，一般人民卻日益受到盤剝。

二千年後，台灣的政黨輪替似乎並未脫離民粹政治與國家對資本的籠絡，後威權時期其實是國家責任政治無限退位，放由私人企業集團在無任何公共監督下操縱獲利，並且延續國族或民粹的邏輯藉由省籍或本土的符碼進行排除和隔離，省籍民主化路徑所召喚的主體不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公民，而是給予的、「自然的」國族身份，此種認同政治幾乎妨礙所有領域公共論述實踐的可能²¹⁰。

國家與資本關係的重組、勾結是社會運動快速沉潛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八〇年代末，絕大多數的社會運動部門(勞工、婦女、環保等)都在兩三年內，從普遍權利論述與多元政治的主調撤退，轉而以國族認同與統獨的政治正確問題為首要

²⁰⁹ 同上，頁：265。

²¹⁰ 台灣社會學季刊編委會，2004，〈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3 期，頁：1~27。

關心。歷史地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論述的發展和限制是值得深思的。

五、六〇年代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在白色恐怖時期確實成為反威權反鎮壓的力量，並且也為七〇年代的保釣知識分子提供民主自由改革與抵抗權威的知識和養份，但是經過現代化的洗禮，民族分裂、反傳統和民粹思想扼殺了中國文化，在親美反共的歷史結構下台獨意識與國族主義號召以「中國」為妒恨政治的主體時，自由主義者是難以抗拒的。

然而，與自由主義全然對反，左翼的中國民族主義強調行動、思想和論述都鑲嵌在歷史當中，並且在台灣長期的冷戰結構下發展出反資反帝的思潮，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抵抗帝國資本的語言，說明台灣和中國同樣是帝國主義下受壓迫的第三世界人民。七~八〇年代，透過《夏潮》和《人間》雜誌仍然承襲這左翼的、民族的、歷史的宏觀角度，以第三世界觀的階級分析反帝國新殖民主義；反冷戰下國府扭曲的民族認同，發展克服民族分裂的民主運動，給予九〇年代以後的環境運動、論述及知識分子一個重新反省和認識歷史的機會。

第五章 結論

…但我們依然不能改變「站在被壓迫、被奴役、被損害者這一邊」的基本價值立場，以及對烏托邦理想的嚮往，而且依然是將國內與國際問題聯結在一起，努力保持和國內與國際的「弱勢群體」的精神聯繫，同時對國內的專制、特權與國際的強權、霸權，始終保持警惕，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但我們又清醒地意識到，革命意識形態本身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時刻警戒著自己，要防止陷入將其美化與理想化的陷阱。總結其中所包括的深刻的歷史教訓，給予科學的批判，同時又剝離、搶救出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這或許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錢理群，2005：272

1.1 知識分子的學習之路

透過七〇至八〇年代初期對環境運動的論述和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環保議題和反公害運動，《夏潮》、《人間》雜誌的知識分子和草根民眾彼此之間並非分立，而是有機地連結在一起。包括知識分子的論述和民眾的反公害行動都真實地反映當時代社會各方面的樣貌，表達對土地和人的熱情關懷，以及對受壓迫者的深度同情；在理論和思想方面，也進入解構台灣社會作為第三世界附庸美、日，需要反資反帝和去殖民化的層次。

但同時，我們也看見自七〇年代以來的自由派、黨外人士、右傾知識分子，以尊崇發展主義、唯現代化出路、去歷史、去階級化地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遷，在政治爭奪和族群鬥爭下他們並非服務於農民、勞工和底層階級，並且從《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書就顯示以特殊台籍中產階級為其主體的傾向。這股右傾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框架，不但在日後與台獨民粹主義合流，更是對台灣社會運動菁英化、格式化、去歷史化帶下深遠影響，不僅方便地使用西方理論架構來解套台灣社會的問題，具有中國民族性質的左翼思想中挫和無法正視民族分裂的歷史傷痕，是台灣自主社運和主體性難以建立起來的原因。環保運動和論述至九〇年代以後則未脫離七〇~八〇年代所形成的現代化意識、菁英式的反體制運動、台獨

民粹主義。那麼從《夏潮》和《人間》雜誌豐厚的思想資源，我們能夠怎麼樣來重新面對當代社會運動(包含環境運動)的主體性建立，以及深化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身為社會的一分子究竟要如何超克現有的意識形態框架和歷史桎梏？本文透過七〇~九〇年代的環境論述及其思想的轉變，能夠如何對當代的環境運動及論述發問呢？

藉著《夏潮》和《人間》雜誌豐厚的思想資源，我認為可以提出兩個部份來討論：第一是以中國作為視角、為方法來思考台灣主體的可能性，第二是將民眾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重新放置在第三世界的歷史下來理解。

首先，二千年民進黨上台後，政權雖然轉移但不代表民主在台灣已經完成，台灣政治、社會、思想的現況似乎仍舊承續了冷戰時期的親美格局。為了超克這個去殖民、去帝國、去冷戰三位一體的歷史結構性問題，學界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討論，包括台社二十週年(2008 年)《超克當前知識困境》的研討會論文集等，多人的努力成果。

陳光興在〈「亞洲」作為方法〉²¹¹一文中也指出在西方殖民史中「亞洲」(包括台灣、中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被視為西方帝國殖民史的發明，或是日本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建構，若只能從所謂世界史的框架中來理解亞洲，亞洲論述的正當性和主體性就被消解掉了。因此，「亞洲作為方法」是「承認亞洲像第三世界與民族國家一樣，對其保持批判距離，視其為歷史的產物，確實在歷史過程中產生作用，即便是新的想像也不能憑空杜撰，必須在歷史的真實狀態中來提煉。」(陳光興，2005：150)並且以亞洲為視角、為主體性展開多元批判的可能。

而要台灣要「脫美入亞」，其主體性不能全然主觀空想，更不能脫離台灣總體歷史的地理脈絡考察。雖然 1990 年後，冷戰鬆動，兩岸互動逐漸恢復而進入新的狀態，但是戰後國民黨政治全面性的反共親美策略，教化台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深切疑慮、懼怕與反感，民主反對運動亦無法脫離反共親美的性質，至今制約著民進黨政權。然而，台灣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丟掉歷史基體內的中國根柢，

²¹¹ 陳光興，2005，〈『亞洲』做為方法〉，《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7 期，頁：150。

必須客觀認知到台灣未來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中國大陸而存在²¹²。

在《夏潮》與《人間》雜誌，透過環境論述揭示台灣作為冷戰體制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特殊的歷史架構就成為認識自我、建立主體性的資源，包括：五四運動「外爭強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除媚日官員）」的愛國運動與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反省、日治時期的抗日精神和文學遺產、保釣運動中左翼思想和中國性質的民族主義。可見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架構下，產生的是一種以西方為對反、反資反帝、反殖民的集體記憶，並且至今都不能繞過「中國問題」來重建以亞洲、中國、台灣本地為視角的自我理解和知識思想的架構。

以〈如果對立可以結束－訪徐璐談海峽兩岸〉一文為例，徐璐作為第二代外省人，從小在台灣長大，已經逐漸認同這塊土地，回到中國的土地感覺像是遙遠的圖畫，認為政治扭曲了許多文化、歷史、血緣的關係，但是仍然承認台灣在歷史上與中國的關聯性無法分割，只是如何化解政治體制、生活價值、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是雙方政權努力的方向²¹³。

兩岸分斷下的歷史隔閡遍及台灣土地上的中國人到中國土地上的台灣人。

《人間》的〈望斷鄉關盼征人〉系列就在陳述國共內戰下，被征召去大陸打戰的台灣原住民們，因為在沒有軍籍身份中而為國家棄之不顧，不但與台灣親人隔絕，還受到直接的政治、社會迫害的歷史事實。

解嚴後，國民黨政府陸續對社會進行言論、選舉的開放，1987年10月15日國民黨正式公佈「大陸探親政策」，長久以來的兩岸問題、隔離、鄉愁、壓抑，才終於有機會搬上抬面，將這四十多年來的政治對立、社會文化歷史的隔閡找尋出路。抱著「身為台灣的中國人」的立場而創立的《人間》雜誌，以豐富內容與圖文並茂的報導，也順勢報導了一系列的兩岸對談，談外省人在台灣的生活，與親人隔離數十年的親情與血緣，也報導出在台的第二代外省人面對身份與認同的衝突。這些事件的浮現是台灣統獨爭議、民族分裂與政治正確下的省籍衝突的開

²¹² 同上，頁：201~201。

²¹³ 蘆花，1987，〈如果對立可以結束－訪徐璐談海峽兩岸〉，《人間》第25期，頁：60~69。

端，也是兩岸隔離下的歷史扭曲。

1989 年《人間》發表宣言表明《人間》在「冷戰／國家安全體制／服從美日霸權」的結構下提出挑戰和詰問，其意義在對抗「冷戰／依賴／專制的成長」並且要將自己解放出來，才是重建人格尊嚴、文化尊嚴、知識尊嚴及民族尊嚴的不二法門²¹⁴。至此以《人間》為代表左翼民主主義的理論架構是承襲七〇年代的反帝反資、鄉土文學鑲嵌歷史中的民族性和階級分析、以及八〇年代興起的草根自力救濟運動。民眾運動初期，台灣面臨舊制度需要更新規劃以及社會結構的改變，在威權體制中要求建立民主制度，這大概是普遍對於國家的態度。然而，《人間》雜誌更指出貧窮、汙染、工業化、少數民族的壓迫、文化傳統的沒落與蛻化不僅僅是台灣所面對的問題，而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課題，所以《人間》也報導東南亞(菲、印度)、非洲(依索比亞)國家及中國邊疆問題。這是將社會力量和民族主義的關係深化，從地域性拉出第三國際觀，並指向一種全球的共同性，在資本主義社會運行之外找尋另一條出路。

第二、在台灣的環境意識、人與土地的關係中納入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為思想資源，不只是重新界定台灣主體性而展開多元思想，更重要的是將台灣的知識分子和民眾擺放在普遍第三世界的處境來理解與反省。

本文在環境論述的回顧中發現林俊義的論述及其轉變是典型第三世界下現代知識分子的案例。七〇年代中，林俊義的生態觀仍然抱持著「人與自然合一」的態度，他的論述也大多反映台灣作為開發中國家，其環境問題和解決之道與西方國家並不相同，在《科技文明的反省》中也曾一再提及國內應建立起中國的科學與科學家，批評第三世界政府不分青紅皂白發展經濟、輸入「公害」，還把歐美科技和解決環境的技術全盤搬運進來，台灣儼然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樂園。但是他的文章中不時也提到，在開發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常常是低度和未開放的結果，像是肯尼亞或其他熱帶地區燃燒雜草作為肥料的風俗和「遷徙農業」的習慣

²¹⁴陳映真，1989a，《人間宣言：解放與尊嚴》，《人間》第 40 期。

都破壞水土保持，加速森林資源的消失²¹⁵。八〇年代後，由於威權鬆動以及各地社會運動與黨外運動的蓬勃，林俊義的論述也出現批判國家政策制度，強化生態主義、提高民眾環保意識的文章。宣導生態經濟平衡發展和教育人民培養環保意識的同時，其論述也開始批判國人隨地吐痰、到處小便、把殘餘剩飯倒在地上的落後生活習慣，包括中國傳統在書法、建築上需要大量木材資源，都成為「林文」討伐的對象，認為台灣不但是沒有倫理的社會，還自詡代表天人合一，但其實一直是以「人定勝天」和「愚公移山」的蠻橫態度來對付自然²¹⁶。

林俊義雖然指出第三世界的特殊性與第一世界環保議題所面臨的種種差異²¹⁷，從反對西方科技移植的理念到對政府政策的批判，但是展現的是以西方知識背景來觀看第三世界的公害汙染問題，認為傳統的風俗和習慣是落後、不民主的象徵，他所提出的改革方向仍然是「西方的」、「現代化」的路徑。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第一世界的憧憬和追求，影響日後環境運動和論述的有限性，無法適切地認識自我，就無法針對台灣在地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培養環境意識，也無法深化台灣環境史中的「反西化」、「反帝」性質。

透過對陳映真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趙剛說明一個在「第一世界裡的第三世界」的遭遇。小說的主人翁黑人大兵巴尼和黃種人艾密，兩人的愛情故事體現在西方文化下的第三世界試圖反抗第一世界對審美、美感的經驗與判斷，將一種白色美學政治對第三世界的剝奪、壓迫和扭曲矯正回來。論者認為陳映真要顛覆長期以來被視為西方「文明先進」與東方「野蠻落後」的二元性，指出所謂文明中的野蠻，以及那所謂美麗中的醜陋²¹⁸。但同時，陳映真先生和論者也意識到身處在第三世界人民，由於內在的矛盾、自卑複雜的情緒，以及帝國主義霸權下給予的美學標準長期內化的過程，仰望追求第一世界中現代、文明的審美經驗是反帝國主義的艱難之處。

²¹⁵ 林俊義，1976a，〈開發國家的環境問題〉，《環境科學通訊》第七期，頁：1~5。

²¹⁶ 林俊義，1989c，《自然的紅燈》，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²¹⁷ 包括：對美好環境的眼光判准、風俗習慣的差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什麼是「公害」的定義、理解並不相同。

²¹⁸ 趙剛，2010，頁：126~135。

在另一篇小說〈雲〉的文學分析當中，更表現出第三世界現代化知識分子：在美國推銷的自由、民主、人權時，與相對「落後國家」的反動政權產生矛盾，這矛盾使第三世界現代化知識分子對美國產生憧憬與仰慕之心，在長期被壓抑的政治欲望中激發起一種改革者的想像，他們認為自己代表一種絕對的正義，是他們「代表」或「解放」的民眾之必須品，因此凡這個「現代化文明」所預設的體制：現代文明、美學、建築、生產、分配與消費體制，從來不曾遭到他們的原則性質疑。同樣，知識分子也未曾反思過他們想要成為他者的改良主義運動中的菁英位置，因為從改革開始到結束，他們都將代表民眾²¹⁹，而實際上他們的論述和「理想」常常不能反映人民生活和社會現實，在日後併入去中國化的本土運動和國家打造的民粹想像主體。

這兩篇小說的內容啟發我們重新反省自身所處在的社會和慣用的價值概念，甚至是直接地、尖銳地面質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烏托邦和理想世界，同時開啟一條知識分子自我學習的路程，從仰望西方聖城到復歸民眾，重視在地行動主體的社會實踐過程。

在環境論述的歷史考察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七〇至八〇年代初期，《夏潮》與《人間》雜誌的環境論述和運動中，地方草根和知識分子之間是彼此學習相互理解的互動過程。草根民眾有著最直接來自土地、自然的情感和在地文化與技藝，而知識分子則是適時運用所學揭露事件背後的結構問題。如果要說知識分子和草根之間沒有差距或是彼此沒有衝突矛盾是一種虛無浪漫，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仍有許多需要被批判、檢討的問題，正如保釣運動當中積極的左翼思想為何沒有延續來下，發展成台灣在地的思想資源？以及檢視八〇年代末興起的學生社團服務運動的內涵、現代化知識分子被資本主義和跨國資本馴化的過程，還有如何解構民眾與國家之間矛盾依賴的關係？鄉村社區中的權力結構、地方派系對草根人民的影響等等。但是如何讓知識分子與人民能夠有機的連結，並非去歷史、去

²¹⁹論者對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與民眾關係的分析架構，請特別參照第三章〈從仰望聖城到復歸民眾〉。趙剛，2010，頁：163。

階級、去差異化地尋找空想的「人民」和「主體」，或以道德、正義為名來改造與解放社會，我想這是環境運動需要一個以第三世界視角為脈絡和中國近代史為問題意識的原因，也是身為知識分子的學習路程。

本文從粗淺的社會經驗出發，走訪雲林台西，參與過幾次的抗爭活動，在與當地居民、環保人士、地方人頭的相處和觀察中提問：為何現今的環境運動及環境論述缺乏貼近地方人民、土地的論述？又為何當今生態保育的環境論述無法有效反映草根的在地需要？

相同的疑問，同時也反映在何明修、李丁讚的研究當中，雖然他們過度將民眾和社會力概念化，而區隔知識分子的行動，但也表示在環境運動的考察裡同樣感受到、意識到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極大的隔閡²²⁰。

八〇年代初期的自力救濟運動，知識分子不是扮演菁英姿態來教育人民，但是當時的環境論述所描述的黨政威權、唯發展主義、喪失國民性，難道不也是草根人民生活中的真實感受，而促使草根民眾產生自覺與反抗意識的抗議運動嗎？我認為《夏潮》和《人間》雜誌喊出來的反西化、「反思想公害」以及中國民族主義和人文價值的恢復，其實也是當時民眾的普遍性感受與政治生活的一部份。集結在《夏潮》的知識分子雖然力圖反西化思想，在現代化體系侵蝕下體悟自身民族性恢復的重要性，但這不僅關乎「我們是誰？」、「我們要有什麼樣的未來？」，更是在冷戰以來兩岸分斷體制下的一個克服與超越。因此鄉土文學思想、《夏潮》到《人間》雜誌的中國認同與台灣的關聯性都無法以「空想漢族主義」、「統獨意識」等一元化或二元分立的意識形態可以涵蓋。

此外，《夏潮》、《人間》雜誌的思想脈絡不只是在不平等下揭露黨國資本的惡質，更是說明此「惡」是在冷戰體制、親美反共的國家安全下進行的全面擴張，透過歷史由國府所自居的「道統」形成與對岸的分歧分化和思想斷裂，再經由對

²²⁰ 何明修透過訪問得到民眾認為這些運動不需要那麼多理論，人民就是先鋒，民意就是依歸。從他的研究中指出「知識分子並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態『啟蒙』了草根民眾，他們也不是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知識分子誠然發揮了影響，但是如果沒有草根群眾所賦予的新詮釋，環境保護的觀念不會迅速擴散。」(2006，頁：80-81)

舊有傳統的捨棄、白色恐怖的思想箝制、警備鎮壓，斷絕多元思想的可能。所以，回顧七〇至九〇年代的環境運動及其思想的演變具有重建左翼思想、克服分斷體制及重拾台灣主體性時納入以中國為方法的第三世界觀視角的貢獻。

最後，藉由《夏潮》和《人間》雜誌，我看到的不是知識分子的高高在上，以及理論先行的批評，而是一份出於對社會、土地和人的關愛，那份情感並非個人主義式的，也非理論高調，他小心地面對特殊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並深刻體認到自己是社會和人民的一份子，且渴望與他們站在一起。就《人間》雜誌和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而言，我認為那是出於對台灣冷戰體制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造成的各種傷害、分斷、分離、痛苦、拉扯的同情和理解²²¹，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與民眾都是在冷戰的、殖民歷史的霸權架構，有著對自我尋求思想定位、國民性認同和克服分斷尋求和解的意義，有與自己和解、與民眾和解、與歷史和解的積極作為。

透過七〇~九〇年代的環保運動及論述，提供我們省思的能力和寶貴的思想遺產，《夏潮》與《人間》雜誌的環境論述表達對於國家、土地、人民的愛與關切，將人民、土地、國家和民族連結起來，抗爭運動反映的不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當時代的社會歷史結構。在這樣的方法論下所進行的政治、經濟和思想論述分析，有助於我們跳脫太簡便的思考方式和價值判斷，重新建立對歷史謙卑的態度，在歷史的長流中學習鑑往知來的能力，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青年都要共同努力的。

1.2 結語

1997 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識型態逐漸影響台灣社會，環境抗爭和公害事件仍然沒有停止²²²；然而，國家的權力觸角只有更深入地方，而關乎人權、民主

²²¹ 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大都反映分斷歷史化下市井小民的生活、左翼知識分子對現實矛盾、自省的主體狀態，也可說是傷痕文學的代表，雖然文中也不乏透露身處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面臨被現代資本主義形態馴化的可能，以及與民眾的衝突無奈，但作者不斷在進行自我反省，與冷戰、分斷結構抗爭的同時，仍然對「民眾」具有作為第三世界想像主體、與進步知識分子合作反抗壓迫、反對菁英秩序的期許。請參考陳映真的小說集，或是趙剛的《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一書。

²²² 請參閱圖三的統計數據。

和道德的左手卻自動消解，並在市場開放民營化的自由貿易假象中掘取利益。

「1968~1984 年間中油陸續興建四座輕油裂解廠，在 1988 年因為中國與韓國崛起也興建多個輕油裂解廠威脅到台灣外銷競爭力，加上高雄林園工業區汙染事件引起的反抗運動，人民開始思考台灣是否需要高汙染、低附加價值的石化工業。當時經濟部長陳履安仍全力支持興建五輕、六輕，然而，面對社會運動的挑戰政府便將問題丟給廠商自行與民間協調。」²²³雖然當時因為國家體制受到衝撞，並且影響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迫使五輕、六輕興建計畫延宕，但郝柏村仍強勢籌備七輕、八輕的設廠計畫，有利於石化工業的發展。

國家政府一方面強勢介入台灣整體的經濟走向，並同時應對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卻自我解除民族國家的社會責任、權利及制度，傾向民間石化工業台塑企業在環評未通過之先就同意執行六輕的興建；為了迎向資本利益退居於向資本主義更全面流通與開放。然而，迎向資本卻不符合全球化下的「自由競爭」理念，國營事業的釋出開放民營化，並非政府真的願意透過政商聯盟一起為台灣經濟尋找出路，反而成為兩者間惡性的競爭，一方面顧慮台塑企業獨占與擴張將無法控制，其次則因為兩岸分斷的緊張關係，不願意投資者外流，在李登輝時代為了讓台塑根留台灣就多次修改法令，國家不再扮演社會安全體制的保障機制。

台塑六輕推動後，政府不願資源及利益為其獨占便大力推行八輕計畫，台塑為了阻礙八輕推動，同時期提出的大煉鋼廠計畫目的是封鎖八輕，以維持六輕的獨占市場。中油八輕與台塑六輕、大煉鋼廠的鬥爭並非只表現在經濟場域，在呂季蓉的研究中指出中油與台塑分別與八輕預定地：嘉義布袋和雲林台西的地方政府、地方派系有複雜的政黨問題和政商勾結。

環境運動和反公害運動所透露出的不只是環保議題，也不只是正義問題，更反映出歷史中的社會政治樣態，從過往有限的理解，如何反思當下我們所處的社會？二千年後的今天，環保運動和環保人士藉由台西反八輕展現出什麼樣態？相

²²³ 呂季蓉，2006，《地方派系、社會運動與環境治理：以八輕在雲嘉設廠決策分析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關論述又透露出什麼樣當前的道德危機？是值得深思的。從台西反八輕的社區動員經驗和論述，思考知識分子如何開展論述以反省國家共同體的論述基礎，並對當代社會及國家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批判。

2008 年我再次踏上雲林台西這片土地，這次他們面臨更大的挑戰，不僅是台塑大煉鋼廠和中油八輕，更是身處在新自由主義化下國家與資本家之間角力的夾縫中。這一次地方民眾因為生活困境而產生分歧意見，有著地方發展的壓力，人們不同立場下的緊張關係，有自救會會長、環保團體在這裡感受到的無力，有人民對落後的無奈感，還有媒體消費脫離現實的報導。

在反六輕之後，一位曾是蚵農的年輕人和我表達，他認為必須讓台西問題成為全國的議題，而不只是地方性問題，對生態環境要有長遠的永續經營為了後代的子子孫孫，所以外地人也有相同的責任²²⁴。除了感受到在地人的呼喊和需要，我隱約感受到若似七〇至八〇年代那些有夢想、有責任的有為青年的熱情在微微地燃燒，並且正在和這個無論述的時代拉扯對抗。

雖然環境議題在概念和意識形態上都具有全球性、普遍性，但同時環境意識與環境思潮則反映在地的社會脈絡和環保人士在特定時空下對環境的認知與價值，因此，不同的社群或文化對理想社會的圖像及環境意識其實各有不同²²⁵，重要的是必須釐清究竟是「誰在訴說？」、「說什麼？」和「怎麼說？」的問題以及行動主體的社會實踐過程。

八〇年代，環保文學和《人間》雜誌探討人與土地的關係，將自然訴諸一種公共性及以中國儒家思想為主的共同體。隨著工業化所帶來的汙染，自然與土地的公共性，將環境論述層次提高到反對功利主義及經濟上對第一世界的依賴發展。結合多元的抗爭主體讓環境運動在八〇年代打開了社會運動的大門。然而，解嚴後的台灣面對自身的認同和歷史問題而欲建造出台灣獨立國的意識形態，1994 年國家推展的社區營造便是試圖打造出台灣人認同的想像，在 2000 年政黨

²²⁴ 2008，4 月台西訪問稿。對象為在地年輕人。

²²⁵ 林益仁，2004，〈環境實踐的「全球」與「在地」辯證：以法鼓山的「環保」論述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5 期，頁：6~7。

輪替後加深與中國分斷的民粹主義，一種對社區、對鄉土的情懷更向上訴諸為愛台灣的宗教性崇拜。

本文透過環境運動的論述對不同的歷史脈絡提問，企圖解釋環境運動論述與社區、人民和土地之間的疏離，以及社區難以動員的可能原因和問題，這需要一個將台灣放置在第三世界的視角，重新理解台灣環保運動史的脈絡和思想資源；重新省視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試著捕抓第三世界國家在後殖民時期所浮現的新民主抗爭空間與形式。這些問題都考驗著眾多愛護台灣、關心底層的環保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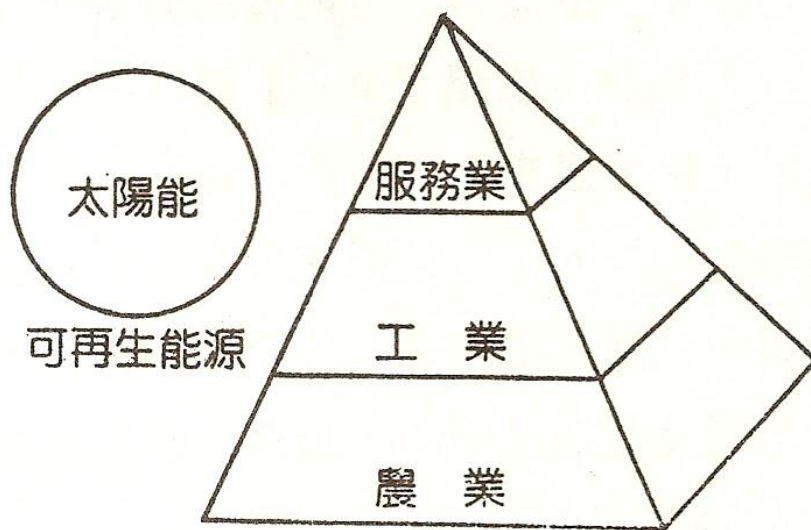
六、圖次：圖一

兩種農業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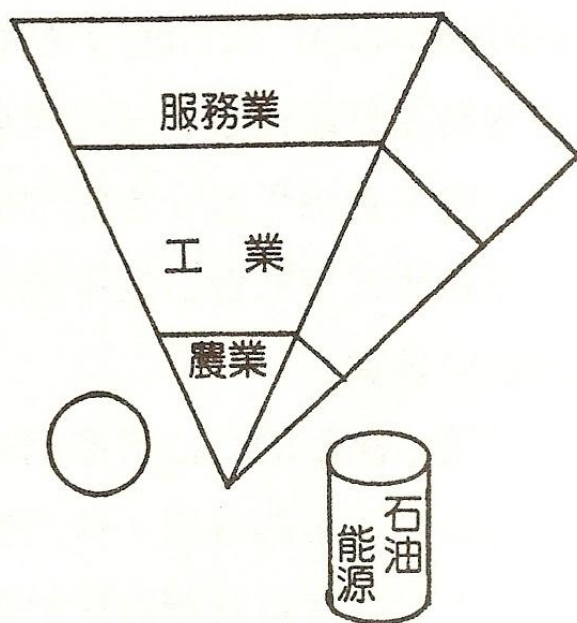
工業化農業	超工業式農業
經濟便捷，但生產條件的投入效果短，不穩定。	環境生態健全，生產條件的投入效果長，穩定。
生態單純而易失調。生產要件主要依賴化學製劑及化石燃料，只求短期的成效及穩定。對生態為破壞性的。	生態微妙複雜，但易平衡。生產要件主要利用自然過程以供給能量及營養，以求長期穩定和諧。對生態是保護性、建設性的。
「單一培育」農業。只栽培少數特選作物、養殖少數特選家畜品種。生產項目之間的關係極膚淺，無緩衝作用。經營風險高。	「多樣培育」農業。栽培、養殖的品種多，整合糧作、畜產、漁產、林產之間的操作體系。生產項目之間的食——能生產關係網分支廣，各項目間有互益或緩衝的作用。經營風險小。
大型農業，企業化經營。強調難以預測的遠程或國際市場。有國際企業的趨勢。	小型農業或合作化農場。強調易於預測的地方性或區域性市場。以社區生產為主。
集中式經營，以高能技術如機械、藥劑等為主——剛性技術生產。	分散式經營，以太陽能、生態關係、自然產品，適宜技術為主——柔性技術生產。
成本高、耗能高，故生產要件之獨立性低，受國際油價及通貨膨脹影響。	成本低、耗能少，故生產要件之獨立性高，較不受國際油價及通貨膨脹干擾。
促使都市人口集中及惡化、勞力分配不均、人口分佈不均；社會易趨於不安定、緊張。	促進城鄉人口平均分配、勞力平均分配，縮短城鄉差距；社會易趨於安定、和諧。

資料來源：林俊義，1989，《自然的紅燈》，頁：119。

圖二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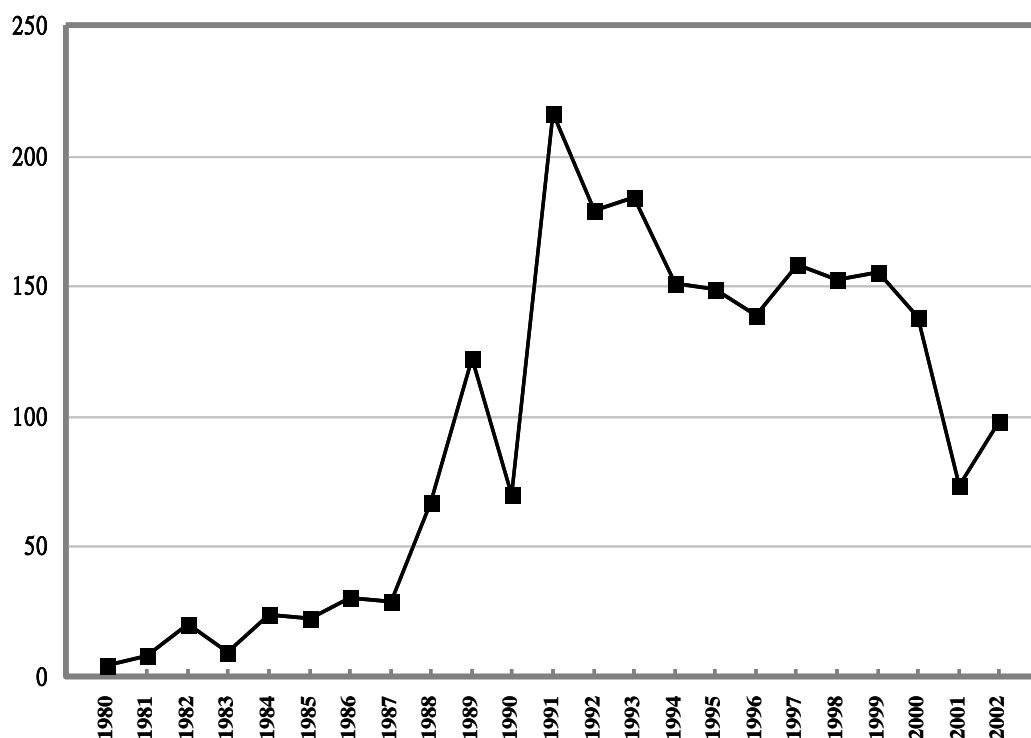


(圖二)

資料來源：林俊義，1989，《自然的紅燈》，頁：106~107。

圖三

台灣環境抗爭案件(1980~2002)折線圖



台灣環境抗爭案件(1980~2002)

年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案件數	4	10	22	11	25	23	30	29	67	122	70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案件數	215	176	181	150	148	136	157	151	154	134	73
年份	2002										
	(8月)										
案件數	96										

資料來源：何明修，2006，《綠色民主》。

七、參考書目：

- Jacob Bronowski, 1976, 漢寶德譯,《文明的躍昇》, 景象出版社。
- Rachel Karson, 1997, 李文昭譯,《寂靜的春天》, 台中晨星。
- 文化環境基金會編/林澄枝, 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 臺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文建會編印, 1995,「文化·產業」研討會暨社區總體營造中日交流展論文集。
- 游勝冠, 1996,《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 台北：前衛。
- 古繼堂, 1998,〈民族魂主宰的一次新詩革命—臺灣新詩論爭二十年回眸〉,《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 頁：46~62, 台北市：人間出版。
- 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 1987,〈新社會宣言—大新事件與民間哲學的確立〉,《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 台北：南方。
- 台北市社會教育館研究組編, 1995,〈社區營造與社區意識〉,《市民講座 23》, 頁：103~115, 台北市社會教育館。
- 石家駒, 1998,〈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從王拓「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批判展開〉,《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 頁：255~279, 台北市：人間出版。
- 行政院文建會, 1999,《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會議報告暨會議實錄》,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何明修, 2006,《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 台北：群學。
- 呂季蓉, 2006,《地方派系、社會運動與環境治理：以八輕在雲嘉設廠決策分析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欣怡, 1992,《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宋澤萊, 1978,《打牛湳村》, 台北市：遠景出版公司印行。
- 谷浦孝雄, 1995,《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灣的工業化》, 台北：人間。
- 林俊義, 1984,《科技文明的反省》, 台北縣：帕米爾書店。
- , 1989a,《台灣公害何時了》, 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 1989a1,〈從環境問題到消費者問題〉,《台灣公害何時了》, 頁：61~66。
- , 1989a2,〈污穢的春天〉,《台灣公害何時了》, 頁：95~97。
- , 1989a3,〈沒有品質的環境, 那來生活的素質—為「環境品質指標」催生〉,

- 《台灣公害何時了》，頁：87~94。
- ，1989a4，〈生態學與環境危機〉，《台灣公害何時了》，頁：51~60。
- ，1989a5，〈環境公害何時了—論環境公害的根源與解決之道〉，《台灣公害何時了》，頁：78~86。
- ，1989a6，〈建立環境價值倫理與生態理想—預祝民眾環保自力救濟運動的成功〉，《台灣公害何時了》，頁：183~188。
- ，1989b，《反核是為了反獨裁》，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1989b1，〈反核是為了反獨裁〉，《反核是為了反獨裁》，頁：228~241。
- ，1989c，《自然的紅燈》，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1989c1，〈台灣農業的再思考〉，《自然的紅燈》，頁：78~85。
- ，1989c2〈農業無用論〉，《自然的紅燈》，頁：151~154。
- ，1989c3，〈農業商業化的危機〉，《自然的紅燈》，頁：69~71。
- ，1989c4〈談現代化的農業困擾及出路—兼論中國農業前途的抉擇〉，《自然的紅燈》，頁：86~135。
- ，1989c5，〈我們該羞愧汗顏〉，《自然的紅燈》，頁：136~139。
- ，1989c6，〈從生態學看世界〉，《自然的紅燈》，頁：49~55。
- ，1989c7，〈不再跳躍的綠野—台灣〉，《自然的紅燈》，頁：155~161。
- ，1989c8，〈沒有生態和未來倫理的社會—論公害與生態危機的解決〉，《自然的紅燈》，頁：56~65。
- ，1989d，《綠色種籽在臺灣——一九八八綠色和平報告》，台北：前衛出版社。
- 林載爵，1998，〈本土之前的鄉土：談一種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挫〉，《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77~87，台北市：人間出版。
- 林澄枝，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施信民主編，2006，《台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國史館出版。
- 施敏輝編，1988，《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總決算》，台北：前衛。
- 徐正光、宋文里編，1989，《臺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 馬以工，1983a，〈今山古道—八通關〉，《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242~256。
- ，1983b，〈一個國家公園的誕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217~227。

- 許信良，1995，《台灣社會力的分析》，許信良總統選舉後援會出版。
- 郭紀舟，1995，《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正醜，1998，〈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 1977~1978〉，《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129~181，台北市：人間出版。
- 陳其南，1999，〈文史工作與台灣本土化〉，《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會議報告暨會議實錄》，台灣省政府文化處展顏文化事業工房版。
- 陳其南，1995，〈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發展〉，頁：4~7，載於文建會編印「文化·產業」研討會暨社區總體營造中日交流展論文集。
- 陳東松，2001，〈文史工作者與政府部門互動〉，臺灣新聞報：
<http://www.tsen.com.tw>
- 陳映真，2001，《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
- ，2001，《唐倩的喜劇》，台北：洪範。
- 曾健明，1998，〈臺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20~37，台北市：人間出版。
- 曾慶瑞、趙遐秋，2003，《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台北：人間。
- 黃麗玲，1995，《新國家建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社區共同體的論述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渡，1987，《民間的力量－台灣社會的現代啟示錄》，台北：遠流。
- ，1988，《強控制解體－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的面貌》，台北：遠流。
- 楊憲宏，1986，《走過傷心地－一個記者的公害現場觀察筆記》，台北：圓神出版。
- ，1989，《公害政治學》，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葉石濤，2004，《臺灣文學史回顧》，台北：九歌。
- 趙知悌，1976，《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行出版社。
- 趙剛，1994，〈公眾、國家與民主政治〉，《小心國家族》，台北：唐山。
- ，2011，《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台北：聯經。
-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
- 蕭新煌，1987，《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台北：圓神出版。
- ，1988，《新社會－台灣向前看》，台北：生活文化。

- 錢永祥，2001，〈青春歌聲裡的低調〉，《青春之歌》，頁：311~315，台北：聯經。
- 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1983，臺北市：九歌出版社印行。
- 韓韓，1983a，〈紅樹林生在這裏〉，《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17~32。
- ，1983b，〈滄桑歷盡—寫我們的北海岸〉，《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55~70。
- ，1983c，〈我們只有那一片沙—給我的孩子和島上所有黃皮膚的子子孫孫〉，《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259~271。
- ，1983d，〈永遠的阿里山〉，《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113~129。
- 羅中峰，〈歷史意識的覺醒—試論地方文史運動的社會意涵〉，2003，《台灣·東南亞文學與社會變遷》，吉隆坡：孝恩文化—歐亞大學亞洲區聯合委員會。
- ，〈共同體的追尋—解析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理路〉，2004，第一屆兩岸文化與族群學術研討會，中國：雲南民族大學。

期刊總覽：

(一)、《環境科學通訊》

- 安克志，1974，〈東海十九屆校慶美國大使安克志講辭要點〉，《環境科學通訊》第一卷第二期。
- 李文朗，1976，〈核子發電與臺灣社會〉，《環境科學通訊》第八期，頁：12~18。
- 林俊義，1975，〈生態學能解決環境危機嗎？〉，《環境科學通訊》第六期，頁：5~7。
- ，1976a，〈開發國家的環境問題〉，《環境科學通訊》第七期，頁：1~5。
- ，1976b，〈綠色革命：科技、環境與社會〉，《環境科學通訊》第八期，頁：1~11。
- ，1976c，〈美國的農業生產制度〉，《環境科學通訊》第九期，頁：9~14。
- ，1976d，〈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環境科學通訊》第十期，頁：1~5。
- ，1977，〈漫談國內的科學發展〉，《環境科學通訊》第十二期，頁：5~8。
- 莊進源，1978，〈科學技術與公害防治〉，《環境科學通訊》第十四期，頁：15~19。

蔡啟清譯，1975，〈人類環境宣言〉，《環境科學通訊》第一卷第一期，頁：3~4、11。

謝明山，1974，〈理想與目標〉，《環境科學通訊》第一卷第一期，頁：1~2。

(二)、《夏潮》雜誌

James Petras 著/吳二節譯，1976，〈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商業活動〉，《夏潮》第一卷第五期，頁：17~19。

王孝廉，1976，〈血櫻—關於霧社事件(上)〉，《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3~17。

王杏慶，1976，〈台灣地區的勞工權力問題—一種嘗試分析〉，《夏潮》第一卷第五期，頁：37~41。

王杏慶，1976，〈台灣地區的勞工權力問題一種嘗試的分析〉，《夏潮》第一卷第五期，頁：37~41。

王詩琅，1976，〈臺灣抗日運動新探討〉，《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10~12。

王曉波，1977，〈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夏潮》第一卷第十期，頁：8~15。

——，1977，〈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國父思想論〉，第二卷第二期，頁：5~7。

——，1977，〈國父和革命時代的中國—國父思想論〉，第二卷第三期，頁：7~10。

仰盛義，1977，〈孫中山先生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批評〉，《夏潮》第二卷第三期，頁：16~21。

任卓宣，1977，〈三民主義與鄉土文學〉，《夏潮》第三卷第二期，頁：6~7。

艾鄧，1977，〈孤兒的歷史和歷史的孤兒—讀吳濁流「亞細亞孤兒」〉，《夏潮》第一卷第十期，頁：54~59。

李慶榮，1977，〈雞啼鬼走〉，《夏潮》第二卷第三期，頁：32~35。

——，1977，〈為民喉舌：立法應對農民多加照顧〉，《夏潮》第二卷第三期，頁：36、37。

周南山，1977，〈也談歸國學人的公害〉，《夏潮》第二卷第四期，頁：52~54。

周湧，1976，〈臺灣工業污染的嚴重程度〉，《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40~46。

林俊義，1978b，〈臺灣公害問題〉，《夏潮》第五卷第二期，頁：22~28

- 南方朔，1978a，〈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一)〉，《夏潮》第四卷第二期，頁：48~51。
- ，1978b，〈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二)〉，《夏潮》第四卷第四期，頁：50~54。
- ，1978c，〈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三)〉，《夏潮》第四卷第五期，頁：59~62。
- ，1978d，〈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四)〉，《夏潮》第四卷第六期，頁：44~47。
- ，1978e，〈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保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五)〉，《夏潮》第五卷第一期，頁：72~76。
- 柯以書，1977，〈請聽礦工的呼聲〉，《夏潮》第三卷第三期，頁：11。
- 胡適，1976，〈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夏潮》第一卷第八期，頁：13~17。
- 韋政通，1976，〈胡適論之一〉，《夏潮》第一卷第八期，頁：18~24。
- 凌凌摘譯，1977，〈富裕中的貧窮和絕望—美國低階層社會面貌〉，《夏潮》第三卷第五期，頁：79~81。
- 孫中山，1976，〈中國的現在和未來〉，《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2~9。
- 梁德民，1976，〈賴和是誰？〉，《夏潮》第一卷六期，頁：56~59。
- 郭正昭，1976，〈科學衝擊與中國變遷〉，《夏潮》第一卷第八期，頁：24~28。
- 陳俊強(林俊義)，1978a，〈第三世界—跨國公司輸出污染的樂園〉，《夏潮》第四卷第六期，頁：38~41。
- 曾祥鐸，1977，〈談近代中國的民族精神〉，《夏潮》第三卷第一期，頁：5~6。
- 黃煌雄，1976，〈蔣渭水先烈的特質〉、〈蔣渭水先生大事略記〉，《夏潮》第一卷六期，頁：2~9。
- 楊青矗，1977，〈國內工人現狀分析—從國民生產毛額的統計數字說〉，《夏潮》第二卷第六期，頁：39~42。
- 葉石濤，1977，〈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第二卷第五期，頁：68~75。
- 趙天儀，1977，〈公害〉，《夏潮》第二卷第六期，頁：9。

- 劉阿旺，1977，〈請吃米飯的人，聽聽農民的心聲!!〉，《夏潮》第三卷第五期，頁：32~36。
- 編輯部，1976，〈我要再出發—楊達訪問記〉，《夏潮》第一卷第七期，頁：49~54。
- 蔡伸章譯，1977，〈美國大力推動下的日本資本主義〉，《夏潮》第二卷第三期，頁：49~52。
- 鄧念忠，1976，〈軍火貿易與中東和平〉，《夏潮》第一卷第五期，頁：13~16。
- 蕭國和，1978，〈農會如何剝削民的血汗〉，《夏潮》第五卷第三期，頁：44~45。
- 譚英坤，1977，〈一九四五以前的臺灣社會經濟〉，《夏潮》第二卷第四期，頁：6~15。

(三)、《人間》雜誌：

- 《人間》編輯部，1988，〈依賴與發展〉，《人間》第 37 期，頁：50~65。
- 心岱，1986a，〈向天地贖罪—保衛一條河流的故事〉，《人間》第 7 期，頁：82~93。
- ，1986b，〈重回桃花源—吳江村的未來〉，《人間》第 7 期，頁：94~97。
- 王家祥，1986，〈牡蠣的惡夢海岸—台灣養殖業破產倒數讀秒的緊急報導〉，《人間》第 7 期，頁：106~119。
- 王墨林，1988，〈台灣果農的怒吼〉，《人間》第 28 期，頁：66~77。
- ，1986，〈流過多少五穀豐登，農村凋敝的故事...〉，《人間》第 13 期，頁：58~71。
- 江迅，1988，〈從荒蕪到荒謬 1945~88〉，《人間》第 38 期，頁：145~152。
- 江淮生，1985，〈飢餓—來自衣索比亞的緊急報告〉，《人間》第 1 期，頁：110~120。
- 潘庭松，1986，〈水不能喝、雞不下蛋、豬養不大〉，《人間》第 3 期，頁：56~68。
- 李文吉，1986a，〈一種人文悲情—杜邦爭議下的憂思〉，《人間》第 7 期，頁：10~13。
- ，1986b，〈三重？三重，好得很！〉，《人間》第 12 期，頁：100~111。
- ，1986c，〈死於惡病體質〉，《人間》第 13 期，頁：110~117。
- 李明，1986，〈核電危鄉行—徘徊在核一、核二的邊緣〉，《人間》第 8 期，頁：

84~93。

黃小農，1986，〈核三迷惑—從憂愁海域到無奈鄉關〉，《人間》第 8 期，頁：94~101。

李疾，1986，〈岡山籬筐會：台灣傳統市集的沒落與蛻化〉，《人間》第 12 期，頁：10~23。

——，1987，〈褪色的金葉子〉，《人間》第 16 期，頁：80~91。

——，1988，〈如果他們在為台灣農業料理後事—第五卷再編組和轉變的時代〉，《人間》第 37 期，頁：120~125。

李翠瑩，1988a，〈異花同根〉，《人間》第 37 期，頁：99~100。

——，1988，〈第二次認同歧路—第四卷挑戰、反省反映〉，《人間》第 37 期，頁：105~109。

阮義忠，1986，〈在流浪的路上……〉，《人間》第 13 期，頁：94~99。

官鴻志，1986，〈再見，林投花〉，《人間》第五期，頁：7~21。

——，1988，〈鎬影幢幢的荒村〉，《人間》第 36 期，頁：46~57。

林美娜，1987，〈還我一瓢清淨水〉，《人間》第 21 期，頁：22~47。

洪素麗，1986，〈消失的蝶道—有誰能了解蝴蝶蛻變的痛苦〉，《人間》第 12 期，頁：26~39。

范都龐，1986，〈二氧化鈦：怎麼回事？〉，《人間》第 10 期，頁：32、33。

陳秀賢，1986，〈波瀾是怎樣洶湧起來的—杜邦事件大事曆〉，《人間》第 10 期，頁：34~49。

陳映真，1989a，〈人間宣言：解放與尊嚴〉，《人間》第 40 期，。

——，1989b，〈台灣經濟成長的故事—台灣公害的政治經濟學〉，《人間》第 42 期，頁：58~61。

——，1988，〈台灣戰後最大的農民反美示威〉，《人間》第 30 期，頁：10~16。

——，1988，〈民族文學的新的可能性—在「陳映真文學創作與文化評論國際研討會」結束時的致謝辭〉，《人間》第 35 期，頁：18~26。

——，1988，〈解放被朝歧視的台灣人！〉，《人間》第 38 期，頁：65~78。

黃小農，1986，〈致癌前後〉，《人間》第 13 期，頁：118~136。

- 楊憲宏，1986，〈一種人文悲情—杜邦爭議下的憂思〉，《人間》第十期，頁：11~13。
- ，1986，〈科技獨裁與恐懼的自由〉，《人間》第 8 期，頁：80~83。
- 趙國樑，1987，〈「菲律賓 模式」？〉，《人間》第 16 期，頁：34~37。
- 廣瀨 隆/荊果 改寫，1986，〈毀滅的咒語〉，《人間》第 8 期，頁：106~113。
- 蔡明德，1986a，〈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工業汙染下的人文反撲〉，《人間》第 7 期，頁：14~23。
- ，1986c，〈「反杜邦」攝影筆記〉，《人間》第 10 期，頁：50~61。
- ，1986b，〈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的——一條日漸消失中的打鐵街〉，《人間》第 11 期，頁：118~127。
- 盧思岳，1986，〈風雨大杯酒—草根性居民運動的一把手：李棟梁〉，《人間》第 10 期，頁：24~31。
- 謝三泰、王拓、蘆花，1987，〈如果對立可以結束—訪徐璐談海峽兩岸〉，《人間》第 25 期，頁：60~69。
- 鍾俊陞，1986，〈「核四」？一個未知的震動〉，《人間》第 8 期，頁：102~105。
- 鍾喬，1986，〈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工業汙染下的人文反撲〉，《人間》第 10 期，頁：14~23。
- 簡慧蓉，1988，〈舶來文藝 1950~1970〉，《人間》第 37 期，頁：66~72。
- 顏匯增，1988，〈尋找反核運動的意義〉，《人間》第 32 期，頁：119~135。
- 關曉榮，1988，〈向泛原住民運動邁進！〉，《人間》第 37 期，頁：126~133。

(四)、《新環境》雜誌

- 林信和，1985，〈如何改善當前的環境立法〉，《新環境》，第 4 期，頁：4~5。
- ，1986，〈不要讓你的環境權睡著〉，《新環境》第 11 期，頁：15~16。
- 范鎮國，1987，〈覺醒的心路歷程〉，《新環境》第 14 期，頁：27~28。
- 柴松林，1985，〈對民選公職人員及民意代表的環境期望〉，《新環境》，試刊號二，頁：2~3。

- ，1987，〈從消費者運動到環保運動〉，《新環境》第 15 期，頁：24~26。
- 柴松林與吳柏雄對談，1985，〈環境問題與選擇〉，《新環境》，試刊號二，頁：4~5。
- 馬以工，1985，〈怎樣才真的在做環境影響評估〉，《新環境》試刊號，頁：2~3。
- ，1986，〈我們出發了—新環境發起主婦聯盟〉，《新環境》第 11 期，頁：9~11。
- 馬以工整理，1985，〈柴松林、龍應台對談/如果你還想繼續生活在這裡!〉，《新環境》試刊號，頁：4~6。
- 楊渡，1987，〈反杜邦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新環境》第 14 期，頁：22~25。
- 盧思岳，1987，〈走出書房，進入民間〉，《新環境》第 14 期，頁：26~28。

(五)、其他期刊雜誌：

-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頁：71~116。
- 主席：蕭新煌，參與：吳介民、李建昌、郭正亮，整理：劉若韶，1989，〈解讀台灣的反對運動〉座談會，《中國論壇》第 335 期 28 卷 11 期，頁：6~19。
- 台灣社會學季刊編委會，2004，〈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3 期，頁：1~27。
- 左不野，1988，〈人民對決國家機器—後勁人民民主的實踐〉，《南方》第 15 期，頁：65~71。
- ，1989，〈反五輕抗爭的新空間—人民民主同盟的另一個案〉，《南方》第 16 期，頁：50~57。
- 何能，1979，〈核能發電危機之再思考〉，《中華雜誌》第 191 期，頁：24~26。
- 吳介民，1989，〈反對運動與社會抗議的互動〉，《中國論壇》第 335 期 28 卷第 11 期，頁：29~40。
- 呂正惠，1987，〈國民黨與五四新文化傳統—從二、三十年代文藝長期不開放談起〉，《文星》第 107 期，頁：66~68。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

- 1970~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 期，頁：133~206。
- ，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2 期，頁：57~120。
- 李明駿，1987，〈七〇年代的文學光影—對鄉土文學的省察〉，《南方》第 14 期，頁：71~75。
- 汪榮祖，1987，〈新文化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文星》第 107 期，頁：24~28。
- 杭之，1986，〈反杜邦運動的歷史意義兼介「台大學生杜邦調查團綜合報告書」〉，《文星》第 102 期，頁：29~38。
- 林世民，1983，〈龍沒有穿衣服〉，《前進》週刊 12 期，頁：14~15。
- 林益仁，2004，〈環境實踐的「全球」與「在地」辯證：以法鼓山的「環保」論述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5 期，頁：1~46。
- 夏台生，1987，〈當政治神話逐漸崩解之後〉，《南方》第 13 期，頁：30。
- 郭紀舟，2007，〈七十年代的《夏潮》雜誌〉，《思想》，頁：103~114。
- 陳光興，2005，〈『亞洲』做為方法〉，《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7 期，頁：139~218。
- 陳信行，2004，〈我的野百合—一個 1990 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4 期，頁：253~276。
- 陳映真，1995，〈台獨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對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之回應〉，《海峽評論》第 53 期。
- 陳昭瑛，1995，〈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9 期，頁：6~40。
- 陳道，1987，〈校園動盪下的「自由之愛」〉，《文星》第 109 期，頁：26~27。
- 黃順興，1979，〈關於汙染問題的質詢〉，《中華雜誌》第 191 期，頁：22~23。
- 詹曜齊，2007，〈七十年代的『現代』來路：幾張素描〉，《思想》，頁：115~140。
- 趙剛，1996，〈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21 期，頁：1~72。
- ，2008，〈超克分斷體制下的歷史與主體：從學習做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中國人開始〉，《台社二十週年：超克當前知識困境》，頁：137~163。
- 鄭鴻生，2007，〈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思想》，頁：81~102。

——，2008，〈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台社二十週年：超克當前知識困境》，頁：123~136。

蕭新煌，1983，〈三十年來台灣農業政策的演變：1953~1982〉，《思與言》第二卷第六期，頁：527~554。

錢理群，2005，〈我們這一代人的世界想像〉，《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7 期，頁：255~273。

關傑明，1972，〈現代詩的幻境〉，《人間副刊》。